

《记忆》第114期
北京大学文革专辑（一）

目 录

【专 稿】

印红标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

舒 声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述 往】

舒 声 文革中的周培源与季羨林——他们为什么参加“井冈山兵团”？

胡宗式 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李 樟 一个普通北大学子的文革回忆（1—4）

【评 论】

张 从 文革中北大两派的派歌

【口 述】

郭青苔（张从整理）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

【资 料】

俞小平 文革书简——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信（1966年6月9日—8月4日）

北京大学1966年大事记

【编读往来】

- 樊建政先生与金光耀教授商榷
- 金光耀教授答樊建政先生
- 编辑部延迟发刊说明

【版权声明】

【专稿】

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

印红标

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简称“文革”)期间的政治冲突和社会矛盾纷繁复杂,其中哪些对运动的发生发展具有最基本、最重要作用?中国大陆党史学界主要以毛泽东犯“左”的错误、被反革命集团利用为框架,即从中共党内斗争的角度讨论问题。西方学术界及海外中文文献当中有政治斗争论和社会冲突论的不同视角。本文试图说明,对于理解文化大革命进程至关重要的是如下三类基本矛盾:其一,中共党内矛盾,表现为毛泽东发动群众参加的反对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修正主义路线”和“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斗争;其二,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表现为所谓“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和在文化教育界对知识分子的批判、斗争和改造;其三,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矛盾,表现为文革中群众与领导干部“当权派”的矛盾和冲突。三者之中,党内斗争是中心,而知识分子问题和干部群众矛盾的卷入使文化大革命运动带有区别于其它政治运动的显著特征。在通常所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当中,原发性矛盾的充分展现集中在前三年,即1966—1969年。本文主要依据这三年的历史及有关中文文献,阐述对运动主要矛盾和冲突的一种观察和分析。

一、中共党内矛盾

文化大革命从根本上讲,是一场政治革命,它的核心问题是政治性的冲突——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斗争。对此,中共中央的文献和运动的实践都有清楚的展示。

按照1966年8月8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简称《十六条》)的说法,文化大革命的任务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

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①这个权威性的表述当时被简称为“一斗、二批、三改”三项任务，反复强调。“一斗”的内容即是党内斗争，在领导干部中的“当权派”中揭发和斗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人；^②“二批”的内容是针对知识分子和文化教育界的斗争，在知识分子中揭发和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三改”的任务所强调的是改革而不是斗争，逻辑上是前两项斗争的结果。而在这三项任务中，“十六条”特别强调：“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中共党内斗争通常具有两个层面的内容：一是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二是围绕路线政策的分歧和斗争。二者相互区别又密切联系，相互推动。具体到每一次斗争，侧重点有所不同，例如，1954年的高岗事件主要围绕权力的分配，而1959年的庐山会议则主要是路线、政策之争。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内斗争兼具权力和政策两个层面的斗争，中心是维护毛泽东至高无上的权力地位和不容置疑的政策主张。

对于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歧和矛盾。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已经有过很深入的研究，^③本文不再赘述。这里只想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高层领导中对大跃进、人民公社以及其他一些实际工作中的政策问题，存在政策分歧。由于当时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党内决策机制存在的弊病，政策上不同的意见只能在毛泽东容忍的范围内提出，并且一旦遭到毛泽东的反对就只能收回不提，因此党内政策分歧往往表现得不明朗。尽管如此，仍然可以看到分歧的存在，并且刘少奇务实的政策主张在党内享有广泛的支持。至于文革初期在运动领导方针问题上刘少奇与毛泽东的分歧，则是不可避免的。刘少奇不可能理解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不可能不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指责，因为这个运动就是针对他的。

按道理，党的领袖不仅应当掌握最高政治权力，而且应当是正确理论和政策的阐释者和代表者。领袖的地位应当来自理论和政策的正确性，从而一旦领袖决

①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刊登于《人民日报》1966年8月9日。

② 在当时，“干部”一词作为一社会种身份，既可以指共产党、政府、军队、国营企业、社会团体中的领导人，也可以指一般工作人员。本文中，“干部”指领导干部。“当权派”指领导干部中的主要负责人，相对于一些享有领导干部的职务或者待遇，但是不实际负责的干部，如长期家休养的老资格干部、行政级别很高但不实际作领导工作的专业人员。例如1966年9月3日毛泽东对傅连璋来信作的批语中说：“此人非当权派”。傅连璋是红军时期参加革命的医生，文革前夕任全国政协常委、卫生部副部长，但不实际负责。

③ 中国出版的文革专史包括：高皋、严家其：《“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金春明：《“文化大革命”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等。

策的正确性受到质疑，就势必意味着领袖的政治权力可能面临挑战，而不论是否真的存在权力争夺者。显然刘少奇没有与毛泽东争夺最高权力的企图，但是他对毛泽东竭力推行的大跃进的委婉批评，以及他在党内逐步增长的威信已经足以使毛泽东感到不安，进而下决心把他从接班人的位置上搞下来。文革中前三年权力斗争的中心是要剥夺刘少奇及其支持者的权力，按照毛泽东的意志重新进行接班人和其他领导的人事安排，重新分配权力，这无疑是一种权力斗争。

应当指出，权力与政策的分野并非总是一致的，这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区别两者的必要。最突出的例证是毛泽东对邓小平的态度。邓小平在文革前的许多重大问题上以及在文革最初两个月的领导方针问题上，与刘少奇的主张一致，被批判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制定者和代表人物。毛泽东要批判邓小平的政策主张，但是在权力方面却没有把他当作对手，甚至仍然器重他，准备在运动的高潮过去以后委以重任。1966年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刘少奇从中央第二位领导人降为第八位，而同样受到批判的邓小平的排名，却从第七升为第六位。^①有材料说，毛泽东一度打算把邓小平排在第四位。^②1967年5月，《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指邓小平为“党内另一个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后，毛泽东通过汪东兴向邓小平转达他的意思：“第一，要忍；第二，刘、邓可以分开；第三如果有事可以给他（毛泽东）写信”。邓小平以后通过汪东兴与毛泽东联系。^③1967年7月，在全国上上下下批判刘少奇、邓小平、陶铸的高潮中，毛泽东谈到对邓小平的评价：人家要打倒（邓小平）就打倒几个月，最多一两年；刘少奇还要留在中央委员会，邓小平要留在政治局和常委会；如果林彪身体不行了，还是要邓小平出来。^④这就是说，

①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7人，排名顺序为：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1966年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候选人，改选出政治局常委9人，排名顺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见：席宣、金春明：《“文化大革命”简史》，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6年，第112页。

② 曾经任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的王力回忆：毛泽东最早安排的次序，是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邓小平、陈伯达、康生、刘少奇、朱德、陈云、李富春、陶铸。江青说，邓小平犯了错误，怎么还升了？江青提出把陈伯达排在邓小平前面，又说陈伯达压不住邓小平，陶铸厉害，把陶铸调上来。邓小平于是成了第六位。王力：《未完成的文化大革命回忆》，修改稿发表于北京，《传记文学》1995年第5期。

③ 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4页。

④ 据王力1981年4月18日给中央的信，见《王力反思录》，香港北星出版社2001年，第305页。另外，王力：《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牛津大学出版社（香港），1993年，第86、96页刊载此信，但有错误。此书的印刷差错很多。为此，王力曾经打印了两页半的“更正”。该书第86页“小平同志要保留在中央委员会”，应当为“小平同志要保留在政治局和常委会”。笔者在《现场历史：文化大革命纪事》一书出版前摘抄并保留了王力1981年4月18日这封信的相关内容，见到该书的印刷错误后曾经当面向王力指出。该书第96页“七月一四日”应当为“七月十四日”。邓小平的女儿以“毛毛”的名字出版的回忆中，引用了这个说法，参见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文革”岁月》，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46页。

对于路线政策上同样被列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两个人，在权力安排上是迥然不同的。对刘少奇是将其逐出中央决策核心，只保留一个没有实权的中央委员，如中共“七大”以后对王明的安排一样；而对邓小平则是准备继续委以重任。后来事实的发展是众所周知的：刘少奇没有能保留在中央委员会，被迫害致死；而邓小平则在林彪倒台后由毛泽东提议再度出山，1975年1月他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主持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日常工作，政治地位比文革前高了很多。

中共党内围绕林彪集团的斗争中心自始至终是政治权力，而非路线政策的分歧。林彪与江青张春桥关于要不要宣传天才、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不过是表面文章。

执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是非常错综复杂、微妙隐秘的问题，在毛泽东以下的领导干部当中的问题就更加复杂，涉及领导人之间的个人关系、个人好恶、革命历史上的渊源和政治关系（如上下级关系、所谓“山头”关系^①）、个人情感的亲疏等等。这些在中国至今不能摆到桌面上公开讨论的权力关系问题，都曾经深刻影响过运动的进程。本文无意对此深究，只打算指出承认并考察这一层面的矛盾，有助于洞察那些仅用理论错误、反革命集团等概念难以澄清的许多问题。

在文化大革命中，毛泽东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是史无前例的，这就是以党中央的名义“运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大民主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②抛开党的地方和基层的组织体系，参与党内斗争。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鼓励群众“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破天荒地允许“群众自己解放自己”，^③自发成立群众组织，在领导干部中揭发和批判“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中央领导人频繁地参加群众大会作讲演，接见群众代表，直接向群众传达中央的指导精神。与此同时，中央默认党的基层组织停止活动，党的地方组织瘫痪或者半瘫痪，党的地方报刊受到严重干扰直至被群众组织夺权。以往由党政领导干部垄断的言论、组织、信息等政治资源，一变为由造反的群众分享，

^① 中共党内的“山头”指革命历史上由于在不同的革命根据地，不同的部队，如红军不同的方面军、八路军新四军不同的军、解放军不同的野战军或地方军，以及不同的“白区”地下党组织，而形成的政治以及个人的关系。

^②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1966年8月8日。

^③ 《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编辑部：《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纪念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五十周年》，《人民日报》1967年11月6日。

在某些时候、某些方面后者甚至占据优势，这就使群众具有了站在毛泽东一边参与党内斗争的条件。

毛泽东为什么采取这种“自下而上”的“大民主”的群众运动方式？林彪在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中引用毛泽东1967年2月的一段话作了解释：“过去我们搞了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但不能解决问题，因为没有找到一种形式，一种方式，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发动广大群众来揭发我们的黑暗面。”政治报告说：“现在，我们找到了这种形式。它就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只有发动亿万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才能把混入党内的叛徒、特务、走资派揭露出来”。^①文革前进行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等政治运动都是采取“自上而下”的方式，通过共产党的组织体系领导运动，对问题比较多或者问题严重的基层组织，则由上级组织派出工作组领导运动。依靠这样的方式，很难达到从政治上彻底整倒、整臭刘少奇，打倒一批走资派的目标，因为依靠各级党组织实际上就是依靠各级领导干部掌握运动，去揭露他们自己当中的一些人，而刘少奇的政治根基正是党的组织机器。于是毛泽东转向党内的群众，借用党的组织机器以外的社会力量，直接发动那些与领导干部在社会地位和利益方面存在差别和矛盾的群众参加党内斗争。

我们很难知晓毛泽东在文革的开始是不是就有一个成熟的发动群众的构想，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通过支持北京大学的大字报、红卫兵和“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步一步地发动群众，打破党的组织体系和领导干部的阻力，把运动引向斗争走资派的目标。^②

毛泽东发动群众的第一个重要步骤，是支持并向全国广播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树立了群众攻击本单位领导的样板。全国的大中小学校以及文化教育界群众纷纷响应。当时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决定向学校派出工作组，使运动置于党的组织领导之下，修补了被群众运动打开的领导体系的缺口。

毛泽东对派工作组的领导方式不满，采取了第二个步骤：撤销工作组、支持

^① 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69年4月1日，发表于《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② 毛泽东在1966年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说：“我闯了一个祸，就是批发了一张大字报；再就是，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写了一封信；再，我自己写了一张大字报。”“一张大字报（北大的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给红卫兵这封信，我还没有发出，全国就搞起来了。”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1966年10月2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50—151页。

红卫兵。红卫兵是学生自发的游离于党团组织体系之外的组织，这种组织在共产党的正常政治秩序下是绝对不能允许的。刘少奇曾经指示工作组：“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①邓小平指示，要“消化红卫兵，溶化红卫兵”，“逐步把红卫兵溶化到共青团组织中来”。^②但是毛泽东坚决地支持了红卫兵，实际上肯定了学生在运动中不经党政领导的批准自发成立组织的权利。不久，这种权利从学生扩大到了各界“革命群众”。然而，最初成立的红卫兵（后来被称为“老红卫兵”）以工人、贫下中农、革命干部、革命军人、革命烈士，所谓“红五类”的子女组成，以干部子女为核心。工作组撤出以后，由群众选举产生的“文化革命委员会”也多由维护工作组或者党政领导的人组成。于是，红卫兵和文革委员会虽然没有隶属于党政组织，其主流仍然受其影响或控制，热衷于批判斗争知识分子和已经被打倒的地主、富农、资本家等阶级敌人，而对批判党政领导干部缩手缩脚，甚至阻止其他群众冲击领导。1966年8月红卫兵冲向社会“破四旧”，把群众斗争的矛头引向了党外。红卫兵、文革委员会等群众组织与领导人保持着家庭的血缘纽带和党员团员的政治纽带，构成了保护当权派的新机制。

有鉴于此，毛泽东采取了第三次发动群众运动的重要步骤：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再次把群众运动的斗争矛头从党外引向党内，从重点在群众中整“牛鬼蛇神”引向重点在当权派中揭发批判当权派。^③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的具体活动主要是两个：其一，要求各单位领导公开向群众承认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给被打成“反革命”的“革命群众”平反，支持群众的“革命行动”；其二，批判“血统论”。^④

① 刘少奇1966年7月14日给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的指示中谈到：“红卫兵是秘密组织，也是非法的。”参见：北京师大一附中六·二〇北京公社：《向刘贼讨还血债》，1967年7月。《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社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1967年1月1日）称：“六七月间，红卫兵刚出现，只有几十个人，当时被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诬为‘反动组织’，遭到了打击和围攻。”这里提到的“反动组织”的提法，似不准确。根据上述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的资料，刘少奇的提法是“非法”。

②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北京市中学文化革命工作团团长胡克实指示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要“消化”、“溶化”红卫兵，参见北京市中等学校革命师生揭发控诉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筹备处宣传组：《愤怒声讨胡克实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北京中学文化革命运动的滔天罪行》，1966年12月28日。笔者1988年访问曾经担任清华大学附属中学工作组组长的刘晋先生，刘晋说，当时胡克实说这是邓小平的指示。

③ “牛鬼蛇神”在当时泛指被批判斗争的人，偏重指党政领导当权派之外的“阶级敌人”。

④ 参见：中共中央批发军委、总政《关于军队院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紧急指示》，1966年10月5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32—133页。陈伯达：《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1966年10月1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25册，第133—143页。

文革开始以后，工作组或者党政领导人的普遍作法是因循以往政治运动的先例，除了批判斗争文化教育界的领导和学术权威以外，还在群众中寻找和批判“有问题”的人，例如政治历史有问题、家庭出身不好、对抗或不服从领导的人。由于这些针对普通群众的作法被宣布为是压制群众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地方和基层领导人不得不按照中央的要求检讨自己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错误，公开为被打击的群众平反、道歉。他们领导运动的资格由此被大大地削弱直至被剥夺。由于这个领导方针是由文革初期主持中共中央的刘少奇、邓小平制定的，所以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批判，就把批判的矛头引向了刘少奇。此外，那些以干部子女为核心的红卫兵、维护工作组或当权派的文化大革命委员会大多鼓吹过血统论或者对普通群众实行过政治打击和迫害，他们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过程中也丧失了往日的威风。

与此同时，在文革初期直接或间接遭受当权派政治打击的学生、青年知识分子和工人，在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运动中获得了平反，为数甚多的遭受家庭出身歧视的群众从批判血统论的活动中感到“解放”了。他们真心相信，是毛泽东把他们从当权派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毛泽东又一次成了被压迫人民的“大救星”；同时，毛泽东的路线不再仅仅是抽象的概念，而是和他们息息相关的了。毛泽东获得了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跟随他冲击当权派的浩大的社会力量。到这个时候，也只是到这个时候，文化大革命群众运动才真正发动起来了。

然而毛泽东的代价是招致了几乎整个党政领导干部层对文革的反感和怨恨。他们不是不能接受对彭、罗、陆、杨的批判，不是不能接受对刘少奇的批判，如同1959年庐山会议期间和会议以后一边倒地批判彭德怀一样，但是很难接受对共产党的组织和几乎整个领导层的普遍冲击，这完全违背共产党传统的政治理念，更危害他们的既得利益。对很多党政领导人来说，文化大革命运动只是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才真正变得不可容忍。事实上，只是在运动的格局变成群众斗领导以后，才出现了领导人的明显的抗争。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受到越来越严重的冲击。11月叶剑英等老帅起而批评，1967年老一辈革命家进行了著名的“二月抗争”。“二月抗争”之所以发生在1967年2月，而不是红卫兵残酷迫害知识分子和“牛鬼蛇神”的“红色恐怖”的1966年8月，不仅具有政治认识的原因，而且具有深刻的社会根源。

仔细考察“二月逆流”也可以发现，老一辈革命家猛烈反对的是打击老干部和干部子女、抛开党委领导的运动方式，造反派夺权、冲击解放军等现象，而不是为刘少奇鸣冤叫屈。^①

大规模的难以全面控制的群众运动进一步推动党内斗争陷入混乱，打击面比文革领导者最初的预期严重扩大。

共产党领导层内部的分歧和斗争是不可避免的。在共产党取得政权并且形成了个人崇拜的领袖以后，党内斗争超越民主集中制的规范，最高领袖依靠权力残酷打击和清洗其他领导人的情况并不乏先例，如30年代斯大林依靠秘密警察进行的大清洗。然而，只有文化大革命，是在毛泽东领导下，以党中央的名义自下而上大规模发动群众冲击党的领导机构和领导人，进行“路线斗争”。这是文化大革命党内斗争的空前绝后之处。

二、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化教育界和知识分子状况的强烈不满。^②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所谓“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仅次于此的就是文化教育界的斗争，即在知识分子中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进行文化教育等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强化共产党在这些领域的领导。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第二位重要的任务，即中共中央“十六条”规定的“一斗、二批、三改”中的第二项任务。这方面内容，不仅是政治斗争，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展现了带有社会性的矛盾即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

文革时期通用的知识分子概念，指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专业技术人员，是一个具有独特社会地位和作用的社会群体或者阶层。知识分子与领导层之间、与工农体力劳动者之间存在着差异和矛盾，知识分子内部又存在着旧社会受教育的知

^① “二月抗争”的记录，见宋琼等：《所谓“二月逆流”的历史真相》，《解放军报》1979年2月26日。

^② 1966年3月毛泽东在杭州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说：“我们在解放后，对知识分子实行包下来的政策，有利也有弊。学术界和教育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掌握实权。社会主义革命越深入，他们就越抵抗，就越暴露出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面目。”转引自马齐彬等编：《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增订本），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第267页。毛泽东在1966年5月7日的批示中说：“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编入《毛主席论教育革命》，北京，人民出版社，1967年。毛泽东1970年12月18日会见美国友人埃德加·斯诺时说：“我们没有大学教授、中学教员、小学教员啊，全部用国民党的，就是他们在那里统治。文化大革命就是从他们开刀。”《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171页。

识分子和新社会培养的知识分子的差别。

领导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由来已久。中国共产党领导以农民为主力的革命战争取得了政权，新中国的领导者基本由共产党革命家担任。虽然各级领导人当中有一些人来源于知识分子，但是他们是作为原有阶级的叛逆参加革命的。掌握政权的领导干部与掌握文化和科学技术的，从旧中国过来的中老年知识分子，在阶级来源、政治和社会地位、思想意识等方面，存在显著的差别。^①新中国培养的青年知识分子到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已经构成知识分子的多数，但是大多还没有成为业务的骨干，他们也与领导层存在差别。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思考政治和社会问题、参与政治和社会管理的能力和历史传统，而共产党政治制度要求言论和思想的高度一致，基本不允许独立于官方意识形态的思考和批评，知识分子参政议政的空间受到严格的限制。毛泽东要求知识分子像毛附在皮上一样，依附于新的政权。1957年许多出于善意向共产党和政府提出批评的知识分子遭受无情打击，而各级领导的政治地位愈加不容质疑。

知识分子与工农体力劳动者之间也存在着社会差异和矛盾。中级以上知识分子多出身于旧中国的中间以上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苦农民缺乏天然联系。新中国成立以后，工人阶级虽然在原则上是领导阶级，政治地位比知识分子优越，但是在经济收入、生产管理、社会地位方面则不及知识分子。这种矛盾的状况，使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之间的矛盾长期存在。相比之下，工农与共产党干部有更多的天然联系。因而，在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发生冲突时，最容易动员的对抗知识分子的社会力量就是工农阶级。

领导层在对待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只有策略的不同意见，而没有政治上的根本分歧。共产党关于知识分子阶级属性的判断存在矛盾。一方面，根据旧中国大部分知识分子，如教师、公立医院的医生等不拥有生产资料而受雇佣的地位，判定其为工人阶级，吸收他们参加工人阶级的群众组织——工会；^②另一方面，又

^① 毛泽东在文革前夕的一个批示中讲道：“共产党人和我们的军事干部，一字不识和稍识几字的占了百分之九十几，而多识一些字的，例如读过三几年中学，进过黄埔军校、云南讲武堂、苏联军事院校的，只有极少数，大学毕业生几乎一个也没有。”这里的估计不是严格的统计，意在强调共产党人大多只受过有限的学校教育。毛泽东接着说：“共产党人曾经进过二十几年的军事大学和革命大学（即二十几年的战争与革命），而那些大学教授和大学生们只会啃书本（这是比较容易的工作），他们一不会打仗，二不会革命，三不会做工，四不会耕田。他们的知识贫乏得很，讲起这些来，一窍不通。他们中的很多人确有一项学问，就是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至今如此。”毛泽东：《对〈在京艺术院校试行半工（农）半读〉一文的批语》，1966年4月14日，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2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34—35页。

^② 1950年8月4日通过的《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划分农村阶级成分的决定》中，《政务院补充决定》关于知识分子的部分规定：“（一）凡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为其中办事

依据他们的收入水平、社会地位和思想状况,判定其为小资产阶级或者资产阶级。

“文化大革命”前,共产党内主导的思想是认为知识分子在世界观上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他们中的绝大部分还不能说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在进行经济建设和发展科学文化方面,注意发挥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而在政治方面,并未予以信任。^①党政领导人,特别是地方和基层领导人,通常是在强调经济建设时,注意团结知识分子,在政治运动来临的时候,着重对知识分子进行审查、批判和改造。基本的事实是,批评领导人往往要冒严重的政治危险,而批判或伤害知识分子则很少承担实际责任。现实助长了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宁左勿右”的认识和作法。就整体而言,领导层基本能够,甚至乐于接受毛泽东对知识分子问题的估计,不存在严重的分歧。

在毛泽东关于反修防修、巩固政权的战略思考当中,知识分子问题占有重要的地位。1956年匈牙利事件以后,毛泽东一方面重视反对匈牙利共产党前领导人拉科西那样的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者,另一方面警惕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敌对势力。官僚主义造成人民的不满,不同政见知识分子的宣传鼓动和组织,则足以使人民群众的不满发展成颠覆政权的政治力量。至少从1957年以后,这两个主题在中国的政治运动中交织出现。1957年春夏,政治风向由重点整顿党内官僚主义开始,以反对资产阶级右派(主要在党外,多为知识分子)告终;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则是一斗“党内走资派”、二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矛头所向,不外这两者。

领导层与知识分子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群众运动中远非同舟共济的不同命运,说明了二者的差异和矛盾状态,耐人寻味。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三个月,1966年5月至7月,除了文教界和北京市委以外,中央和地方绝大多数党政领导干部处于领导地位,而高级和中级知识分子,即旧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是

人员,取得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者主要来源的人,称为职员。职员为工人阶级中的一部分。(二)凡有专门技能或专门知识的知识分子,受雇于国家的、合作社的或私人的机关、企业、学校等,从事脑力劳动,取得高额工资以为生活之全部或主要来源的人,例如工程师、教授、专家等,称为高级职员,其阶级成分与一般职员同。……”参见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党史党建政工教研室:《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19册,第185—186页。

1950年6月29日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第一条规定:“工会是中国工人阶级自愿结合的群众组织。凡在中国境内一切企业、机关和学校中以工资收入为其生活资料之全部或主要来源之体力与脑力劳动者及无固定雇主的雇佣劳动者,均有组织工会之权。”《中央人民政府法令汇编(1949—1950)》,北京,法律出版社1982年,第41—42页。

^① 中国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基本政策是“团结、教育、改造”,而不是依靠。

批评和批判的重点对象。当时,文化大革命被普遍理解为文化教育界的革命,主要打击文教领域少数领导人和知识分子。在这段时间,党政各级主要领导人主持了对大批知识分子和部分文教界领导(多为知识分子出身)的揭发、批判和斗争,很多人还表现出相当高的积极性。^①与地方和基层领导的态度相关,一批工农兵模范人物、先进分子也被发动起来进行大批判。运动的态势近似1957年反右派斗争。此时,领导层大多没有准确理解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图,未发生严重的抵制。联系长期以来党内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指导思想的发展以及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普遍看法,这种现象不难理解。

同年8月至9月,大批知识分子和文教界领导人受到红卫兵的粗暴凌辱和残酷伤害,却很少得到领导当局的有效保护。此时,大部分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虽然仍然处于领导地位,可以影响多数派群众,但已经感到了政治的压力。中共中央的“十六条”指责很多干部对运动的领导很不理解,很不得力;少数派学生也向党政领导挑战。在风云莫测的政治风浪中,不少领导人力图跟上形势,摆脱被动,而不愿为保护政治上不那么可靠的知识分子承担风险,甚至借打击知识分子表现自己的革命立场。^②

1966年10月以后,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扭转了运动的方向,领导层和知识分子的处境发生了维妙的变化。运动的矛头集中指向党内当权派,由此,当权派人人自危,朝不保夕,而众多知识分子却得以暂时逃避巨大的政治压迫,不少人还得到了“革命群众”的名分。其中一些人“逍遥”于运动之外,很多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则变被动为主动,参加了造反派群众组织,批判斗争那些曾经在政治上或多或少冷落、压抑或者伤害过他们的当权派。对学术权威的批判也一度被搁置一旁。当然,文教界领导人的处境因其当权派身份而依然如故。

知识分子处境的相对缓解只是“无产阶级司令部”调整政策,发动广泛的社

^① 在1966年6—7月,经中央或地方党委批准,在全国各地的很多学校和文化艺术单位点名或不点名地批判了一批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如北京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陆平、清华大学党委书记兼校长蒋南翔,知名学者、文学艺术家周谷城、罗尔纲、贺绿汀、秦牧等。参见此间各地报刊及后来的报刊报道。彭小蒙(文革时北京大学附属中学高中学生、该校红旗战斗小组的主要创建人之一)1992年4月8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回忆说:“许多老干部对我们的闹事和我们反对校方的行为几乎都采取支持的态度,将我们的行动比作我们在国民党统治下闹学潮。当时就连高干也没有意识到文革会是后来那样的结果,时间那么长,触及面那么大,许多老干部都倒了台。当时我们是要革除教育制度上的毛病。”根据录音记录稿。

^② 彭小蒙1992年4月8日在美国哈佛大学回忆说:红卫兵破四旧运动以后,“除了周恩来和陈毅等少数人外,全体干部和新闻媒介都赞成和支持这种行动。”根据记录稿。又见当时中国各地的报刊。

会力量集中打击主要斗争目标——党内走资派的暂时结果。在当权派的阻力被冲垮，批斗走资派形成大气候以后，从1967年夏季起，中央再度强调批判学术权威，只是其地位次于对走资派的批判。在毛泽东，第一是斗争党内“走资派”，第二是批判反动学术权威，二者的重要地位有别，但是都必须进行。1968年以后，在逐步开展的“清理阶级队伍”、“整党”等运动中，大批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被无辜地扣上“叛徒”、“特务”、“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残渣余孽”等政治帽子。同年夏秋，批判的矛头扩大到几乎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不仅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而且新中国培养的知识分子，包括那些曾经叱咤风云但已经令毛泽东失望的红卫兵大学生，也成了“从旧学校培养的”知识分子，需要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1966年发动群众时还曾见诸报端的“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小将”之类的赞誉消失了，代之以放下知识分子“臭架子”，“老老实实、恭恭敬敬”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宣传。^①知识分子的社会形象被丑化，知识分子从此自嘲为“臭老九”，即仅次于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叛徒、特务、走资派八类阶级敌人之后的被批判者。

笼统地把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加以批评主要是1968年夏季以后，与“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的宣传，与派遣工人群众组成“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学校及文化单位的行动同时进行的。毛泽东在发动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时，又一次利用工人与知识分子的社会矛盾，调用工人群众的力量。1957年反击右派的一篇重头文章的题目是《工人说话了》，1968年姚文元传达“无产阶级司令部”最新战略部署的文章题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二者何其相似！^②

但从这以后，不仅少数“学术权威”，而且为数众多的一般知识分子，也与被打击的领导干部的命运开始接近。他们在“牛棚”，在五七干校，有了更多的相互理解和共识。进入1970年代，领导干部和知识分子这两个“文化大革命”的主要受害者群体，逐渐在厌恶“四人帮”、反感“文化大革命”这一点上，殊

^① 见《人民日报》1968年8月26日发表的姚文元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9月12日发表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关于知识分子再教育问题》，以及同年7月至9月发表的有关文章。

《工人说话了》发表于《人民日报》1957年6月10日。姚文元的文章《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发表于1968年8月26日，姚文元送审时的题目是《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认真搞好斗、批、改》，毛泽东审阅时改为《工人阶级必须领导一切》。参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3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第533页。

途同归。

文革结束以后，中国的关于文革的回忆往往回避知识分子与领导层的深刻矛盾，极少提及运动最初阶段对知识分子迫害中领导干部的责任，青年和中年知识分子则回避参加造反派的经历，他们宁可和领导干部一起将这些问题归罪于林彪、江青集团或者造反派头头的倒行逆施。这可能是出于不计前嫌、团结一致向前看的善良愿望，也可能是在舆论一律的主流话语下的健忘、乖巧或者逃避反省。但是，历史研究者不能按照“宜粗不宜细”的原则闭上眼睛。

三、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矛盾

毛泽东以中央的名义自下而上地发动群众，采取“大民主”的方式，向党政各级领导者发难，斗争其中所谓走资派。问题是：为什么运动期间群众曾经表现出空前高涨的政治激情？一个不容回避的基本原因是，不当权的群众与当权的领导干部之间存在社会性的矛盾。

按照苏联斯大林模式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废除了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但是事实上并没有就此实现理想中的社会平等与和谐，而是产生了新的社会差异、分层和不平等。领导干部通过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垄断了政治权力，全面掌握了经济、社会、文化等资源；而普通群众，包括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则只有仰赖领导层的给予才能享有权利。政治权力在新的社会中如同财产金钱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样，具有头等重要的决定性的意义。当权的领导层与不当权的群众之间的社会差异，不可避免地产生矛盾。当然，在群众当中也存在着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新的社会矛盾并非来源于地主与农民、工人与资本家等旧中国的社会关系，从根本上说也不是由于个别领导人的腐败，而是植根于新的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直到文革前夕，执政的共产党没有建立起有效的社会矛盾协调机制，而是沿用革命斗争的思路，不断发动政治运动、力图以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的方式解决问题。群众平时对领导干部的不满得不到适当的调节，一遇运动，积累的怨恨就会以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例如在1957年的整风鸣放、1963至1966年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亦称“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中发生的情况。文化大革命实际上是新的政治和社会矛盾，而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阶

级斗争的产物。

毛泽东洞察到领导干部和群众之间普遍存在的矛盾，承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矛盾。1957年他提出正确区分敌我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命题，但是现实所表现出的复杂冲突促使毛泽东继续探讨。1957年以后，他多次从领导干部作风的角度，以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理论框架，用强化阶级斗争和政治运动方法观察、解释并且企图解决这一矛盾。文革前夕和文革期间毛泽东的谈话曾经几度触及到体制和新生社会矛盾问题，但是他没有走得太远，他的观点显得不确定、不成熟。1957年，毛泽东发动党外人士和知识分子进行反对共产党内官僚主义、主观主义、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但是后来运动转移了方向。1960年代中苏论战，中共中央曾提出：在苏联出现了一个由党政领导干部当中的蜕化变质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的资产阶级“特权阶层”，这个特权阶层把为人民服务的职权变为统治人民群众的特权，以高额收入和各种特权，侵吞人民的劳动成果。^①苏联与中国社会模式的相似性必然使人们联想到中国；或者反过来说，正是中国的现实影响着人们对苏联问题的看法。“特权阶层”的概念在文革中被广泛运用于分析领导干部与群众的分离和矛盾。1965年1月，毛泽东提出了“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他在一个批示中说：“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这些人是已经变成或者正在变成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分子，他们怎么会认识足呢？这些人是斗争对象，革命对象，社教运动绝对不能依靠他们。我们依靠的，只有那些同（工）人没有仇恨，而又有革命精神的干部。”^②在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中，“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概念承认了新的阶级分化和矛盾，比“特权阶层”概念有了更深刻的社会政治意义。然而，毛泽东此后不再重提“官僚主义者阶级”，而代之以“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1965年1月，经毛泽东批改过的中共中央在《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即“二十三条”）正式使用了“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概念。这一概念后来成为文化大革命中反复使用的关键词语。在文化大革命高潮中，《红旗》杂志、《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对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作了这样的表述：“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同广大工农兵、

^① 《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人民日报》1964年7月14日。

^② 毛泽东：《对陈正人关于社教蹲点情况报告的批语和批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1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第265—266页。

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①对社会矛盾的这种分析，为揭露和抨击社会主义社会的阴暗面提供了武器，曾经吸引和鼓动了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众多群众。不过，这一提法不久也不再强调。在结束了群众造反运动以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新生矛盾的观点虽然没有实质性的发展，但是也没有改变。逝世前一年，他再次说：“民主革命后，工人、贫下中农没有停止，他们要革命。而一部分党员却不想前进了，有些人后退了，反对革命了。为什么呢？作了大官了，要保护大官的利益。他们有了好房子，有汽车，薪水高，还有服务员，比资本家还厉害。社会主义革命革到自己头上了，合作化党内就有人反对，批资产阶级法权他们有反感。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②

关于文化大革命运动当中领导干部与群众的激烈冲突，毛泽东 1967 年视察时讲了这样一段话：“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今后要吸取教训，很好地解决上下级关系问题。”^③毛泽东在这里涉及了两个基本问题：第一，干群矛盾的长期存在；第二，这一矛盾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激化，即所谓“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6 年 6 月以后地方和基层党政领导人掌握运动的四个月期间，伤害了很多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④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始，被激化的矛盾如同烈火，随着政治风向的逆转，反过来烧到了领导者身上，演化成群众“矛头向上”批判

① 《伟大的历史文件》，发表于《人民日报》1967 年 5 月 18 日。这里引用的文字是文章起草者（估计是陈伯达、王力等人）所写的。毛泽东对《伟大的历史文件》一文的批语和修改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350—352 页。

② 《毛主席重要指示（1975 年 10 月—1976 年 1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年，第 487 页。

③ 毛泽东《视察华北、中南和华东地区时的谈话》（1967 年 7—9 月），《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 12 册，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年，385—386 页。

④ 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 1966 年 8 月 10 日在中共八届十一全会中南组会议上说，6 月至 7 月下旬北京有“一百几十个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其他一些城市也有类似情况发生。见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第 42—43 页。另外，1966 年 8—9 月，很多单位的“文化革命委员会”和红卫兵打击、迫害了一批的群众，例如：北京六中等学校红卫兵私设劳改队，关押、残害被打成“牛鬼蛇神”的本校师生及其他群众。在批判资反路线的运动中，北京六中劳改队被解散，被当作资反路线迫害群众的典型。见（北京）六中遵义兵团：《彻底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1967 年 2 月。又据笔者对几位原北京市中学教师或者学生当事人和见证人的访谈。

领导的强大风潮。

对比1957年和1966年的政治运动，颇具启发意义。1957年整风“鸣放”活动中群众对领导的激烈批评，激发了领导人猛烈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扩大打击面的强烈冲动；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最初四个月领导人在群众中横扫“牛鬼蛇神”，造成了群众的不满和恐慌，同时也造就了后来群众造反运动的广泛社会基础。1957年和1966年运动结构类似而方向相反，当权派与批评当权派的群众，作为运动动力或者运动对象的角色顺序颠倒而逻辑相似。整群众的1957反右派斗争和整领导人的1966年文革，都反映了领导与群众之间矛盾的存在和激化。同时不能忽视的是，两次运动的发动和领导者都是凌驾在二者之上、具有个人崇拜地位的领袖。

毛泽东在理论上把领导干部与群众的矛盾纳入他的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的理论框架；在实践上，将其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相应地，崇拜毛泽东的群众也把反对所谓走资派、资产阶级司令部的“文化大革命”，当作反对官僚主义压迫、铲除官僚特权、争取平等公正的理想社会的斗争。这一点在当时群众的出版物中有不少反映。例如一篇北京市中学生的文章写道：“劳动人民及其领导者与特权人物之流的惊心动魄的阶级矛盾是任何人也无法回避的。”“一方面是广大劳动人民及其领导者——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另一方面是特权人物，他们的社会基础及卫道士联动之流——构成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之间殊死的搏斗，构成了这次文化革命的矛盾双方。”^①

观察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矛盾时还必须指出问题的另一面：群众与领导干部之间的分离和对立不是泾渭分明、势不两立的。在造反派产生的同时，群众当中也出现了被称作“保守派”的维护领导的政治势力。这个派别的核心是群众中靠近领导、与领导有较多利益关系、在各单位的工作和运动中受器重被依靠的人，如党员、劳动模范、先进人物、积极分子等。他们在运动的最初三四个月里，往往受到领导的信任，参与或者协助了对另外一些群众的批判斗争。这说明，当时中国新的社会分化并非壁垒分明。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在工农群众中保持着广泛的联系和影响。

群众与领导层的矛盾及其激化，是毛泽东调动亿万群众的政治参与热情，形

^① “赤潮”：《驳“联动”反动的政治理论——联动思潮批判之一》，首都中学红代会新四中公社主办：《新四中》报，1967年5月17日。

成大规模群众运动的社会条件，但是在运动处于次要和从属的地位，被纳入党内斗争的轨道。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其原因有三：

其一，群众与领导层的社会矛盾的发展以及人们对它的认识尚处于初期阶段。文化大革命直接起源于党内斗争，而不是社会矛盾的尖锐。从新中国的成立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7年，从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到“文化大革命”只有10年。旧中国社会政治矛盾的影响尚未退去，人们对新制度、新矛盾的体验和认识刚刚开始。1966年文革开始时，国民经济走出严重困境不久，人民的生活正在逐步恢复和改善，群众与领导的矛盾没有尖锐到导致政治运动的地步。所以一般群众既不满领导的官僚主义压抑、特殊化、特权等弊病，又真诚地对领袖、对共产党寄予希望，在思想上易于接受以旧制度阶级关系解释新制度社会矛盾的观点，以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解释社会主义制度下新的社会矛盾。

其二，毛泽东个人崇拜的盛行。毛泽东的思想，包括他的晚年思想，经过多年的宣传和灌输已经深入人们的头脑。群众相信毛泽东的正确性，习惯于在他的思想框架内寻求扫除社会不公正，创造理想未来的出路。退一步说，在思想封闭的社会环境下，普通群众除了毛泽东的思想，也很难找到其他思想武器。因而，不论当时群众中不同派别之间的冲突如何激烈，他们，包括造反派，在思想上都是毛泽东思想的追随者。造反派只是更多地接受了毛泽东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理论。

其三，领袖、领导干部和群众的矛盾关系。当时的社会政治结构形成了具有个人崇拜的领袖毛泽东、各级领导干部、普通群众三个层次。毛泽东被神化为共产党的化身，不仅高居于群众之上，而且凌驾于党的领导集团之上。他通过这个领导集团实现对党和国家的领导，又要能够驾驭这个集团。事实上，对毛泽东的政治挑战主要不是来自党外，而来自党内，尤其是党的高层领导。领导干部集团在毛泽东之下，实施对国家的治理。他们对上已经不能控制自己的领袖，对下则不可避免地与群众存在矛盾。普通群众与毛泽东的关系是抽象的，而与领导干部的接触是具体的。按照当时的宣传，群众习惯于相信毛泽东英明伟大，而问题出在下面的领导身上。在对领导干部集团的不满这一点上，毛泽东和群众容易找到共同点。这种社会政治结构与中国传统的皇权、官僚、百姓三层结构有很大的相似性。皇帝是国家和人民的主宰，官僚是由皇帝选派为皇帝统治天下的，百姓是

整个社会的基础。皇帝最要紧的是能够驾驭官僚。王朝倾覆的威胁主要来自官僚的失控，不论是地方豪强坐大篡夺皇位，官僚腐败导致边防松懈外敌入侵，还是官僚腐败欺压造成“官逼民反”。而百姓一般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文革中的现象与历史有着政治文化的相似和继承性。

在分析社会矛盾的时候应当指出：“造反派”的主流不是要造毛泽东和共产党的反，也不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制度、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党的领导；相反，他们是要保卫毛泽东和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造反是要跟着毛泽东造压抑他们的党政领导人的反，站在毛泽东一边，冲击刘少奇和党政领导体系和当权派。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深深结怨于党政领导人，在文革后被当作重点清算对象。

造反派群众在文革最初的四个月、在要求平反及批判血统论的活动中曾经是官僚压迫的受害者和反抗者，也有着某些朴素的民主愿望。但是反抗专制压迫的运动不等于民主运动。造反运动响应毛泽东的号召而起，理论上追随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在实践上充当共产党党内斗争的工具，与现代民主南辕北辙。造反派热烈拥护并寄予厚望的“大民主”，后来虽然写入了宪法，但也仅仅是写在纸上而已，实践中它只是发动群众的手段，而没有形成保护人民群众监督领导的民主制度。

毛泽东利用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社会性矛盾，发动群众造反运动为他的党内斗争服务，但是造反运动并不是总有利于党内斗争需要。例如：在地方的造反派兴起以后，军队机关的造反派也活跃起来。解放军后勤部、海军、空军机关及其所属文化单位的造反派群众批判、冲击了本系统的邱会作、李作鹏、吴法宪等领导人，其原由和行为方式与地方造反运动并无两样。但是上述领导人是林彪倚重的干部，在权力斗争方面属于林彪系统，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无产阶级司令部”为了党内斗争的需要，在这些单位压制了造反派，支持了保守派。另一个相似的事例是担任广州军区司令员的黄永胜与广东造反派的关系。黄永胜作为地方大员，他的政治情感与其他官员并无二致，合乎社会矛盾的逻辑，他在“支左”中支持了保守派，而不是造反派。但是由于黄永胜在党内斗争的营垒中属于无产阶级司令部副统帅林彪，广州造反派就不得不受些委屈。中央在处理广东问题的时候也不得不在造反派和黄永胜之间搞平衡。

毛泽东利用了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但是社会矛盾毕竟不同于党内斗争。文化大革命的领导者在实际运动中必须十分审慎，防止以党内斗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革命”演化成变革基本社会关系的社会革命。他们一方面放手给予群众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连、游行集会、成立群众组织、出版报刊等“大民主”权利，另一方面，对运用这些权利的范围、时间以及政治方向予以限制和引导；对于群众中越轨的言行予以批判、制止，甚至取缔、镇压。例如：批判一些造反群众提出的“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口号，以维护毛泽东和中央的领导权威；拒绝某些工人的经济要求，以保持政治运动的基本性质；取缔临时工、合同工和其他群众的全国性组织，以防止群众组织向政党演变；批判群众中的“极左思潮”，以保证中央战略部署的实现和在政治、思想上的领导权等等。当时被批判的“极左思潮”的重要观点之一，就是把几乎全部领导干部当作官僚阶级予以否定，并号召社会革命，建立没有官僚的“中华人民公社”^①。

毛泽东的原则是利用社会矛盾为党内斗争所用而不是相反。因此，当党内斗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需要重建秩序的时候，就逐步采取措施，直到派出工宣队、军宣队进驻学校和文化单位，停止了群众运动。在“清理阶级队伍”，特别是“清查五·一六”运动中，大批的造反派头头和群众再次被整，遭到兔死狗烹的命运。

文化大革命的中心舞台是城市，城市的社会矛盾主要发生在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和工人三个社会群体之间。在正常社会条件下，领导干部掌握权力处于社会的最上层；知识分子参与管理，但是政治地位不及工人；工人名义上是领导阶级，但是经济收入和实际社会地位不如知识分子。在需要进行针对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时，当政者就倾向于动员工人群众的力量，形成领导干部和工人的联盟，如在1957年反右派运动和1968年以后对知识分子的批判。在对抗领导干部的政治运动中，往往会出现反对派知识分子和工人（及其他市民）的联盟，如1966—1967年的造反派群众运动和1989年的政治风波。

结 语

在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存在着执政的共产党的党内矛盾、领导

^① 《中国向何处去？》（长沙，1968年1月6日），见（广州）工革联印刷系统委员会《广印红旗》编辑部：《广印红旗》，1968年3月。

层与知识分子的矛盾、群众与领导干部的矛盾。在历史上，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斯大林大清洗那样的依靠秘密警察进行的残酷党内斗争，中国1957年反右派那样的领导层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整肃，1956年匈牙利事件、波兰团结工会运动那样的群众与共产党领导当局的激烈冲突。而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上述三种矛盾在毛泽东引导下奇特的组合。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调用运动初期被激化的群众与领导的矛盾，为他打倒党内政敌所用，发动大规模的群众冲击领导的造反运动，甚至不惜暂停共产党基层组织的活动。同时为了集中力量冲破阻力，暂时搁置对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的批判，吸引青年知识分子加入对党内当权派的斗争。在完成党内斗争的主要任务之后，毛泽东重提对知识分子的批判，继而拆散了知识分子和工人的造反联盟，结束了群众运动。毛泽东成功运用政治谋略得到了战术的胜利，但是造成了巨大的政治和社会创伤，先后失去了党内和党外的人心，铸成了他的一生不可挽回的失败。

作者说明：此文初稿于1996年，《东方》杂志作为“文革研究专集”中的一篇文章已经排印，但是不准出刊。《东方》杂志不久被迫停刊，文章没有发表。论文部分内容应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的《中共党史研究》之约，以《“文化大革命”中的社会性矛盾》发表于该刊1997年第2期。此后又修改于2001年，发给日本庆应大学国分良成教授，翻译成日文。2003年3月发表于国分良成主编的《中国文化大革命再论》（日文），庆应义塾大学出版会。至今没有以中文发表过。

2014-4-3

【专稿】

北京大学文革研究的意义与现状

舒 声

北京大学是文革的发源地与重灾区之一。1966年6月1日，毛泽东批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了聂元梓等人写的第一张大字报，从此点燃了文化革命的烈火。文革初期，北京乃至全国的师生、群众，纷纷到北大取经，北大的学生也到全国各地煽风点火。文革中，北大被说成是“池深王八多”的反动堡垒，广大干部、教师和学生，在工作组、校文革、工宣队和军宣队的不同时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和打击，非正常死亡近70人，数百名干部、教师被打成“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和“牛鬼蛇神”，关入劳改大院强迫劳动，一批学生被打成反革命子、反动学生，近万名学生停止学习2—4年，耽误了学业，最后以接受再教育的名义分配到农场、农村、边疆、矿山等艰苦的环境从事非专业的劳动。1968年3月，北大爆发了长达4个月的武斗，3名无辜学生死亡，受伤者数百人，大量教学和生活设备遭受破坏，甚至影响了公共交通和周边居民的正常生活。1969年后，1000多名干部教师 and 家属被驱赶到血吸虫病灾区江西鲤鱼洲劳动，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文化革命的10年，是北大100多年历史上最不正常、最黑暗的时期。

北大文革历史研究是北大历史研究的一部分，也是全国文革历史研究的一部分。探明北大文革历史中重要事件、活动的真相，对北大文革产生的背景、原因和影响进行分析研究，并不是要追究某些当事人的责任，也不是要判断当时两派群众组织的是非对错，而是为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避免类似文革这样的灾难再次发生。同时，把北大文革当作一个样品进行解剖，对于全国文革历史的研究，也具有非常重要的典型意义。

近些年来，北大文革历史研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首先，1998年北大百年校庆时，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原党委书记王学珍等主编的《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其中1966—1976年文革时期的记述，相当详细，2008年该

书又进行了修订，可作为北大文革研究的基础资料。其次，北京大学图书馆对收藏的文革时期的报刊杂志、大字报选、动态报、传单等资料，进行了整理和分类编目，该工作已经完成，印红标教授参与了这项工作。第三，部分校友，包括文革时期的干部、教师和学生，通过回忆录等方式，出版或自印了部分书籍和资料。

以下是笔者收集到的部分有关书籍和资料的目录：

1. 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2. 《聂元梓回忆录》，时代国际出版有限公司（香港），2005年
3. 王友琴：《文革受难者》，开放杂志出版社（香港），2011年
4. 季羨林：《牛棚杂忆》，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
5. 周一良：《毕竟是书生》，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年
6. 杨炳章：《从北大到哈佛》，作家出版社，1998年
7. 杨 勋：《心路——良知的命运》，新华出版社，2004年
8. 陈平原主编：《鲤鱼洲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
9. 温儒敏主编：《北京大学中文系百年图史》（1910—2010），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
10. 丛璋、亚达、国真：《燕园风云录（一）》，2012年，自印本
11. 丛璋、亚达、国真：《燕园风云录（二）》，2013年，自印本
12. 陈一谔：《陈一谔回忆录》，新世纪出版社（香港），2013年
13. 奚学瑶、张从、孙兰芝主编：《告别未名湖》，九州出版社，2013年
14. 杨邦俊：《毋庸讳言》，华夏文艺出版社，2013年
15. 郝斌：《流水何曾洗是非》，大块文化出版社（台湾），2014年

以上书籍中，大部分是经历过文革的北大人的个人回忆，大多记录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其中文革中声名显赫的聂元梓，在回忆录中披露了一些鲜为人知的事实，有一定的参考价值。但由于她极力为自己洗白和辩解，出现了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记述，受到一些知情者的指误。季羨林和郝斌对牛棚的回忆真实地记录了被关押在劳改大院里的干部、教师受到的非人虐待。丛璋等人的《燕园风云录》（1—2）收集了分散于报刊和网上的60余篇有关北大文革中重要事件和人物的回忆，内容比较全面。

此外，一些对北大文革历史有亲身经历和了解的老干部，例如李雪峰、彭珮云、吴德、张承先等，也在他们的回忆录或专门撰文中，记述了有关北大文革的内容。

另外，近年来，随着网络信息的发展，很多人利用网络工具发表、收集有关北大文革研究的文章和资料。例如国真创办的《闽海网·华声四海》中刊登了大量有关北大文革的文章，胡宗式在博客中发表了多篇关于北大文革历史的文章。奚学瑶、张从、张曼平、李橦、田建行、臧振、颜品忠（已故）等都在网络上发表了回忆和评论文章。

此外，据笔者所知，部分历史系的校友正在收集整理北大文革史料，预计第一集（60万字）在今年有望出版。

但是，总体来说，北大文革史的研究，还处于相对落后的状况。主要表现在：

1. 研究力量薄弱，人员分散；
2. 缺乏全面系统的研究成果；
3. 原两派组织（新北大公社和井冈山兵团）的头头没写出自己的回忆录；
4. 北大文革中一些重要事件的内幕还没有搞清楚。

当前研究工作的主要困难是：

1. 缺乏文革史料，文革时期的档案、资料查阅困难；
2. 一些重要的当事人，如陆平、孙蓬一、牛辉林已经去世；尚在的也年老体衰，不能动笔；
3. 原两派组织的成员观点差距大，不能坐在一起共同研究；
4. 缺乏研究经费。

为了推动北大文革历史研究工作的进行，笔者建议：

1. 熟悉北大文革历史并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校友组织起来，建立研究队伍，吸收原两派的人员参加；
2. 制定研究工作计划，重点放在北大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上；
3. 采用收集书面资料和采访当事人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特别注重口述历史；
4. 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争取企业家校友的赞助。

对北大文革进行回顾、研究与反思，是我们这一代人不可推卸的责任。让我们昭续北大传统，各尽所能，捐弃前嫌，以残年之余热，留青史以真面。

【述 往】

文革中的周培源与季羨林

——他们为什么要参加“井冈山兵团”？

舒 声

文化革命前，周培源是北京大学副校长、党委委员、校务委员会副主席、教授；季羨林是东语系主任、校务委员会委员、教授。文革中的1967年，他们几乎同时加入了反对聂元梓一派的群众组织——井冈山兵团。这两位著名的学者为什么会参加这个群众组织？他们在井冈山兵团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先说周培源先生。

在1964—1965年的社教运动中，周培源对陆平的工作作风是有意见的，也向周恩来反映过对陆平的看法，认为陆平把北大搞乱了。1966年5月25日聂元梓写出第一张大字报时，周培源正在筹备国际物理讨论会，对聂元梓大字报是持支持态度的。文革开始后，由于周培源在社教运动中的表现，北大群众没有把他划到“陆平黑帮”的圈子里，但由于他身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烙印，也没有把他当成“左派”而选入校文革领导班子。他的主要工作是分管北大汉中分校即“653”的工作。1966年8月，聂元梓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赶走了工作组，成为北大“校文革”的主任，北大成了她的一统天下。北大汉中分校受到当地造反派的干扰，工作遇到困难，周培源从汉中回到北京，向聂元梓汇报情况，聂对此却毫不关心，十分冷淡；过了些天，周培源陪同柬埔寨王子访问北大，聂元梓又推说有事，不予接见，让外宾去参观《北大文革展览馆》，又遇到铁锁把门，吃了闭门羹。周认为聂元梓对工作不负责任，对外宾不礼貌，很有意见。

1966年12月14日，周培源出于对北大运动的关心和帮助聂元梓改正工作作风的愿望，写了一封《致聂元梓同志和校文革全体常委的公开信》，就汉中分校的运动、聂元梓在外事活动中的表现以及对不同意见的群众的态度，提出了一些温和善意的意见。在信里，还提到了被划为“陆平黑帮分子”的段学复、黄昆、麻子英、刘雯等干部，“只是说了一些错话、犯了一些错误”，“但不是黑帮，不

是三反分子，应该解放他们，和群众一起参加运动”。可是聂元梓此时正骄横跋扈，不可一世，丝毫听不得半点不同意见，反而认为周是反对校文革，为黑帮翻案。

1966年底到1967年初，北大陆续出现了一些反对聂元梓和中央文革的群众组织和个人，如“井冈山”、“红联军”、樊立勤、杨勋、杨炳章等，“校文革”中聂元梓的战友孔繁（第一副主任）、杨克明（委员、新北大主编）等也站到聂元梓的对立面。聂元梓在江青等人的支持下，残酷地镇压了反对她的组织和个人，有的被抓进监狱（杨勋、杨炳章），有的被迫害致死（如沈达力），孔、杨被开除出“校文革”，被打成反革命和受到批斗的学生有200多人。1967年2月15日，在聂元梓和“校文革”的直接策划下，成立了《新北大公社》，成为支持聂元梓的群众组织。

1967年4至5月，北大反对聂元梓的势力日渐活跃，“东方红公社”、“红旗飘兵团”、“井冈山公社”陆续成立。6月5日，陈伯达在北大讲话，严厉批评了聂元梓，“新北大北京公社”、“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相继成立，形成了反对聂元梓的5大团体。7月1日，以周培源为首的134名干部发表了《致革命师生和革命的干部的公开信》，明确表示：“3月份以来，校文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红旗飘、北京公社和新北大公社革命造反总部的大方向是正确的，我们支持他们的一切革命行动”，表明他们已经否认了聂元梓的正统领导地位，站到了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一边。

1967年7至8月，反聂的5个群众组织酝酿联合。虽然这些组织都以反聂为共同目标，但各个组织的具体观点有很多分歧，北大当时也没有一个有声望有能力的学生领袖能够为各个组织所接受，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于是，5个组织的头头不约而同地将目光凝注在德高望重的周培源身上，认为只有他才能被5个团体共同接受，只有他才能和聂元梓抗衡。富有正义感和责任感的周培源也接受了大家的意见，同意出任新组织的领导人。1967年8月17日，五方联合的“首都红代会新北大井冈山兵团”召开成立大会，大多数高校的红卫兵组织都派代表参加并致贺词（包括清华井冈山、北航红旗等），周培源任勤务组组长，勤务组成员有孔繁、杨克明、郭罗基、侯汉清、牛辉林、徐运朴、陈醒迈、胡纯和、谢纪康等。在周培源的影响下，又有著名教授侯仁之、周一良、赵宝煦和原党委副书记

兼副校长戈华等陆续加入到反聂的群众组织里。

周恩来得知周培源加入群众组织的消息后，派人传达了意见，劝说周培源退出，周培源接受了周总理的意见，不再担任井冈山的领导职务，但有时仍出席有关会议。聂元梓为了搞垮井冈山，暗中组织了“周培源专案组”，内查外调，罗织罪名，企图把周打成“美国特务”，并准备把周抓起来。此事被新北大公社中同情周培源的学生得知，提前给周通风报信，井冈山兵团及时把周接进总部所在地28楼，保护起来。北大发生武斗后，周悄悄离开北大，住到女儿家(军队大院)。1968年8月工宣队、军宣队进校后，又把周培源当成清理阶级队伍的审查对象，直到1969年3月，8341部队进校后，才把周培源解放出来。9月27日，北大革命委员会成立，周培源任副主任。1978年，周培源任北京大学校长。

再说季羨林先生。

1965年秋天，季羨林到昌平南口参加农村社教，担任工作队副队长。1966年6月4日接到通知，返回北大。由于他只是个系主任，在党内没有职务，所以直到1967年春季，并没有受到多大冲击，只是因为写过一篇“春满燕园”的散文而被批判，按人民内部矛盾对待，还参加了一些接待外地红卫兵、游行示威以及到农村劳动等活动。到了1967年春夏之交，北大两派斗争日趋激烈，两派组织都在拉拢干部和教师，以壮大自己的队伍。季羨林也成了两派拉拢的对象。

季羨林在《牛棚杂忆》自序中写道：“如果我安分守己，老老实实的话，我本可以成为一个逍遥自在的逍遥派，痛痛快快地混上几年的。然而，幸乎？不幸乎？天老爷赋予了我一个犟劲，我敢于仗义执言。如果我身上还有点什么值得称扬的东西的话，那就是这一点犟劲。不管我身上有多少毛病，有这点犟劲，就颇值得自慰了，我这一生也就算是没有白生了。我在逍遥中，冷眼旁观，越看越觉得北大那一位‘老佛爷’倒行逆施，执掌全校财政大权，对力量微弱的对立派疯狂镇压，甚至断水断电，纵容手下喽罗用长矛刺杀外来的中学生。是可忍，孰不可忍！我并不懂得什么这路线，那路线，然而牛劲一发，拍案而起，毅然决然参加了‘老佛爷’对立面的那一派‘革命组织’。”^①

季羨林加入井冈山，也受到了周培源的影响。在《记周培源先生》一文中，季羨林写道：“领导新北大的是那一位臭名昭著的‘老佛爷’，打出江青的旗号，

^① 季羨林：《牛棚杂忆》，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第3—4页。

横行霸道，炙手可热。她掌握了全校的行政大权，迫害异己。我与此人打过多年的交道，深知她不学无术，语无伦次，然而却心狠手辣，想要反对她，需要有一点牺牲精神。出乎我的意料，又似乎是在有意料之内，周培源先生也挺身而出，而且干脆参加了反‘老佛爷’的组织，并且成为领导成员。在这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在私下见过周先生。他为甚么这样做，我毫无所知。只记得北大两派在大饭厅（今天的大讲堂）中举行过一次公开的辩论，两派的领导都坐在讲台上。周先生也俨然坐在那里，还发了言。他的岁数最大，地位最高，以一个白发盈颠的老人，同一群后生坐在一起，颇有点滑稽。然而我心里却是充满了敬意的，周先生的一身正气在这里流露得淋漓尽致。”“我呢，我也上了牛劲，经过长期的反复的考虑与观察，抱着粉身碎骨在所不辞的决心‘自己跳了出来’，也参加了那个反‘老佛爷’的组织。这一跳不打紧，一跳就跳进了‘牛棚’，几乎把老命赔上”。“我不想在这方面做什么检查。我一生做的事满意的不多。我拼着老命反‘老佛爷’一事，是最满意的事情之一，它证明我还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人，不是一个贪生怕死的胆小鬼。”^①

季羨林参加井冈山兵团后，当上了第九纵队（东语系）的勤务员，这在当时以学生为主体的群众组织中也是少见的。由于他参加了和聂元梓对立的组织，不久就受到了聂元梓和新北大公社的打击迫害。1967年11月30日的深夜，新北大公社派人抄了他的家，之后又遭受多次批斗、审讯，并被罚天天劳动。1968年5月，被押送到十三陵附近的太平庄批斗劳改。一个月后又被送回学校，在外文楼和民主楼后面的平房修建“牛棚”，并住了进去，每个屋子20人左右，每个人只有容身之地，睡在直接放在地下的木板上。一直到1969年的元旦，才回到自己的家中。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周培源和季羨林作为“学术权威”和老教师的代表人物，在文革中参加了北大反对聂元梓的群众组织，并且还当上了校系两级的负责人，与北大的历史背景、当时的形势、周、季二人经历、性格和他们对聂元梓政治品质的认识都有密切的关系。

^① 季羨林：《季羨林谈师友》，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第114—117页。

【述 往】

文革期间北大的殷文杰同学被刺致死事件

胡宗式

殷文杰是北大无线电系62级学生，北大井冈山兵团15纵“过大江战斗队”的成员，1968年4月27日遇刺身亡。他的死完全是无辜的，是非常不幸的。

从1968年3月29日开始，北大校内的两派开始武斗，双方抢占一些重要的楼盘，以使自己处于有利的地位。在4月24日前，井冈山兵团已经占领了28、30、32、35、37楼。35、36楼是女生宿舍，36楼在35楼和37楼之间。如果占领了36楼，井冈山兵团就可以把占领区连成一片，因此36楼的战略位置很重要。4月25日，井冈山兵团突然袭击，把楼内新北大公社的人赶出去。4月26日，新北大公社组织力量想夺回36楼。井冈山兵团把通往2层的楼梯用家具堵死，死守二层。由于井冈山方面居高临下，占据主动。新北大公社的人虽然进入了一层，但没有办法攻上二层。这次武斗，新北大公社吃了大亏，许多人受伤，气氛很是压抑。

27日上午10点左右，殷文杰从他住的42楼出来（当时一些楼仍然是两派混住）从南向北走。当他经过新北大公社总部所在的44楼时，不知道是谁喊了一声：“他是‘过大江’的！”（“过大江战斗队”是对立派比较有名的战斗队）新北大公社钢一连的杨恭谦和高玉堂（当时我不认识他们，名字是后来知道的），此时正拿着长矛在44楼门口，听到喊声，他们便拿着长矛跑上去拦住殷文杰，殷文杰转身向后跑。这时一人（可能是杨恭谦）上来用长矛刺殷文杰，接着另一人也上去刺。当时我与同组的章铎（生物系三年级女学生）正和人大“三红”动态组的盛学韞（人大的女教员）在附近谈话，距离事发地约20余米。当时44楼附近的人不多，我眼睛的余光看到殷文杰走过来，被拦住。见刺了第一枪后，我立刻跑过去进行拦阻。我一边用手抓住枪尖（枪尖对着我的肚子），一边喊：“不要！”我抓住了一个人的枪尖，但另一个人又刺，我又去抓他的枪尖。我和在场的章铎等人对此行径都非常愤怒，真不明白有些人为什么会那样疯狂。殷文杰身上被刺了许多枪后倒在地上，这时凶手停止了刺杀并喊了一声：“滚蛋！”殷文杰挣扎着爬起来，奔到44楼北面小树林里又倒下。此时我见他口吐白沫，呼吸困难。校医院离44

楼很近，校医很快赶来了，给殷文杰打了一针强心针。随后众人把殷文杰抬上汽车（130型）。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黄元庄让我护送殷文杰到七机部721医院（五棵松附近）抢救。我怕汽车颠簸，就坐在车厢底板上，把殷文杰的头放在自己的腿上，一路上抱着殷的头。汽车走海淀直达五棵松的路，此路车少，又是最近距离。当时721医院是七机部的“915”掌权，和新北大公社的关系很好。

到了721医院，大夫一看瞳孔，立即抢救，先是按胸做人工呼吸，后作了开胸的心脏按摩。医生的技术很高，三刀就露出心脏。我在旁边看着，知道这件事的严重性，盼望医生把殷文杰抢救过来。听到医生说“不行了”，我眼前一黑差点晕倒，护士把我扶到外边，让我坐在长椅子上。人刚送来时，我没有告诉医院殷文杰是对立面的，说是新北大公社的人。护士说：“这么凶残，把人扎成这样。”我听着心里很不是滋味。下午，我再去医院，对上午没有告诉殷文杰身份一事，向院方表示歉意。他们说：“医院有救死扶伤的义务，不计较他是哪一派的。七机部当时也面临武斗形势，尸体放在这里不安全，万一叫对立面知道不好办。你们尽快把尸体领回去。”我取回诊断书（上面写着39处伤口）。晚上我们把尸体拉回来，放在员工食堂后面的小屋里，第二天找了一些冰放在里面。

在新北大公社总部附近的马路上，黄元庄、我、保卫组的谢甲林商量给死者家属发电报的事情。谢说：“以前有过这样的情况，家里一见死亡的电报，就会出个好歹，所以发电报不要说死。”28日上午发出电报，说是重伤（具体办的人是谁，记不得了）。原以为家属两天能来，黄元庄说：“家里来人在这里哭得死去活来，不好办。还是到火葬场去哭，然后火化。”

29日一大早，我、曹广志和后勤的蔡师傅送尸体到东郊火葬场。我们来得很早，比他们上班时间早一个多小时。在等待时，我翻看了前一天的火化记录，有60多人，正常死亡的约一半，非正常死亡的有车祸和自杀。我选了一个最贵的骨灰盒（200多元），从学校拿来一套新棉衣准备给殷文杰穿，好遮住他身上的血衣。曹广志见了死人非常害怕，不敢靠近，我让他到外面去，蔡师傅和我给殷文杰穿上衣服。停尸房里有个一小间，停放着两个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房里有冰。我们和火葬场管理员说好把殷的尸体先停在那里，等家属明天来。我们没有交冰钱，火葬场也没有要。30日中午，家属没有来。火葬场几次打电话催问，要火化。我打电话给上海殷文杰的家属，一是请他们来，二是谈尸体火化。起初家属（殷文

杰的姐姐)不同意火化。我说“五一节”火葬场要清理,不给保留尸体了,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后来家属同意了。我随即通知火葬场,火化尸体。大约过了2个小时左右,他姐夫来电话又说不同意火化。我告诉他已经通知火葬场火化了。

井冈山方面很快得到殷文杰死亡的信息,他们不能确定凶手是谁,便把矛头对准我,因为我可能是现场一般人能认识的人。他们在广播中说:“反革命小丑、杀人凶手胡宗式”。至此以后,为防意外,我一般不再外出。

事后新北大公社总部责成我、黄元庄、陶威信(教员,哪个系的不记得了)组成一个调查组来调查处理这一事件。我和黄元庄到“钢一连”(44楼2楼),把两个凶手找来。他们知道闯了大祸,很是懊悔。在44楼2楼找了一间屋子,和他们谈话,我让他们写过程和检查,材料写好后交给我。当时在刺杀现场的两个人也写了材料(具体是谁,不记得了)。这些材料都作为附件,放在调查报告的档案袋中,留在公社总部,并一直留在学校。调查报告的草稿是我写的,经魏杞文修改后我又重抄了一遍,聂元梓在上面批示“认真调查,严肃处理”。我在聂元梓家里(佟府丙8号,在第二体育馆附近)说到抓凶手的问题,聂元梓同意抓。不久,在新北大公社总部委员和战斗团长的会议上(地点在临湖轩),聂元梓说:“关于殷文杰死亡一事,调查完毕了,大家看怎么处理。”只有一个团长说应该交出凶手,大多数人反对交出凶手。有的说:“我们不干了!让你们这些老爷去打吧!”等等。这样吵吵了一阵,没有结论就转入下一个问题的讨论。

死者的哥哥殷文豪和他的表妹,5月中旬来校。他们先到井冈山兵团驻地给我打电话,要我们保证他们的安全。我请他们从西校门进来,在办公楼的一间房子,我和黄元庄接待了他们。在当时的条件下,我从派性出发,采用一些诡辩的方法来对待家属提的问题。殷文豪说:“这是一起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我说:“你有你的看法,我们有我们的看法。”又问:“是不是武斗中死的?”我说:“是在武斗的环境中死的。”家属追问凶手,我说正在追查中。家属来之前,我问黄元庄如何处理。黄说,多给家属一些钱。但是在和家属谈话的过程中,他们只是提抓凶手,不提赔偿问题,我也不好提此问题,家属只是拿出车票要求给报销。

我在处理殷文杰事件中,也想为凶手减轻一些罪责。我和凶手谈话时,高玉堂说:“我们叫他站住,他转身就跑。”我说:“你就说喊了一声站住。”这句话是否写在调查报告之中已不记得了。

1971年清查5·16时，军、工宣队把我押回学校审查。专案组以殷文杰事件为突破口对我施加压力。在审查时，我写的关于殷文杰事件的材料中，有两个细节和军、工宣队掌握的不一致：一是在4月30日我给上海打电话，与家属通话，说火化的事。由于火葬场多次来电话，说五一节前尸体要火化。我对家属说：“明天是五一节，火葬场不给保存尸体，你们要尸体没有什么用。”他姐姐同意了火化，而后来他姐夫又不同意火化。他姐夫给工宣队的证明中，否定了家属曾同意火化。军、工宣队说我说的假话；第二，是军、工宣队说送721医院前人已死，校医院的大夫给工宣队开的证明是这样的。可是同一大夫，当时给我的证明是心跳微弱，当场还打了强心针，我是亲眼见的。在当时我并没有认为人已死。军、工宣队说人已死了，送医院是做样子。他们以这两件事为由，说我不老实、顽固，根本不许我在会场上讲话。我一开口，他们就说：“你还狡辩！”并强迫我承认我是杀人凶手。我说：“我是救人的！”专案组的李秀蕊（女，教员）说：“你是救人的？救人的，人怎么死了？”他们还要我承认聂元梓是杀人凶手，让我交待聂元梓、孙蓬一如何指使的。专案组副组长庄逢源（教员）说：“杀人凶手难道就要亲手杀人吗？蒋介石亲手杀人吗？他是不是凶手？”我当然不能说蒋介石不是凶手。他们说：“包庇杀人凶手的就是凶手。”最后他们宣布：“你在这个问题上已经没有发言权了。这个问题算揭发，不算交待。别的问题你自己想想吧。”

搞这个问题，就是要在精神上打垮我，要我承认聂、孙是幕后指使者。想在精神上打垮我之后，使我承认是“5.16”反革命集团的骨干，这是把我押回学校的根本目的。我坚持我是救人的，聂元梓有领导责任，但没有策划、指使问题。

文革中杀害三名无辜青年，是我所在的组织“新北大公社”最丑陋的一面。杀害殷文杰的凶手，在1971年左右受到处理。对于杀人凶手，理应追究其责任。追究杀人凶手是个法律问题。我们在总结这些事件时，不能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上，更应反思的是：在北大、在北京、乃至全国，发生那么多迫害人、打死人事件，这是为什么？几十年来共产党教育我们：以阶级斗争为纲处理各种问题，分歧就是路线斗争，路线斗争就是敌我矛盾、就是你死我活。在解放以后的历次运动中，把自己的同事、同学当作敌人是经常发生的事。在人们的头脑中，在宣传的层面上，根本没有民主、法制、人权的概念。殷文杰事件也是新北大公社的领导和群众没有法制和人权概念的例证。

【述 往】

一个普通学生的北大文革记忆

李 樟

一、受命造反

1966年，世界出了几件大事：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第四届总统。日本人口破亿，圭亚那共和国成立，英格兰在第八届世界杯夺冠。和那一年在中国发生的山呼海啸比起来，这些只算是“毛毛雨”。

5月25日，一声惊天炸雷，北大贴出第一张大字报，点燃了全国大乱的火种。

6月1日晚8点，中央电台广播了大字报，加上人民日报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一遍又一遍，杀气腾腾，充满火药味，让人心惊肉跳。当时我正在石景山公社模式口大队搞四清。我们化学系63级（编号0363）学生1965年11月2号下乡，分散在北京郊区四清工作队，归地方领导，各自为战，预计一年。北大似乎正渐行渐远。这时我才想起自己是个北大人，学校出了大事。第二天就接到紧急通知，收拾行装，火速启程，赶回学校。

阔别的校园，今非昔比，覆地翻天。过去的祥和宁静无影无踪了，空气里都弥漫着令人激动不安的革命气氛；过去小说里、电影里看到的暴风骤雨，来到了我们的生活里。

聂元梓等哲学系7人的大字报早没了，据说当天就被一大堆反对的大字报糊上了。如果那时有人有远见，保存下来，就是国家级文物。8·18毛接见红卫兵时，北大学生抬着大字报做成的巨大模型，走过天安门。5·25一周年时，有人马后炮，重抄一遍，搞个山寨板，金边包装，原处张贴。那时北大派战烽火连天，我也没去捧场。

围绕这张大字报是否有后台指挥，黑手策划，人们争论不休。我个人认为，合理的逻辑是，聂元梓从内线得知彭真倒台了，打倒陆平不过是一场借机报复、稳操胜券的赌注。而毛当时正要下一盘大棋，苦于找不到缺口，这张大字报如雪中送炭，正中下怀，带来了新思路，那就是到下层找依靠力量，用自上而下的直

接发动，进行自下而上的政治扫荡，于是批注发表，掀起轩然大波。他应该是利用了这张大字报，而且是心血来潮，点石为金，不像早有预谋。毛自己就说：“我自己也没料到，一张大字报一广播，就全国轰动了，闯了大祸。”

聂元梓在1965年末就给毛写过信，状告北大社教工作组，毛记性好，可能对她不陌生。北大是毛早年当图书管理员的地方，受到过不长眼的人的蔑视，耿耿于怀。可北大人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动辄提那段历史，自我炫耀。说句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话，毛拿北大开刀，也是出了一口恶气。他后来百忙之中不忘嘲弄北大“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可怜的北大人，受了羞辱还要跟着喝彩，不以为耻反以为荣。

毛轻易不夸人，却对聂这张大字报吹捧得离谱，拔高得过头，流露出按捺不住的兴奋。“何等好啊”，“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宣言”，让人如坐云端雾里，不解其中味，连聂自己也莫名所以。

大字报播发的直接结果，是永载史册的北大5年停课。我们5届在校学生，一夜之间，投笔从政，变成了“职业革命家”，尽管这决不是我们当年上北大的初衷。书本、讲义、笔记，进了垃圾堆，开会、读报、写大字报，变成正业。大饭厅前的小树林地，是全校运动的中心，建起了一排排苇蓆做的大字报栏。我就在这个饭厅吃饭，它是学校最大的食堂，容纳两千多学生。没有开饭的时候，门外总是里三层外三层的人挤人，个个嗷嗷待哺，敲着饭盆，也是北大一景。周末，常在这里放电影，我们早早就拿着板凳，排成长龙，等候入场。

我一天三顿饭，必过这个大字报区。大字报铺天盖地，目不暇接，一直扩展到附近宿舍的墙面，各个教学楼，其他各个食堂，眼花缭乱，五颜六色，标题醒目，常换常新，内容更是耸人听闻。饭厅东部南部的几个墙面更是宝地，最重头的才往上贴。白天，万头攒动，摩肩接踵，人声鼎沸；晚上，灯火通明，人气不减，像个小小的不夜城。每个人都是如饥似渴，似醉如痴，看，贴，抄，批语，留言。据统计，仅6月1日至6日这6天，就贴出5万份，校外有上万人来观看。

大字报揭发的主要是北大1965年起起落落的社教，同时还有许多彭罗陆杨的罪行。党的高层出这么大的事，太不可思议了。我不知疲倦地抄着，整理出来，寄给家人和老同学，让他们知道这里发生了什么。

据说中国真正的第一张大字报，也是出在北大，也是贴在大饭厅的墙面上：

在1957年5月19日，质疑共青团三大北大代表。反右斗争时期。“右派”先利用了这个形式，接着它又成为反击右派的有力武器。毛大加赞赏，甚至对大字报的历史进行一番考证，说它是“极其有用的新式武器”，“一种革命形式”。

1966年6月2日，北京新市委吴德带领工作组进校，代替党委。成员主要来自文化部、海军总部，最初32人；各系总支垮台后，增加到208人；河北省委书记张承先为首，副组长有康生贤内助曹轶欧、刘仰峤（高教部副部长）、杨以希（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彭林（海军航空兵政治委员）、武振声（中央文办秘书长）、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张承先原是河北大学校长，我们还嫌他级别低。可别以为他没见过大世面，一进校就选中当年司徒雷登坐镇燕京时的宅院，位于未名湖南岸的小山，叫临湖轩（文革中一度改名“解放院”），作为官邸。后来批判他这也是一个罪状：高高在上，脱离群众。

我在办公楼礼堂听过张讲话，一口山东腔，有当官的派头。他对陆平黑帮宣布“三不许”：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此后只闻其声，再不见其人。

搞运动就派工作组，这是共产党的常规武器。北大搞了一年多的社教，就有一个260人的工作组。我们自然而然以为总是毛主席派来的。北大党委烂了，陆平倒了，张承先就代表党。

谁也不会想到工作组背后惊心动魄的斗争。毛不打招呼，突然袭击，播发了北大大字报，天下大乱，一举打破了旧的社会秩序。刘邓按从上到下垂直领导的传统，接着派工作组，纳入党的轨道，维护这个秩序。这一昏招说明他们白跟了主席几十年，毛的思想一窍不通。毛点了火，已是不宣而战，设局下套，然后又当甩手掌柜的，躲在湖南韶山滴水洞里，几顾茅庐也不出。到这份上，来者不善已经是秃子脑袋上的虱子。刘邓也揣摩毛的用意，到头来还是自作主张，派了工作组。说是给毛帮忙吧，显然马屁拍到了马腿上；说是有意制造对抗顶牛叫劲吧，那不就是引火烧身自投罗网吗？

清华的工作组大得多，528人，由时任经委副主任叶林带队，6月9日进校，也是北京新市委派的。王光美在北大6·18事件后心血来潮，趟那个浑水，先当观察员，后成为成员，不用说，直接向刘少奇汇报。北大工作组还用了原北大党委的一些干部，包括副校长戈华，省委常委崔雄崑，他们都是反陆平的。张对运

动并不是事无巨细都管，而是粗放型管理，抓大放小。

虽然我们没见过工作组的大将，运动还是乱中有序进行，没有什么出格的事。党团组织停止活动了，各班的团支部换了一个名称：文革小组。我恰巧在上三年级时被选为0363一班团支部书记，现在顺理成章，当上班文革小组组长。

我们也没有组织多少正规活动，因为上头已经断了线。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几乎每天都有重要文章。毛甩开了庞大的党组织机器，“一竿子插到底”，让老百姓直接听到他的声音。有时也开个小组会，读读报，交流交流，基本是分散活动，三五成群自己干。我记得有几个人从图书馆里找来了鲁迅的书，仿毛主席语录，搞了个“鲁迅语录”，油印成小册子，在校园分发。还写了一个“告全国人民书”之类的东西，介绍北大运动，印了很多份，发动大家寄给亲友、同学。陆平，北大第23任校长，唯一的共产党干部校长，顷刻成了落水狗，死老虎，遭到了史无前例的最凶狠的清算。过去，我们只知道两个“坏校长”：胡适和马寅初。现在这个反动得多，是彭真黑线的人，肯定万劫不复。黑帮、黑组织、黑纪律，已经定了性，都是过去没有过的高调门。我们来不及想，就被大潮卷了进去，跟着起哄架秧子，墙倒众人推，破鼓万人捶，竟然如此众口一辞，同仇敌忾，没有一个公开的不同声音。我自己也是这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还为做不出贡献干着急。难怪老校长“解放”后，不接受采访，不写回忆，他是看透了世态炎凉，伤心啊。

开始，我以为北大出事是孤立的，个别的。它有特殊性，社教与彭真市委搅在一起，跟黑线挂上了钩。别的单位的人来了也就是看看热闹，受教育，回去该干嘛干嘛去。哪知这个典型一树，都来取经，照方抓药，来个见党委就反，有枣没枣先打三竿子，扣帽子，高调门，竟然一打一个准，甚至搞得比北大还凶，黑帮、黑组织就突然遍布了全国。只看到各级领导都是披着羊皮的狼，化装成美女的白骨精，一片片地倒下，哀鸿遍野。

原来，陆平只是老毛那盘棋中一个很小的棋子。这次他要玩大的，别人想都不敢想的大，造共产党内部的反，造中央和各级领导的反，这是一生中最大的赌博，最大的铤而走险。总是给别人扣上反党的帽子，这次他在反党；总是说别人分裂，这次他在分裂。如此惊世骇俗的事，地富反坏不许干，知识分子不敢干，工人农民不愿干，各级干部顶着干。青年学生是最容易被忽悠起来的力量，招之

即来，能战能胜；挥之即去，无怨无悔。

我们这群长在红旗下的青年学生，长期生活在沉闷的、枯燥的、甚至人人自危的政治生活中。历次思想教育运动，带着血腥和恐怖，一次又一次地套紧我们头上的紧箍咒，把我们洗脑成为最缺乏人文精神的一代。我们对中国历史的了解，走了样；我们对世界潮流的认识，变了形。另一方面，我们对毛的崇拜到了疯狂痴迷，顶礼膜拜，神魂颠倒，不讲理智的地步。毛正需要这样一批愚昧而又忠诚的打手。

文化大革命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出现，给我们新鲜，刺激，亢奋，一种发自内心的快感，一种干柴遇烈火的激情，一种受宠若惊的狂热，一种要经风雨见世面的渴望。毛说，过去是三娘教子，现在是子教三娘。以往的运动，都是当权者整下层，随意定罪。现在倒过来了，我们高山仰止的大人物们，轰然倒塌，束手就擒，随我们摆布，被动无助。过去，是他们打着毛的旗号，现在，这个旗子到我们手里了，该我们指鹿为马了。革命竟是这么惬意，轻而易举，零风险，天天都是盛大节日。

北大当了领头羊，带动了全国，可是它自己在这一回合，却只是一场闪电战，迅雷不及掩耳。陆平黑帮不是北大师生打倒的，而是上头抛出来的，不能反抗，不敢反抗。我们的“胜利果实”，是毛恩赐的。没有独立思考，没有充分辩论，没有思想交锋，上来就一边倒，清一色的造反派。我们奉命造反，跟风革命，争先恐后地火上浇油，“再踏上一只脚”。

回想当时的心路历程，“盲从”二字足矣。江青说，她是毛的一条狗，让咬谁就咬谁。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毛指到哪就打到哪，思想解放又蒙昧愚忠，自以为清醒其实满脑子浆糊，表面上造反骨子里跟风。

对于运动，要矛头向上。我们就是不开窍，跟不上趟。张承先有意误导，“唱主角的要扫，跑龙套的要扫，打旗的也要扫”，北大人没有质疑。揭发陆平黑帮我们插不上嘴，于是转而矛头向下。校一级垮了，赶紧收拾系一级的，大鱼捞光了，也要捞点虾。

20个系的党总支书记，19个被冲垮，16个定为敌我矛盾，只有聂元梓一个好人。

我们对系一级的也一无所知，两眼一抹黑，瞎嚷嚷没真货实料。书记王效挺、

副书记文重、黄文一，3年里基本没见过面。只好看教师的揭发，吃别人嚼过的馍，加有点大帽子大口号。老师们揭发不出来有分量的东西，我们就嫌他们有私心，革命性不强。

连教研室一级也受到冲击。我认识有机教研室的党支部书记花文廷，不到三十岁，思想水平高，见地很深。搞四清时，他在公社工作队，我离他很近，常去聊天，有见到“高人”的感觉，五体投地。他也被贴大字报，我迷茫不解，愤愤不平。也有同学主张写政治辅导员关烁娣的大字报，说实在真的是找不出事干逼急了，我认为这是瞎闹，按兵不动，没搞起来。

毛一开始就摆出阵势，重点是解决党内问题，但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老知识分子跟着倒霉。有些文人，本身也是共产党的高官，像邓拓，吴晗，冯定，自然跑不掉。其他知识分子，毛也不忘他们，搂草打兔子，捎带着敲打，1957年后又一次焚书坑儒。不同的是这一次他们没招谁没惹谁，本来就在夹着尾巴做人，还是在劫难逃。

批判老教授，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倒成了我们唯一能联系实际，有劲可使的地方。上学那几年，课业压顶，考试频频，竞争激烈，让我们喘不过气。许多人有不及格，第一年的寒假就有人不能回家，准备补考，还有人留了级。当头棒喝，落差很大，早年的锐气狂气一扫而光。这些苦水，一股脑倒在老师们身上。

分分分，学生的命根；考考考，老师的法宝。最让人胆战心惊的是一年级华彤文老师的无机化学，第一堂课第一句话，她就说：“学习像大海游泳，有力气的游到对岸，没力气的就会淹死。”她拿手好戏是下课前十分钟来个小考试，突然袭击，就一道题，刁钻古怪，脑子稍转不过来弯，就得吃鸭蛋。过去，见了她像老鼠见猫，现在有毛撑腰，我们也敢批她了。华老师很抱歉，您可能是我们贴大字报最多的人了。

我也联系自己，触及灵魂。我文革前写过一副对联，贴在宿舍门框：“周期表里看世界，实验室中学本领”，这是业务至上脱离政治。有一个同学还自爆考试作过弊，痛哭流涕。当然，帐都记在旧教育路线上，教书不育人的老师头上。有表现欲望，想出头露面的人有了绝好的舞台。他们很快脱颖而出，站到前列，本来默默无闻，可能会突然成为知名的风云人物，左右局势。

从我们0363三个班来看，活跃分子主要产生于三类人中。

第一类是工农出身的同学，特别是农村来的学生。这些人文革饱受学习吃力的困苦，心中压抑，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有深仇大恨，控诉起来义愤填膺，情真意切，一个“阶级迫害”、“阶级报复”，就点到了要害。二班有个蒋其宝，根红苗正，贫农世家。文革前他是平头百姓，典型的农村孩子老实纯朴。在四清队入了党，一下子变了一个人，当了骨干，霸气十足，不可一世。有一次批判系党总支书记王效挺，蒋嫌王腰弯得不够深，脚站得不够正，怒不可遏，冲上台去按脑袋，踢大腿，领头高喊口号，慷慨激昂。一场苦大仇深的贫雇农斗土豪劣绅的新剧我当时看得头皮发麻。自己出身在教员家庭，这种阶级仇恨先天不足，很是自惭形秽。

陈醒迈则是过去的“落后分子”的代表。这些人大都没入团，也不申请，对传统的政治活动不积极，甚至有抵触，有逆反心理。文革前有一次党支部开大会，批准我们年级第一个党员，也是他们二班团支部书记尹XX。自由发言都是事先安排，申请入党积极分子表决心向尹学习。他团员都不是，却不请自到，上去大放厥词，数落尹的不是，洋洋洒洒，一发不可收拾，最后被礼貌地请下台。文革来了，他把原名陈守忠改为陈醒迈，决定开始新的人生，从名不见经传而叱咤风云，后来成为井冈山的头头之一。这些人个性张扬，能冲敢闯，我自愧不如。

第三类文革前是班团干部，要求进步，靠拢组织，“驯服工具”，旧体制的“红人”，文革来了优越感也不放下。他们属于政治热情高的一族，绝少当逍遥派。其中的极品是二班的书记尹兴伊，他让我想起“悲惨世界”里的沙威，有个人的信念，冷酷无情，当权者忠诚的鹰犬。在文革中他认准陈醒迈是反革命分子，锲而不舍，追踪不懈，花费几年，终于缉拿归案，上演了“悲惨世界”的现代版。我在入大学时，虽然没有明确的目标，但总要“搞业务”，当化学家的。后来误打误撞，进了班团干部的圈子，“又红又专”，全面发展，成了追求的方向。但从来不想吃政治这碗饭。多年的教育，循规蹈矩，听话好使，文革中自知没有出风头的本事，也还是要经风雨，见世面，想跟上趟，有活动就积极参加。

“受气”的要复仇，“另类”的要表现，“听话”的要跟风，构成了文革的活跃分子阵营。更多的同学是，随大流，跟着跑，不出头。

北大运动的大轰大嗡持续了才十几天，就显现了强弩之末。“视觉疲劳”，“听觉疲劳”来了，学生们不满足天天陈词滥调，故技重演，想找新突破，可是不知

道向何处去。矛头向下吧，已经弹尽粮绝，搜索枯肠，绞尽脑汁，也只有空洞无物的口号。矛头向上呢，哪个活老虎可以打？上头不发话，谁也不敢乱说乱动。于是，只能在斗争方式升级上下功夫，让激进的情绪有个发泄。

二、再次跟风

6月12日，清华出现了戴高帽子游街的零星行为。对象不仅有干部，还有部分老师。不知是不是受此鼓舞，6月18日，北大出现大规模乱揪乱斗事件。

趁工作组正在开会之机，哲学系带头，不经批准，建立“斗鬼台”，拉来陆平一伙斗争。全校不约而同，各单位群体揪斗，没有请示工作组，出现了侵犯人权的过火行为。

那一天我觉得气氛反常，到处乱哄哄，人群骚动。原来有人要按《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办事：“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觉得既要革命，湖南的泥腿子就是榜样。我们没法在地主老财小姐的牙床上打个滚，但搞搞戴高帽子，挂黑牌子，上街游行总可以办到。

毛的这段话在文革中深入人心，家喻户晓，成了一切过激行动堂而皇之的合理外壳，非法行为有恃无恐的“葵花宝典”。

毛最喜欢“痞子运动”，咱就来当一回痞子。毛说，停课又管饭，吃了饭要发热，要闹事，不闹事干什么？咱就闹一回。

斗争的中心在38楼，离我住的31楼很近，就去看。那是哲学系历史系男生宿舍，东头出口有一个大平台，再拐弯下来，有几米高，能容十几个人，“斗鬼台”的横幅醒目挂着。下面是个大空场，站着几百人，围观，喊口号。已经斗过了彭珮云，张学书，冯定，冯友兰，我没赶上，正在斗美国特务反共老手周一良。尽管站在高台的最边沿，看不清他的脸，因为他“表演”的是“喷气式”，头被压得很低。

各系的学生一拨一拨地押着人前来游斗。拧胳膊的，按脑袋的，推推搡搡的，拳打脚踢的，喊口号的，情绪激奋，乱成一团。长这么大，我第一次看到如此激烈的场面，不由得心里蹦蹦跳。在这之前，大批判基本是“背对背”。我肯定没

有勇气站到上面跟着起哄，只能远处看着。

又听说化学楼有革命行动，往那赶。一路上看到游街的，有的年长，有的年轻。到化学楼，正在斗的是党总支委员桂琳琳。她是丁石孙夫人，那时只有三十多岁，几个女生架着她，头发散乱，面色苍白，双眼紧闭，任凭愤怒的人群七嘴八舌地吼叫。

文革后来血腥惨烈得多，残忍狠毒得多了，诸如砍头活埋，石砸水淹，开水浇灌，剖腹挖心，割生殖器，集体屠杀，轮奸后捅死。比起来，这些实在是很没有火药味，相当温和，非常小儿科了。其中固然有求新鲜寻刺激，瞎胡闹不正经的成分，更多的还是想重复一次敬爱领袖当年的革命实践。

忙忙乱乱看了一天，一方面头脑发胀，革命出现新的高潮。另一方面，心里乱糟糟，很多现象不知如何评价。晚上正和同学聊一天见闻，广播传来张承先声色俱厉的讲话。白天的闹剧定成了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

工作组后来公布，乱打乱揪有几十起，涉及“黑帮”45人，有缺点错误的120人，五类分子7人，好人6人，共计178人。游街、戴高帽、挂黑牌、揪头发、喷气式、拳打脚踢、身上贴大字报、墨汁涂面。最严重的是一位女同胞的衣服被扯破了。挨斗的人中有一个活跃分子刘佳宾，是庶务科工人，过去当过国民党上尉连长，还发现外校来的修治才，是个因偷盗开除公职的无业游民。

工作组宣布全校成立纠察队，日夜巡逻。五个校门出入查证。外校人不许来串连。学生外出要请假，须两人同行，回来要汇报。避开工作组的乱批乱斗是有害革命的，以后批斗一律经工作组批准。

各班文革小组被要求彻查6·18那天所有同学的表现，哪些人有异常，参加了过火事件。大家都要反思，批判出轨行为，深刻认识阶级斗争新动向。出身不好，表现“落后”的同学往往是怀疑的重点。

白天还是情绪激昂，“好得很”，晚上风向变了，“糟得很”。大起大落，我们的思想冰火两重天。

次日，工作组向中央交了一份报告，定性为“反革命阴谋行动”，曹轶欧亲自签字。它以中央文件九号简报形式转抄给各地党委。“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办理。”调门比较高的，倒是陈伯达，声称“有一个地下的反革命司令部”，康

生也说要揪出事件的后台。原来毛的口风紧，两个最重要的亲信此时都蒙在鼓里。我感到阴风徐来，小心为妙。下乡四清时写过两本日记，觉得很珍贵，想来想去，没有“一个共产党员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那回事，为了不祸起萧墙，偷偷销毁了

自发的群体闹事出现过火的、过激的行为，连西方国家也如是，每年罢工、集会不断，净是胡闹的，一场球赛都会搞出几条人命。他们政府的处理往往软弱无力，远不如我党干脆利落。通过抓出个别过火行为和“一小撮”坏人，定几个反革命，杀一儆百，敲山震虎，失控的自发群众运动就会平息下去，是鲜明的中国特色。背后的黑手后台一定要抓，甚至可能挖出“境外势力”。这是尚方宝剑、灵丹妙药，过去这么做，文革后也这么做，屡试屡爽，得心应手，使我国的群体事件远远低于西方各国。

当时在北京主事的刘少奇，正盘算着再搞1957年反右那一套，动员一鸣放一整肃。6·13就曾指示，“要告诉左派，要硬着头皮顶住，领导上要善于掌握火候，到牛鬼蛇神部分暴露了，就及时组织群众反击。”党的高官们也都以为毛又一次搞“阳谋”，决定照既定方针办，用轻车熟路的老一套打反击战，把火引向群众。

张承先这只脚一出，就站在了毛的对立面。后来毛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学生，对彭小蒙说：“张承先是坏人。”他死定了。他没少吃苦头。文革结束后当了教育部党组书记，倒是高风亮节，不遗余力宣传毛的教育思想。

大反击不仅在北大，在北京24所高校抓了右派学生上万人。刘邓这一次的失算是致命的，毛点了火他们浇水，毛煽动起了学生他们拆台，毛勃然大怒，成了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不错，这一次毛又搞了个引蛇出洞，只是被引出来的，是刘邓这两条大蛇。

北大工作组虽然给6·18定性上调门高，实际是震慑为主，雷声大，雨点小，没有大刀阔斧抓坏人。那天活跃的学生，基本销声匿迹，躲过了风头，谁也不好汉做事好汉当，跟工作组拍板唱对台戏。我没听说谁因为参加了6·18被定为反革命。矛盾被压了下来，没有激化，没有形成反工作组势力。

我们的邻居清华，事情却一发不可收拾。本来学生闹事不如北大厉害，工作组的批评也比较温和，无非是“乌合之众”，“不懂毛泽东思想”，但是学生死缠

烂打，抓住工作组不放，辩论个没完，各不退让，上纲上线，卷入的人越来越多，分了派。王光美6月19日到清华亮相以后，重点放在整学生。6月24日万人大会辩论蒯大富，几百人受牵连。清华就这样，在打倒蒋南翔后，很快转入反工作组，搬叶林，再搬王光美……成为文革的前沿战场。

毛的斗争哲学中有一条：“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就不能矫枉”，每次整人总是整过头。学生用这条语录整“黑帮”，明知过火过激而为之。工作组又用它整学生，大帽子大棍子。而“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工作组后来被中央文革收拾，同样的陷阱，“白色恐怖”，“镇压学生运动”，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至于中央文革自己，也没逃出这个怪圈。文化大革命就是在这“矫枉过正”的一报还一报中，矛盾不断激化，变本加厉。更有甚者，每一轮都要殃及无辜，卷入新人，使受害者如滚雪球，不断扩大。

7月12日，地球物理系的陈必陶5人，首先贴出了批判工作组的大字报，“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石破天惊。大字报说北大运动冷冷清清，止步不前，左派队伍没有形成。当时没人抄送给老毛，要不然说不定就是第二张马列主义大字报，有天时有地利。它连底稿也没保存下来，我们至今无法回忆其真容。

张有山东人的拧脾气，开始死不认错，强硬回应：“这是打着红旗反红旗，向工作组夺领导权”。北京新市委吴德一再强压，才硬着头皮，做了几次检查，浮皮潦草。但是他也没把陈怎么样。陈后来被选入校文革筹委会，此后销声匿迹，激流勇退，属于青史留名昙花一现，恰到好处。

一时间，对工作组的辩论也有个小高潮。大字报纷纷上墙，只是调门不一，激烈的要撤换张，但没有人赶他们，偏保的基本是高干子女。当时邓小平通过卓琳告诉在物理系的邓楠，“对工作组要多提建设性的意见，不要提破坏性的意见。”邓楠和李雪峰女儿，历史系三年级李丹林一起，写出“批评工作组，拥护工作组”。双方观点有过一些交锋，但辩论浅尝辄止，没有展开，没有大量群众卷入，没有来得及分派，不需要选择站队。否则北大可能会涌现一批思想精英，引导文革潮流。

毛不坐班，在滴水洞呆到6月底，闭门不出，拒见外客，读书充电，养精蓄锐，整个国家被他“搅得周天寒彻”，把烫手的山芋推给北京的刘邓。各级领导急得像热锅的蚂蚁，他却沉得住气，自得其乐，“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6月28日到了武汉，7月8日，给江青写了一封信。不仅内容诡异疑团重重，正如他自己所说，尽是“黑话”。做法也极其神秘，弄了一个手抄件（看不上复印机那玩意），交周恩来王任重先睹为快，原稿当他们的面销毁。信像古代“锦囊”一样封存起来，不到时候不揭锅。

7月16日，毛畅游了长江，向全国人民一展矫健身姿，“会当水击三千里”，精神抖擞，意气风发，要来跟刘邓算帐了。7月18日，他回到北京，下车伊始，就说“感到难过，冷冷清清”，接见了一拨一拨的人，唯独拒见刘邓。他急于对工作组下结论，马上要开中央全会，见分晓。7月份，中央文革多次来到北大座谈，摸底，吹风，定调，就是给张承先闭门羹。北大工作组就要被开刀了，上演惊天大回转。

聂元梓倒是歪打正着，加入了反工作组的行列。别看在校外红火，张承先不待见她，给她冷板凳。康生要求让聂进入工作组，张以其陷入校内派别斗争太深为由，顶着不办，给了她一个办公室主任的位子，不算正式成员，使聂怀恨，表示“张承先压制革命，要犯大错误”。这一次她又先得到风声，抢先公开表态，在7月19日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言：“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性错误”。提到这种高度，相当超前。

7月25日和26日两天，中央文革全班人马来到北大，东操场组织了两次万人大会，辩论工作组。这是中央文革5月28日成立后首次公开亮相。

江青、陈伯达、康生、王任重、刘志坚、王力、关锋、戚本禹、穆欣、以及北京新市委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有的名字熟悉，有的从未听说，都端坐主席台，各大区书记也拉来陪衬，两排近百米的主席台挤得满满的，熙熙攘攘，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天气燥热，很多人扇着纸扇。八十岁的朱德也到场，最后请他讲话，只见他颤颤巍巍站起来，喊了一句口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我们排着队伍，带着板凳，以系和部门为单位，自西向东排列成行。校外也有人闻风而来看热闹。中央文革小组是何方神圣，当时还不清楚，那么多大人物，这么大的阵势，有生第一次，大饱眼福，大饱耳福。新奇，期待，兴奋，激动，拼命伸着脑袋，竖着耳朵，听进每一个词，记住每一句话。那气氛像列宁在十月，群情激昂，紧张热烈，高潮迭起，扣人心弦。

江青主持会议，容光焕发，和蔼可亲。会前，陆平、彭珏云先游台。中央文

革大打亲民牌，江青用标准的普通话说她是代表毛主席看望大家的，是革命的勤务员，是来当小学生的。陈伯达说他的普通话不好，用谁也听不懂的福建话，靠王力翻译，只听懂一个叫“聂元梓”为“聂玩己”。康生操着一口浓重的山东口音，问：“北大的事情，是张承先他们清楚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回答声划破长空，如闪电雷鸣。

他又问：“是张承先他们是北大的主人呢，还是你们？”

“我们！我们！我们！”回答声震荡大地，排山倒海。

第一天中途下雨，只好休会。台下的人不断递条子，江青收了一大包，第二天说毛主席全看了。中央文革这次来只有一件事，明确表态批判工作组。大辩论基本一边倒，生物系三年级的樊立勤，法律系二年级的牛辉林，作了精彩发言。只有中文系61级李杨杨代表的贺晓明等31名干部子女站在工作组一边，“是延安不是西安”，“是严重右倾不是路线问题”，“打人骂人侮辱人不是中国青年文明词典中应有的词汇”，最后还念了长长的31人名单，包括毛的儿媳张少华，和她的妹妹东语系张少林。在当时的气氛下很需要点勇气。

李随即受到康生点名批评。江青宣布6·18是革命事件。康生说毛主席没派一个工作组，江青说“谁不革命，谁就走开！”这些话的意义，我们后来才能理解。工作组是坏工作组，是障碍物，犯了方向路线错误，陈伯达建议撤掉他们，成立由群众组成的文化革命委员会。

也许李杨杨名单里张少华的名字触动了江青的神经，让大家最为惊愕的一幕发生了。她情绪失控，自曝花边新闻，激动万分地大讲她家的阶级斗争，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少华，和她的妈妈张文秋，并且喊道，“张少华你在哪里，你站起来！”真是“语不惊人死不休”。所有人都愣了，傻了，一片寂静，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多想，谁也不敢多说。首长也有喜怒哀乐，家家都有难念的经啊。张家这对姐妹花当晚就出逃，躲到了董老家。

北大附中的彭小蒙大出风头，是颗耀眼的明星，伶牙俐齿，字字珠玑，口若悬河，在众目睽睽之下还用皮带抽了张承先，开创了主席台上打人的先河。众人瞠目结舌。江青把她搂到怀里，一通亲热。毛在给清华附中的信中大加赞扬，热烈支持，历史上有此殊荣的也不多。

中央文革亮相北大立刻成为头号新闻，当夜就有人到外校宣传，掀起第二次

来北大参观的热潮。各地的群众运动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工作组统统赶下台。实际上当时围绕工作组的刺刀见红的战场，在清华不在北大。但清华有刘少奇亲自过问，毛还不想直接和他过招，在北大来个敲山震虎。北大在这一回合又是一边倒，几乎清一色的反工作组。原来偏保的基本是高干子女，没形成气候。他们的父辈随后大都垮了，这些人也从北大文革消失了。

围绕工作组的斗争，是毛刘较量的最后一个回合。毛孤注一掷，力挽狂澜，以少胜多，惊天回转，等于又一次遵义会议，靠的是群众运动这张牌，挟百姓以令诸侯，靠的是乱中取胜的战略。天下大乱战胜了计划有序。放手折腾战胜了纳入轨道。秘书秀才组成的中央文革立了汗马功劳，从此崛起，炙手可热，威风八面，权倾天下，以后取代了政治局、书记处。

第一张大字报点了火，由于工作组的介入，没有烧旺，乱得不够。把他们赶走了，带来真正思想解放，它冲垮了两个根深蒂固的观念：群众运动必须有领导，以及反对基层党组织就是反党。这个紧箍咒一摘，口子大开，全国乱成一锅粥，无政府思潮大泛滥，“踢开绊脚石，自己闹革命”。有造反精神的人脱颖而出，习惯听党指示安排的，也只能靠自己揣摩理解了。要壮壮胆子，摆脱党的领导，反！

先前，要想冲击当权派，还要网罗一些罪名，生拉硬套与黑帮黑线挂上钩。现在不用了，一个“压制群众”就够了，就可以定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安上这样的罪名，信手拈来。造反者又有了一个护身符：“革命小将的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党的权威和神秘顷刻倒塌，各地基层组织全军覆没。

7月28日，北京市委作出撤销工作组的决定。8月4日，北大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工作组。江青、康生到会，康生说张承先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资产阶级右倾机会主义。一个6·18处理不当，竟然上纲若此，令人胆寒。“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批判陆平的这些话音犹在耳，同样的帽子扣在了他的头上，两人成了难兄难弟。

8月13日，短命的北大工作组解散，返回原单位，接着是清余毒，老套子。

在我们年级的一次辩论大会上，对各班文革小组是否执行了资反路线分成了两派意见。一派是文革中当红的骨干们，他们否认；另一派是草根、痞子，说执行了。我上台发言，反戈一击，承认我自己，我们文革小组，执行了工作组的指示，搞层层清理，人人过关，压制了群众，应该道歉。

这次辩论奠定了我们年级分派的基础，我是各班文革小组中唯一反叛的，那个发言是一次重要的立场选择，表明我和班团干部势力彻底分道扬镳。本来对我有意见的人改变了印象。我的这一站队也使我们这一派在声势上取得了胜利。

说白了，我是跟张口闭口受阶级迫害，别人是“修正主义苗子”的人合不来，对“唯我独革，唯我独左”的人看不惯，尿不到一个壶里。这个站队决定了我一生的轨迹，但当时是顺理成章，没有经过什么思想斗争。

各班级的文革小组寿终正寝，7·28成立了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西语系石天曙，经济系杨勋，地球系陈必陶，俄语系（曾改名反修系）徐运朴，国政系廖淑明等在册，化学系出了工人代表李志刚。

9月11日正式成立校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42人组成，孔繁为第一副主任（后为孙蓬一取代），邓朴方也代表技术物理系当了委员。原来说是学习“巴黎公社”式公民投票，群众酝酿，直接选举，随时可以罢免。我当时真以为这将是国家组织的新形式，还找了书和资料，研究巴黎公社，可是实际操作起来满不是那么回事，也没人去较真。“巴黎公社”、“北京公社”从此绝口不提。后来，只有中宣部搞过文化革命委员会，其他单位成立的，都是“革命委员会”了。

“校文革”的成立，释放了一个重大信号：党组织从北大政治生活消失了。效仿北大，党组织在其他各地的权力机构革委会中也都被扫地出门。对于思想处于高度疯狂状态的人们，谁也没拿这往心里去。

北大完成了改朝换代，大概是全国第一。万众一心，拥护聂元梓。8月初，她和大字报撰稿人杨克明，社教积极分子张恩慈列席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受到毛的接见。应她的要求，8月22日，毛给北大校刊题词“新北大”。此乃传世至宝，北大的无上荣光。影印件贴在大饭厅东墙，全校欢呼雀跃，高呼万岁。人民日报马上吹捧，说是“破旧立新的动员令，兴无灭资的号召书”。题词写了两遍，毛甚至说不满意还可以再写，聂元梓竟有这么大的面子，牛！而“新北大”报也享受了“人民日报”的待遇，有了航空版，在北京制版后，到四川等地印刷散发。

聂元梓掌权第一件事，就是成立了“黑帮大院”，也叫劳改大院，俗称“牛棚”，反革命黑帮们，反动学术权威们集中生活、集中思想改造的地方。全校性牛棚设在民主楼、外文楼后面的三排平房教室里，用苇席围成墙，国政系的一个

调干生、“校文革”常委刘国正当院长，由最可靠的人把守和管理。每次训话，刘开头语都是：“乌龟王八蛋们，竖起你们的耳朵听着……。”被关押的人要唱“牛鬼蛇神歌”：“我是牛鬼蛇神……把我砸烂砸碎。”谁想去看看，老远就被吆喝拦住。那是神秘之地，里面充满了血腥的阶级斗争，刑讯逼供，凄风苦雨。牛鬼蛇神越来越多，人满为患，后来其他地方建了十几个分部。“群众专政”是文革一大新鲜事，就是私设公堂，自建牢房。“牛棚”也是北大一大创举，不申请专利，无私奉献，盗版不究。各地纷纷来取经效法，依葫芦画瓢，迅速推向全国。

这个时候，第二次来北大参观的热潮正在兴起。它成了革命圣地，人潮蜂拥，纷至沓来。据《新北大》报道，7.29至8.22这近一个月，有212万人次，平均每天有8万人之多。不光是本市骑自行车的，也有外地自掏腰包买车票的。校园的角角落落，房前树下，自行车的海洋，横七竖八。聂元梓成了万人仰慕的明星，走到哪里都是众人簇拥，长龙跟随，据说一天能接见几万人。聂给北大带来了极大的荣耀，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我们也跟着脸上有光。

我也接待过不少外校的老同学。有一次，我母亲还带着她们小学老师，二十几个人，从天津赶来，我给他们讲北大运动来龙去脉，领他们到7人大字报旧址接受革命洗礼。那里搞了个讲台，外单位的人排长队，上去发言，表决心，学北大。他们还瞻仰了聂工作的哲学楼，那门前挤着眼巴巴等着的人群，见人出来就喊：“支持你们！支持你们！”很可惜，我没能满足这些粉丝的愿望，一睹文革第一位“毛女郎”风采，能做的只是晚上找个大教室，他们席地而睡。我处在了世界革命中心，心里自豪啊。

“牛鬼蛇神”们经常要拉出来游斗一番，满足校内外人们的好奇心。奚落嘲笑，唾口谩骂，人格侮辱，这些老先生尊严丧尽，而国人的某些劣根性也表现得淋漓尽致。“反正是坏人，怎么着也不过分”，是普遍心理。在这种场合，我也有恻隐之心一闪而过，但是另一个声音立刻出来：要站稳阶级立场！对敌人的同情就是对人民的犯罪！

我本人也参加过一次“破四旧”抄家，抱着新鲜猎奇的心态。是哪个“反动学术权威”，为了什么“黑证据”，都不记得了，赶到时才知一伙人刚刚来过，留下杯盘狼藉，满屋零乱。我们晚了一步，对那家可怜的人吆喝了几句，未拿一针一线，空手而归。

毛在讲翦伯赞时说：“像他这样的资产阶级权威，对人民还是有用的，可以扫扫地，搞搞卫生嘛”。主席都给派活了，这些人就成了打扫厕所楼道、清理垃圾的专业户，但更多的是在草坪上拔野草；北大草地多，此成一大景观。赤日炎炎，绿草茵茵，星星点点地分散着一群老人（比我们现在年轻多了），头戴草帽，手提小筐，有的拿个板凳，有的坐在地上，分片包干，不许交谈。他们埋头作业，精神专注，极为认真。他们本身就是“毒草”，干这个名属实归。谁说过“知识就是力量”这种傻话？在专制制度下，知识是何等无能啊。

陆平也干过这个活，围观批斗的人太多，收回去了。见多识广的人，会指点着告诉你谁是谁，尽是如雷贯耳的人物，声名显赫，学富五车。有个傅鹰，一级教授，我一进北大就听到这个名字，读他的书，化学系一宝，还当了副校长，据说脾气很坏，学霸一个。现在一看，小老头，耷拉脑袋，不敢看人，神气全无。后来成为我研究生导师的冯新德，三十多岁回国在北大任教，每天拉洋车的接送，那时刚刚五十岁，瘦骨嶙峋，手无缚鸡之力，也得干粗活。

这些人是我过去敬仰的对象，也曾是我理想的目标。现在斯文扫地，陷入灭顶之灾，我们革命者的扬眉吐气，欢欣鼓舞，正是以他们的腥风血雨为代价的。

三、行走江湖

工作组走后，北大校门大开，不再对外封锁。出现了“围城”现象，外面的人急着要进来学习参观，里面的人则认为已经没了搞头，想出去到外地看看，长长见识，煽风点火，搞搞炮打司令部，火烧省市委……

大串连给我们提供了空前绝后、千载难逢的机会。

大串连的最初设想是毛要接见红卫兵，他认为苏联变修的原因之一是年轻人见到过列宁的人太少。他要让未来的革命接班人都有机会见到自己，红光满面，高大魁梧。中央文革有人怕乱，毛说：“都要让来，管饭，乱就乱它一阵！”8次接见，我都没排上号。但是1965年百万人援越抗美集会时，我们就站在金水桥边，毛和其他领导看得真真的，此生也足矣。沾大串连的光，我们行游天下，分文不花。

8·18毛第一次接见刚过，李宗源找到我、倪静安、董元彦说，早晨他听说

允许学生串联，坐火车不要钱，十分肯定。几人一商量，事不宜迟，董的父亲在武大教书，就去武汉。我们秘而不宣，下午悄然离开北大，赶到火车站，买张站台票，坐上晚上的南下火车。

火车秩序井然，由于没有座位，我们被查票的捉住了，送交列车长。听了我们的申诉，他什么都没说，领我们找到座位，嘱咐下车时等在那。心里忐忑不安啊，一向遵纪守法，从未丢人现眼。反正四条汉子没钱，要命有一条。将功折罪吧，我们主动从列车员手里抢过扫把水壶，一遍一遍地打扫卫生，给乘客送水。

后来，这也竟成了我的一个习惯，很长时间内，每坐火车，包一放下，就去扫地，送水，有时还给乘客念报纸，比列车员还忙。那时的纯朴，毫无功利色彩，追求自我完美，心理满足。现在甚至有点恍惚，我真的做过那些事吗？

火车到了武汉，列车长领着我们出了一个边门，要怎么处置？心都要跳出来了。没想到他说，好了，你们可以走了，还告诉我们怎么坐车到武大。原来以为是一场历险，结果竟是这么简单。

8月的武汉是个大蒸笼，我从小只呆过天津、北京，哪受过这份热。我们自己一个顶层的大教室，晚上睡觉前要上房顶子大浇一通水，看着水蒸气腾腾往上冒。白天则不知道要洗多少遍冷水澡。我暗中发誓，今后决不来这个鬼地方工作。

据说武大和北大是两个校园最美的大学，珞珈山、东湖水，声名远扬。但我们没做任何游览，全天候看大字报，偶尔在上面写点批语，要不就和武大的同学介绍北大文化大革命。参加了一个批判原校长李达的大会，我们受优待坐在头排，看得清楚。李达是党的创始人之一，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湖北省委在7月份开除了他的党籍和职务。他上书给毛：“主席，我有难，请救我一命”，毛也算是老朋友了，不予理睬。当时75岁了，多病缠身，坐在椅子上，手里拄着拐棍，支着一把阳伞，背对着念发言稿的人。批判会开得比较文明，时间也不长。仅几天后，8月24日，这位老人就去世了。

这时，我们要转战它处，才发觉火车站人山人海，水泄不通。这时大家都串联了。我们挤上了去衡阳的火车，下车竟意外地遇到另一伙同班同学。这才知道，班里的人走空了，大家像逃难似地，三五成群，各奔东西。我们于是结为一伙，奔桂林，转上海，停南京，看大字报，抄大字报，听批判会，不介入，不表态。除了看一下漓江，不游山玩水。一路经历，略去不表。我特别记得在桂林的小巷，

天气阴霾，地湿漉漉的，行人稀少，静谧无声，完全没有北大的喧闹。我们一行十几人，排着整齐的队伍，由林新本领着喊口号，高唱：

拿起笔，做刀枪，
革命路上当闯将。
谁要敢说党不好，
马上叫他见阎王。
杀，杀，杀，杀呀!!!

声音划破寂静的长空，换来探头出门的眼光。如果放到现在，保准被认为是一伙神经病，可那时我们做得一本正经，虔诚由衷。

第二次远程串连，去的是东北。那时的火车站，乱成一锅粥，学生的海洋。我们三个人，慌不择路，见车就挤，上去才知是去齐齐哈尔的。下无立足之地，侧无转身之空，头顶行李架上人的脚丫子。到了齐市，住进重型机械学院，天寒地冻，呼气成冰，哪有大字报可看。我们穿着薄薄的小棉袄，整天在暖气片旁取暖。后来转到沈阳，还是一个字，冷。我们从北京风尘仆仆来了，人家去北京取经走了，学校空荡荡。逃回北京，这一次串连给我的记忆只是饥寒交迫。

我的大部分串连时间去的是天津，我的老家。

第一次去是小吉普接走的。9月间，无线电系的陈荣华，我从未谋面的老乡，不知怎么找来，说天津机床公司的造反派来北大求援，请我们做后盾。他们系七八个人，加上我和数力系蒋胜舫，由无线电系董浩带队，挤在两辆小车里，来到天津山西路机床公司。

造反派已经夺了权，头头是一个30多岁的年轻人，身材细瘦，极为精明强干。我们就在总部安营扎寨，男生一个大屋，两个女生一个小屋，还有天津女三中三个学生另一房间。我们实际是被用来拉大旗作虎皮，壮声势的，自己也有自知之明，并不去指手划脚，出谋划策，只是跟着听听批判会，写写大标语，还有机会到各个下属厂看看，甚至体验一下劳动，长了点见识。每次都被介绍是北大的革命派，都换来羡慕尊敬的眼光，心里美滋滋。

参加的唯一大行动是去公安局夺权，是几个单位造反派的联合行动。在我们

面前摆开一张详细的公安局平面图，任务是去某某房间抓某某人。那天清晨，天蒙蒙亮，我们随着一大群人，冲进公安部，在楼里疯跑，努力寻找我们的目标。我甚至听到一声枪声，有一种攻克冬宫的雄壮感觉。我们找到了那个房间，空空如也。稀里糊涂，夺公安局的权大告成功。

后来董浩决定，我们这样不过是给别人当工具，没意思，撤。好久以后，我又回机床公司看过，那个造反派头头已经抓起来了。罪行之一，就是砸烂公检法。后来我看到高皋、严家其写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说大串连起来后，王任重对北大学生到天津点火非常愤怒，指责“就是北大学生了解天津，还相信中央不？”这肯定不是我们，应该是更早的人。

我还多次只身去天津，有时住家，有时住天津师范学院，那里有好多我的高中同学。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痰中有血，就去了第二人民医院。那时我母亲在东北串连，我在小学工作的父亲正约好几个老师去火车站排队，去哪都行，家里只留下刚十岁的弟弟妹妹。现在想起来，多么疯狂的年代。我凭着一张学生证，住了十几天院，治疗肺炎，一分钱不花，不用办任何手续。那时去银行借钱也容易，有学生证就行。不过，欠帐的人，毕业分配前都收到了还款通知。

社会上又刮起一阵风，步行串连。去井冈山的，韶山的，瑞金的，延安的，都是革命圣地，长途跋涉，全靠脚板。我没那个雄心壮志，和六七个高中同学一起，从天津走到北京。

那一路上，三五成群的人，真叫络绎不绝，川流不息。有好多接待站，管吃管住，分文不收。甚至有支起凉棚供应大碗茶的，欢呼加油的。短短240里我们走了五天。苦不苦，想想长征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我体会到当年将红军用脚板走两万五千里，是我们一百倍，太不容易了。我脚打了泡，一瘸一拐，像残兵败将。一进北京，就有一个大接待站，给我们两个证，一个是坐公交车不要钱的，一个是到各大学吃饭不要钱的。吃饭还要凭学生证，我用不上，但是乘车证让我在北京足足逛了一通。

北大的同学往外走，外地的同学到北大来。只要有空床，我们就随便把人安排住下，宿舍成了客栈，绝没想过查证件问底细，根本不在乎主人会不会不愿意。纯真的互相信任，是那场大混乱留给我们少有的美好回忆之一。很多宿舍楼道也铺上了草垫子，住着南来北往的学生，有人甚至住教室，住操场，等毛的接见。

大串连是毛批发北大大字报，赶工作组之后的又一大手笔，把文化大革命推向新混乱。全国人员大流动，现在的民工潮也比不了。可惜当时没飞机，否则行李舱也敢进去睡。每个经历了文革的人，都有自己大串连的故事，都有一段不可磨灭的回忆。就连校文革主任聂元梓、副主任孙蓬一，也带着随从红旗兵团去了上海，揪出常溪萍，火烧陈丕显，打倒曹荻秋，轰轰烈烈了一番。串连的学生，有的人蜻蜓点水，到处一游。有的人到了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以北京来的“通天使者”身份指导文革，介入了当地的运动。“北京一只虫，外地一条龙”。有的人甚至扎营下来，成为那里的一员。像我们班的杨其相，整个文革就是在河南兰考过的，到1968年大联合时才回来。另一个黄关锦，一直在上海，并且在那里被打成了反革命，押送回校。

四、冷眼乱世

从1966年8月到年底，我在北大和校外间进进出出。不管是在哪，都是旁观者，没写过一张大字报。全国在大闹天宫，北大却基本停滞了，难得有什么新“爆料”，提不起大伙的神。我放眼校外，关心国家大事。

8月份，在与1962年的十中全会隔了4年后，召开了八届十一中全会，发布了文化大革命的纲领《十六条》。毛强加在全党全民头上的这场革命，有了名分。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走资本主义当权派，可是对什么是走资派，始终没一个明白的说法，人人揣着糊涂装明白。那年头，一说坏事，就是资产阶级，资本主义。

毛在这个会上，8月5日，写了《我的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部》，言简意赅，主题明确，愤恨之情，跃然纸上。7日印发给各位委员。用当时时髦的话，“赤膊上阵”了。

这张大字报的起因，是7月29日刘邓在北京市委在人大会堂召开的大专院校中等学校积极分子万人大会上的讲话。

邓小平所说：“以新市委名义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是根据中央意见办的。”

刘少奇说：“过去派工作组，是中央决定的，中央同意的。”

左一个“中央”，右一个“中央”，惹得毛怒火直冒：你那个中央我根本不承认，这不是负隅顽抗，而是公开叫板了。

据说毛当时突然从后台走向前台，不理刘邓，和学生招手，一言未发，立即引来雷鸣般的掌声，长达十分钟。

刘邓说的并没错。他们做得对与否不管，符合组织原则，符合党的集体领导。毛理屈辞穷，强词夺理，拿“真理在少数人手里”，“凡是错误的领导，都可以抵制”说事。什么民主法制，什么规矩规则，什么组织程序，在他那都不管用。我说了才算，我没同意就得推翻。

随后，刘少奇在8·18天安门接见时排名下挫，从老二变成老八，知趣地站到了远离毛的东边，神情呆滞。中文里多了一个词：“靠边站”。由此更滋生一个“排名文化”，每次领导人亮相，大家都会在排位顺序上寻找细枝末节，揣摩党内的新动向。此风甚至延续至今，有人乐此不疲。“排名政治学”，中国特色也。

8月23日，毛的大字报转贴到大饭厅东墙，北大又抢了先。以后反复转抄，迅速传开。全国惊骇，目瞪口呆。退居二线的一号人物向身在一线的二号人物公开宣战，而且是“两个司令部斗争”。毛是以身作则，弘扬一下造反精神，还是图穷匕首见，要动真格的，引发党的大分裂？

文化大革命看来是露出庐山真面目了，原来是一场宫廷政变。毛要用非正常手段，搞掉他的二把手，以及一大伙他不信任的人。本来他已经退居二线，承诺把接班人扶上马，送一程，平稳过渡，自己做精神领袖。现在他要食言而肥，不惜制造全国混战，一定要重新走到前台，更换接班人，不到最后不放权。文革前不久，林彪曾在一个会议上大讲政变经，毛很不以为然。原来毛自己在酝酿政变，他不愿意过早透露意图，引起对方警觉。

人算不如天算，文化大革命以宫廷政变开始，最后又以宫廷政变告终。集权专制政治，一人说了算，没有党内民主，不透明的黑箱操作，这些都是宫廷政变的土壤，毛死后被请君入瓮。

毛把他的炸弹扔向了毫无思想准备的全国人民，弄得上上下下好久回不过味来。这张大字报引起的轰动竟然远不如聂的那张。就是在上层，也给了低调处理。兹事重大，还是先别轻举妄动。

北大清华都有点名刘少奇的大字报，零零星星，蜻蜓点水。陈伯达专门来北大，禁止此事，叫我赶上了。8月底一个晚上，半夜一点多钟，我从清华看大字报回来，走到大饭厅东墙处，那里悬挂着一个大灯，照得通明透亮，只看见陈伯

达由两个人陪着在看大字报，那时校园已经没什么人了，我们有六七个同学立即围了上去，大家席地而坐。

陈老成持重，有些木讷，让他当文革组长，纯粹是赶鸭子上架。他的口头禅是“我是小小老百姓”，不记得那次是否又说了这话。他主要是说不要贴刘的大字报，大伙争先恐后提问题。有人问，红卫兵运动应该“主要地”还是“完全地”由红色家庭学生组成，他只是说，你们讨论讨论吧。有人问可不可以贴郭沫若的大字报，陈也给了否定的回答，他很尊重郭，说要保护。七嘴八舌，有两个人最活跃，话全被他们抢了，我一句也没捞上，事后既兴奋，又懊悔。

毛两次在北大点火，把它推向文革前沿，任何一次都可以顺蔓摸瓜，上追到刘少奇，直捣“资产阶级司令部”。可北大在赶走工作组，成立“校文革”以后，以为尘埃落定，革命到头，大功堪称告成，倾巢出动大串连，以解放全国为己任。人去楼空，学校里冷冷清清。连黑帮大院都自行瓦解，“自己解放自己”，“住读”变“走读”，可以回家了。这一次，北大又一次错失良机，没有为毛再立新功。

半路里杀出个程咬金，清华出了个蒯大富。有天时地利之优，天降大任于斯人。蒯先是困兽犹斗，单枪匹马，“又臭又硬”，置于死地而后生，8月4日被周总理平反之后，得理不让人，往大里闹，抓住王光美的工作组不放，死缠烂打，一条道走到黑，直逼后台刘少奇。他们不管“上头”精神，照贴照反。经过艰苦的内战、分化、洗牌、改组、重整，12月份成立了井冈山兵团，它的特色就是反刘。有张春桥面授机宜，从在校内点名到贴大标语在天安门，组织到北京市的反刘邓大游行，甚至“智擒王光美”，蒯大富身价倍增，风头盖过聂元梓。

文革开始，北大人还向清华“输出革命”，鼓动反蒋南翔，被轰了出来。赶走工作组后，北大大字报没看头了，清华却搞得如火如荼，风水轮流转，取代北大成了中心，吸足了眼球。

北大素以有反骨著称，历史上不乏反潮流者，但是在文革中，反陆平，反工作组，全是奉命行事，打死老虎，批倒台者，不越雷池。陈伯达来说不要贴刘的大字报，北大就照作了。本来是培养“听话”的干部人才的清华，却表现了桀骜不驯的造反派脾气，我行我素，不屈不挠，挑起了反刘邓大旗。

文革前，蒋南翔在清华大力推行“又红又专”教育，发展学生党团员，当时学生中党员有一千多，连蒯大富都是申请入党积极分子。另外还培养“双肩挑”

干部，都是文革有生力量。清华学生政治热情、政治素质比较高，作“革命接班人”意愿强烈。而北大的学生，普遍业务至上，不大关心政治，多数人参加文革抱着随大流、观望的态度，得过且过。

聂不甘示弱，要再建新功，11月8日，和亲密战友孙蓬一、李清昆等人，推出又一张大字报《邓小平是党内第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贴到老地方。邓已经是死老虎，拾人牙慧而已。而且弄巧成拙，为她日后永世不得翻身加了砝码，邓才不跟她来大人不记小人过呢。她又组织了朱德专案组，偷鸡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时候一到，一切全报时，都是白纸黑字。聂写回忆录，所有坏事都一推六二五，唯有这两件，赖不掉。

十一中全会，毛卯足了劲，只是小胜。刘邓虽然和朱陈一样没权了，可还都在十一人的政治局常委，邓的排位甚至提前了。刘自报奋勇到北京建工学院蹲点，说明也没怎么样他。毛既然已经撕破了脸皮，肯定是除恶务尽，穷寇必追，于是继续以乱搅局。8月23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讲，北京乱得不厉害，太文明了，要乱它几个月。

胳膊拧不过大腿，没有任何人敢来维稳，大家都给“乱”火上浇油。乱，在下层，演化成无政府主义大灾难，大破坏。这不是什么“大民主”，而是礼崩乐坏，法制不存，和民主不沾边。在上面，就是排除异己，宫廷政变，反对者，异议者，执行不力者，统统清除。美其名曰“反修防修”，那是借口。

刘少奇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1966年底，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天安门城墙；1967年始，北京召开百万人刘邓批判大会；1967年7月，北京建工学院八一战斗团在中南海西门安营结寨，搞“揪刘火线”，吸引全市眼球。天派地派都建了指挥部，那一条街车水马龙，人群熙攘，几千个棚子，几百个喇叭，不断有誓师大会，声援大会。锣鼓喧天，红旗飘扬，大标语“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煞有介事，闹腾了31天。聂元梓也几次去探班。说实在的，参加人自己可能挺当回事，旁观者一看就觉得，做秀。我去看过热闹，大概有十几个男女同学，头上围着白毛巾，有气无力地躺着，在绝食。那也是我第一次看到这种事，后来听说是假的。口号是勒令刘少奇滚出中南海，否则采取革命行动。可怜的刘少奇鞍前马后捧了毛几十年，从来没想过政变，连反抗都没想过，现在只有要求回家种田的份，毛都懒得见他。

打倒刘邓不是终极目的，毛要的是的绝对权威，说一不二，一言九鼎。他凌驾于全党之上，党成了领袖的从属。他的每一句话是都绝对真理，至上权威，即便是信口一说，出尔反尔，也要俯首贴耳，不假思索，紧跟照办，不能走样。

大乱之中，消息满天飞，北大是信息交流站。中央文革，其他首长接见时的谈话指示，总是第一时间出现在这里。外校外地的重大事件，总是以最快的速度得到报道。大饭厅的墙面，成了这方面的专栏。秀才不出门，可知天下事。如今反腐靠网络，当年造反靠小道，有些权威的小道消息，往往先落户北大。每天，我都要到那一带转上一两圈，总有新东西。

除了大字报，还有“串连会”，由几个人或几个战斗队发起，在大教室举行。有校文革官方主持的，也由民间自发办的，报告一些专题调查，搜集资料的结果。我听过“六十一人叛徒集团”专题，徐向前在西路军专题，还参加过批判杨绍明，主要是揭批他爸爸杨尚昆。

北大得天独厚，有机会拉来大人物批斗。比如1966年10月，就在东操场召开批判彭罗陆杨大会，四人在操场边的土台，从南到北排开，罗瑞卿摔断了腿，拄着拐坐在地上。

毛酝酿文化大革命已久，又有的是闲时间，却没有一部谈文革的论著。在战火纷飞时，还忙里偷闲，写四本书，然而在文革，除了初期两封信（给江青和清华附中，分别在7月8日和8月1日）和一张大字报（8月5日），一篇像样的文章也没有，只是隔三差五地发布一条没头没尾的语录，以及在文件上画个圈。今人研究毛的文革思想，找不到依据。

直到1967年11月，全面内战正酣，两报一刊才出来一条社论，阐述“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自称“马列主义第三个里程碑”，文革的理论基础。阳春白雪，老百姓读不进去。我扫了一眼六条要点，味同嚼蜡，扔到了废纸堆。

毛允许运动大乱，绝不允许思想大乱，小乱也不行。他不仅要做法政权领袖，更要做精神领袖，全国人民只能有一个思想，就是他的思想，毛云亦云。这是他远远高于其他一切政治强人之处。不给任何异端邪说离经叛道开口子，一有苗头，即被定为反动思潮，只能流行于局部并且短命，只能乔装打扮，打着红旗反红旗。

文革伊始，以阶级斗争为纲，“血统论”，应运而生，盛行一时。

毛是“血统论”的始作俑者。1966年3月20日，他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

说：“现在大中小学大部分被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垄断了。解放时我们把它都包下来。当时包下来是对的。现在要革命。”“血统论”最早流行于中学生干部子弟。要搞阶级斗争，按出身划阶级，他们最具优势。有一次，我大串连坐火车，看见两个红卫兵旁边有个空座，就挤了过去，哪知一个小家伙说：“你是不是红五类？要是狗崽子离我们远点！”狗崽子就是黑五类，我反正也不是，想也没想就跟他们吼道：“老子是三代工人！”工人在红五类中排老大，小家伙乖乖给我让出了位子。原来他们表面上气壮如牛，其实柿子拣软的捏。

8·19，北大也成立了毛泽东思想红卫兵，一色的革命后代。我们年级也有人，戴着红袖章，耀武扬威。它存在的时间不长，无疾而终。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这幅对联，经过北工大谭力夫大力吹捧，闻名全国。它也贴到了北大，横批先是“基本如此”，后来成了“绝对如此”，称之“鬼见愁”。推广者多为官二代，红二代。我属于不红不黑，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叫“老子平常儿骑墙”，也灰头土脸，矮人一截。

文革前，同学之间只知道老家何方，现在划分了阶级，甚至家长的陈芝麻烂谷子也翻出来。化学系首先推出对联的是我们班的林双双，人大副委员长的女儿。文革中她基本和其他高干子女们在一起，不参加班里活动。毛8.18接见红卫兵，她代表我系，上了天安门城楼。据聂元梓回忆说，毛单独接见了北大的40几个代表，还照了相，我没听林谈过此事。下楼后，贴对联一马当先。哪知，墨迹未干，老爸就被打倒了。她的宿舍楼门前的这个对联一字未动，只是横批改成了“又增一例”。从此她也在我们同学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血统论伤人太多而不得人心，大批鼓吹血统论的红二代转瞬变成黑二代，终于被抛弃了。中央文革陈伯达、江青都表态反对它。后来出了很多版本，比如“老子革命儿接班，老子反动儿背叛”，“理应如此”。再后来，“狗崽子”改称“可教育好子女”，所谓落实政策，骨子里还是歧视。

“血统论”之后，又出个“怀疑一切”，出自马克思“最喜欢的格言”，也是打着毛思想旗号，解释文化大革命。文革本身就在否定一切，横扫一切，打倒一切，无组织无政府无目标，客观现实滋长了人们的虚无主义，神马都是浮云。东语系乔兼武8月30日的大字报要“造三个大反”，提出解散党团组织，党政合

一，组成革命委员会，由毛主席革命司令部直接领导，砸烂从中央到地方的一切办公室，引起震撼性轰动，有不少共鸣。校文革筹委会遇到了烫手的山芋，不作点什么不行，批判又说不清楚。当晚就在五四操场开大会，挑灯夜战。乔无非是说出了“皇帝没穿新衣”，根据自上而下的控制系统全部停摆的事实，提出设想，关键是没有反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个人，又无后台操纵，只定个思想极端，算不上反动。批判时还给了他一把椅子坐，披件衣服御寒。

乔原名乔俊礼，学的缅甸语，绝对是个人物，第一张大字报要成立红五类子女协会，简称贫协，还弄个署名“十三级干部子弟”，成为笑柄。随后又发传单“致林彪同志的一封公开信”，支持北农大附中伊林、淅西反林彪，这回闹大了，罪责难逃，被关进了大牢。

我还看过一张大字报，公然说共产党应该变成“全民党”，不要在群众中当“先锋队”，谁申请就接受谁，“先进性”是中央的事。这个观点要在文革前，绝对的反革命，可在当时环境，没有一篇反驳的。

文化大革命其实就是靠“怀疑一切”把群众忽悠起来的。毛怀疑一切，只信自己，下面跟着他转。没有证据愣是死反死打，还一打一个准，好多人真以为自己“路线觉悟”有多高了。直到此风吹向无产阶级司令部，竟怀疑林彪、中央文革，甚至对毛不敬，“怀疑一切”就难逃厄运了。

对“怀疑一切”，没有真正从理论上展开辩论或批判。因为是陶铸支持的，陶一倒，政治挂钩，“反动思潮”的帽子便戴上了。那是一个因人废言的年代，批判某个观点最便捷之路就是与某某倒台之人搭上界。

陶铸的倒台，大跌我们的眼镜。他是一个共产党的高官，又有极好的文采，中学时语文课的“松树风格”，让人耳熟能详。1967年初的一个早晨，我去大饭厅吃饭，墙面赫然出现了巨幅标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他的狗头！”下午就变成了“揪出变色龙陶铸！”原来陶铸说刘邓是人民内部矛盾，于是成了“最大的保皇派”，没有刘邓的刘邓路线。更不能容忍的是，他指使熊复搞了一个“换头术”，制造毛和刘国庆节并排站在天安门上的照片，狗胆包天！刚刚火箭式上升进入常委，排行第四没几天，就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第三号，从此刘邓陶并提，惊心动魄！

三月份的一天，又出来大标语，一个字一张大纸，没头没脑，触目惊心。“坚

决反击二月逆流!”接着,又来了“打倒大军阀谭震林!”再往后听到的更让我们汗毛倒立,“四帅三副”竟然大闹怀仁堂,造文化大革命的反,跟毛主席对着干!叶剑英拍断手指,还有叫嚣“过河拆桥”的,发狠话“不跟了”的。毛要退到井冈山打游击,不是说着玩的了。

一种江山变色你死我活的危机感油然而生,我们身负崇高使命,做不了别的,拼命贴大标语:“誓死保卫毛主席!”“谁反对中央文革就砸烂他的狗头!”接着,又参加北京市3月14日的万人大游行,打倒谭震林、陈毅、叶剑英、李富春、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

7月份“打倒小爬虫”结果更让我匪夷所思,是王关戚!他们是中央文革的要员,铁定毛主席司令部,怎么放着红帽子不戴,去投靠全党全国同讨共诛的刘邓陶?太令人毛骨悚然了。

我以为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一拨又一拨地倒台了,出局了;最后,连那几个最铁板钉钉的,不是自我爆炸,折戟沉沙,就是束手就擒,牢狱终生。我的“永远紧跟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信条,成了一堆垃圾货。

【评 论】

文革中北大两派的派歌

张 从

文革期间各个地方和单位都形成了对立的两派群众组织，两派都有自己的名称、旗帜、袖章、报纸和广播站，广播站经常播放自己一派的代表性歌曲，可以称其为“派歌”。例如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的团歌是《井冈山是英雄的山》，另一派则有一个 414 战歌，是用林彪的一段语录自己配曲的。而北大两派也都有自己的歌曲。

新北大公社的社歌是《毛主席是咱社里人》。这首歌产生在大跃进、人民公社化时期的 1959 年秋季，歌词选自广东音协编印的《新弦》歌词月刊，词作者是广州战士歌舞团的青年诗人张永枚，作曲者是当时山东曲阜师范大学附中高中二年级学生程恺。由于歌词内容符合当时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时代精神，曲子也悠扬动听，很受群众喜爱，很快就传遍全国。新北大公社把这首歌当成自己的社歌，其实只是因为歌词里有一句“毛主席是咱社里人”，好像是毛主席支持他们这一派，可以找到自我陶醉的感觉。所以当新北大公社广播站放起这首歌来时，虽然音乐很欢快好听，但与北大两派激烈斗争的气氛极不协调，让人觉得十分荒唐可笑，不伦不类。特别是在 1968 年 3 月至 8 月的武斗期间，新北大公社的广播站一面放着这首优美轻柔的歌曲，他们的武斗队一面用长矛、弹弓、燃烧瓶攻打对方，抓捕对方的普通成员，甚至关进牢房殴打，打死了赤手空拳的地院附中的学生温家驹、本校学生殷文杰和刘玮，将樊立勤等人用刑致残。歌曲与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让人不禁发生疑问：“毛主席真的是你们的社里人吗？难道是毛主席他老人家让你们这样做的吗？”

在酷狗上搜了一下，这首歌是邓玉华的原唱，确实悠扬婉转，十分动听。

下面是这首歌的歌谱：

1 = $\flat B$ $\frac{2}{4}$

毛主席是咱社里人

收藏人

王程

丹崖曲

5 2	2 1	2 1 5	6	1. 2	5 3	2	-
1. 千山	2. 山	3. 千	那 个 个	万 水 水	呀 呀 呀	连 着 着	天 安 安
千 山 山	那 那 那	个 个 个	万 水 水	呀 呀 呀	连 着 着	天 安 安	门, 门, 门,

5 2	5	2 1 6	1	5. 6	2 1	5	-
毛 主 主	席 席 席	是 是 是	咱 咱 咱	社 社 社	里 里 里	人。 人。 人。	
毛 主 主	席 席 席	是 是 是	咱 咱 咱	社 社 社	里 里 里	人。 人。 人。	

5 5	2 5	6 6	2	5 5	2 1	6 6	5
春 耕 心	夏 锄 员	全 想 到,	衣 食 住,	防 早 排 涝	问 寒 问 暖	挂 在 辛	心, 苦, 分,
领 导	咱 们	来 办 社,		人 人	干 劲	添 十	

2 2	3	5	3	2	-	2. 5	3 2	1 .	6
八 字 主	席	宪 就 农		法 象 业		亲 红 手	太 发	订, 阳, 奋,	
毛 办						亲 红 手	太 发	订, 阳, 奋,	

5 5	6	1 2 3 5	2 .	5	1. 2.	1. 5	6 5 6	5 .	(5
丰 产 的	道 身 公	路 上 社				细 暖	指 在	引。 心。	
照 人 民						细 暖	指 在	引。 心。	

2. 5	1 6	5	1	6 5	2 3	5	-):

3.	2. 5	1 6	5	-	5	-	-
	万	年	春。				

北大井冈山兵团选用了毛泽东作词、李劫夫作曲《西江月·井冈山》作为自己的团歌。该歌曲在 1964 年的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为男声独唱、伴唱，由寇家伦领唱，位于第二场《星火燎原》。歌词如下：

西江月·井冈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
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
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毛泽东这首词写于1928年秋。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军井冈山，在这里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保存下来的部队和湘南农军转移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同毛泽东领导的部队胜利会师。随后，两支军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改称红军第四军（第四军的番号系沿用北伐战争中声威昭著的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的番号，这是因为该军所属叶挺率领的独立团中共党员很多，政治素质优异，战绩辉煌，纪律严明，所到之处，坚决支持工农群众的革命斗争，备受人民爱护）。1928年8月30日，湖南、江西两省敌军各一部，乘红四军主力还在赣西南欲归未归之际，向井冈山进犯。红军不足一营，凭借黄洋界（在井冈山西北部，是进入井冈山五个主要隘口之一）天险奋勇抵抗，激战一天，击退敌军，胜利地保卫了这个革命根据地。这首词是毛泽东在黄洋界保卫战胜利后所作。

由李劫夫作曲，寇家伦演唱的这首歌时而低沉，时而高亢，威武有力，雄浑激越，表达了红军面对敌军围困，毫不畏惧的英雄气概和以少胜多，击溃敌人后的喜悦心情，也体现了毛泽东从容不迫，决胜千里的雄才大略。

北大井冈山兵团作为文革中势力较弱的一方，遭受到以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的打击迫害，直到被围困到几座孤楼上，只有奋力自卫，才能求得生存。他们把这首歌作为自己的团歌，确实反映了被围困时的艰难状态和战胜对方的必胜信念，每当“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那低沉的歌声响起的时候，面对着楼外对方的层层围困，守楼的井冈山兵团战士心情十分沉重；而唱到：“我自岿然不动，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的时候，不由地增添了几分信心；最后两句“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不过是一种幻想罢了。一直到1968年8月19日工宣队和军宣队进校，两派完全停止了武斗，守楼的井冈山人员才安全地撤出。

文化革命结束已经快 40 年了，当年参加文革的青年学生如今都已成为老人。我偶然再听到这两首歌曲，还是会引起对当年北大文革两派斗争的回忆和联想，特别是武斗那惊心的一幕。可见歌曲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给人们的心灵刻上的印记是多么深刻。

希望文革的噩梦永远不要重现。

参考文献：程恺，《毛主席是咱社里人》一歌的创作，《歌曲》1998 年第 11 期

【口述】

一段不愿回忆的经历

郭青苔（张从整理）

时间：2013年10月21日

地点：北京金源大酒店学院路连锁店

受访人：郭青苔（郑州大学退休教授）

主访人：张从

方式：笔记（事后经受访人审阅并补充）

我出生于1940年11月，今年已经73岁了。1961年到1968年在北大技术物理系学习。提起大学生活，我有一段不愿意回忆的经历，今天说出来。

1968年3月28日深夜，在宿舍里听别的同学说校园里发生了武斗，我就跑出来，想去看看情况。到了31楼附近，当时天色很黑，路灯下见31楼北面冲出来一拨人，胳膊上捆着白毛巾，手里提着长矛，看到了我，大声叫“站住！”我刚要跑，一支长矛早已向我刺来，刺到屁股上，鲜血直流，我用手捂住了伤口，几个人扑上来把我按住，说“一定是个奸细”，用绳子把我捆起来，又一把抓下我的近视眼镜，摔在地上，用脚一踩！然后用件旧衣服把我头蒙上，说声“跟我们走！”他们推搡着我大约走了十多分钟，来到不知什么地方的一座楼里，把我交给了一些人审讯。

“叫什么名字？”

“郭某某。”

“哪个系的？”

“技术物理系。”

“哪个组织的？”

“井冈山17纵。”

“担任什么职务？”

“普通一兵。”

“到31楼干什么？”

“就想看看情况。”

“他妈的不老实！打！”

用木棒狠狠地打了我10多下。

“老实交代你在井冈山是干什么的！”

“没有干什么，就是一般战士。”

“去查一下他是干什么的！”审讯者下令。

过了10多分钟，听到有人说：“查出来了，他是井冈山外联组的。”

“哈！还是条大鱼。说，在外联组的任务是什么？”

我惊奇于他们情报的准确。只好说：“就是到外单位，比如其他高校，看看大字报，收集点消息。”

“为什么参加井冈山？为什么反对聂元梓同志？”

“我认为聂元梓犯了错误，把矛头对着革命群众，方向错了。”

“胡说八道，打！”

又是10几棒，打得我站不住了，跌倒在地上。

“你写个认罪书，宣布下山，我们就放了你。”

我想我有什么罪？就说：“如果聂元梓改正了错误，我们可以原谅她，像以前那样支持她。”

“顽固分子，先把他关起来，饿几天再说。”

几个人把我拖到另一间房子，扔在水泥地上。这个房子气味臊臭难闻，通过蒙眼布边缘的细小缝隙，我看到自己躺在小便池旁边，才知道是个厕所。双手依然被反绑着，眼睛被蒙着，什么都看不清，但能感觉到附近还有别人。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又进来几个人，继续审问，基本还是原来那些话，我索性不再回答。他们又用木棒、皮带打了不知多少下，我仍旧闭口不语。

“这个家伙不老实，给他来点厉害的。”

有人把我的右小腿搁在了厕所的小便池台阶上，用木棒狠狠地砸下来，我惨叫一声，剧烈的疼痛，让我昏厥过去了。

等我醒来时，依然躺在厕所地上，右腿沉重的不能动弹，钻心的疼痛，我想：肯定是腿断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一口水也没有喝，一口饭也没有吃。眼睛什么也看不到，

丧失了对昼夜和时间的感觉；我想起了远在河南的父母，他们一定不会知道他们的儿子在北大竟然被人关进了厕所，惨遭毒打，几天几夜水米未进；也想起了兄弟姐妹和要好的同学，不知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他们。

昏迷中强忍着疼痛，忽然，我又被人架起来，拖了一段距离，来到一间屋子，我被扔在地上趴着，只觉得有人用一把椅子（或凳子）的四条腿将我上半身紧紧卡住，有个人一边大声吼叫着审讯我，一边有人噼啪猛击我的臀部和大腿，我忍不住连连惨叫，我感到臀部和大腿火烧火燎地灼痛，可能被打烂了……我的回答还是那句话：“聂元梓如能改正错误，还是好同志”。就这样审讯和殴打交替进行，大约半个多小时，我突然感到自己支持不住了，身子好像散了架，失去知觉，瘫了，眼前出现一片白茫茫云雾，云雾中两三个人影向我慢慢飘过来，由小到大来到跟前，伸出手抓住我的胳膊就走，我突然浑身一颤，惊醒过来！多年后回味当时的感受，我想那就是所谓“灵魂”出窍的“濒死”景象吧？如果当年我没有猛然惊醒，而是跟随云雾中的天使飘走，那么，早在45年前，我的魂魄就已飞升天国去了。

大约到了第四或第五天，在昏昏沉沉中，我被几个人拖出了楼房门口，扔在了地上，有人摘下我的眼罩，忽然受到外面光线的刺激，我什么也看不见，双眼紧闭，井冈山的战友把我抬上急救车时，我强睁开一条眼缝，从睫毛后面好像看到了程汉良、罗英铭等同学，正泪流满面地看着我，我神志恍惚，说不出话来，他们送我到北医三院。后来才知道，是双方交换“俘虏”，才把我放了出来。三院的医生护士立即紧急抢救，给我打针、输液、喂药，慢慢苏醒过来了，经X光检查，我右小腿骨折了，筋腱肌肉严重挫伤和粘连，打上了石膏；而臀部和大腿则是大片大片的青紫淤血和溃烂。因为当时高校武斗，伤员很多，10天后我就出了院，被送到北京地质学院医院继续治疗。

地质学院医院的条件比较简陋，住了10多个北大的伤员，多数是像我这样的。其中有一位男生，一只眼睛被弹弓射中，眼球摘除了，后来安装了假眼。有很多北大同学在这里照顾伤员。最让我感动的是同班的何法信同学，那些天他始终陪伴着我，给我喂饭，背我上厕所，和我聊天。何法信同学言语不多，但头脑清醒，态度鲜明，是极可信赖的人。那时，常来看望我、照护我的还有程汉良等同学。在养病期间，我认识了一位西语系的李姓女生，在那里精心地照顾伤病员。

她皮肤白皙，发涌乌云，明眸皓齿，温柔耐心，她拿了本托尔斯泰的《复活》给我看，还给我带来可口的甜点，我们很谈得来。身体快好时，我向她表示了好感，她却怆然而泣，说道：文革以来父母挨斗，家庭破碎、前途未卜，不是时候。我的心一下子沉到了井里。如今四十多年过去了，不知这位李女士身在何方，生活可好？我衷心祝福她——这位曾经细心照顾我的好女子！

在地质学院医院休养了两三个月，我能够下地了，搬出了病房，住进了一间大教室，那里住着很多避难的北大学生。一直到工人解放军宣传队进驻北大，我才回到了校园。

前几天咱们技物系63级同学晚上聚餐，大家举杯，相互问候祝福，突然有人拍了我一下，叫道：“郭青苔！”我扭头一看，哦！这不正是核物班那个有名的北大公社的“武斗指挥”吗？叫宫某某，我们虽然认识，可从来没说过话！直觉告诉我他很可能直接参与了对我的刑讯。我笑着说：“相逢一笑泯恩仇啊！”他立即答道：“是啊！这都是他老人家的过错！”听到这话，我想，他能这样认识也算不错了。

【资 料】

文革书简

——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信

(1966年6月9日—8月4日)

俞小平

自序

我给我的父母写信，始于1963年到北大上学，终于1990年代末网络电子邮件的兴起。我母亲收藏了我数十年间写回家的全部信件，一封不缺，而我收到的父母写给我的信却是遗失殆尽，因此此处录出的只有我写给父母的信了。我如实录出我在北大文革中写给父母的全部信件，从1966年6月到1970年3月，未作任何修改，仅仅删除了有关家庭和个人隐私的内容。我在这里还收录了一封我写给我的妹妹的信，和一封我母亲的同事写给我母亲的信。信件总计36封。由于我的父母的中共老干部的背景，在相当程度上，我给父母的信读起来如同“工作汇报”。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有些内容有“报喜不报忧”之嫌。

我写信时从来没有想到过会让家人以外的人阅读，因此其内容应该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我写信时的真实想法。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我未必认同那时的想法，但是那已经属于历史的范畴了，我无权作出更改。

为了让读者能够理解信件的内容，我在认为必要的地方在信后附以说明，介绍信件中的人和事的背景。文中附有几篇原信的复印件。

俞小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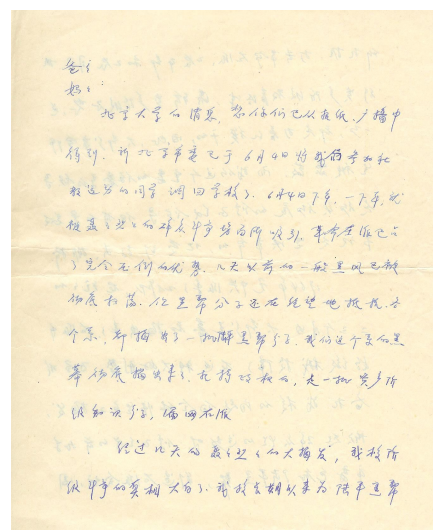
2014年1月11日

第一封信：致父母 1966年6月9日

爸爸、妈妈：

北京大学的消息，我想你们已从报纸、广播中得到。新北京市委已于6月4日将我们参加社教运动的同学调回学校了。6月4日下午一下车，就被轰轰烈烈的群众斗争场面所吸引。革命左派已占了完全压倒的优势。几天以前的一股黑风已被彻底扫荡。但黑帮分子还在绝望地抵抗，各个系都揭出了一批陆平黑帮分子。我们这个系的黑幕彻底揭出来了，把持政权的是一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漏网右派。①

经过几天的轰轰烈烈的大揭发，我校阶级斗争的真相大白了。我校长期以来为陆平黑帮所把握，打击革命左派、工农干部和工农同学，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灌输资产阶级思想，这一切，都是打着红旗干的，因此大部分革命师生被蒙蔽。而我们这个重要的保密系的领导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领导，仅有党总支书记是坚决革命的，但受到打击、排挤。



1964年党中央派来了工作队，在短短的两三个月内，大部分黑幕都揭出来了，右派开始缴械投降了。在这种形势大好，正当准备把我校的问题向全体师生员工揭发、掀起群众性的运动时，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包庇陆平黑帮，制造右派会议，围攻左派达七个月之久，对左派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前北京市委撤换了工作队的领导，邓拓当上了副队长。北大的运动夭折了。1965年9月，毛主席在一次会议上提出要对吴晗进行批判。陆平获此消息后极为惊慌，匆匆忙忙先后两批将一、二年级以外的同学6400多人全部撵下乡去参加运动，这就赶走了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在前北京市委的领导下，为了拖住这支力量，北京市这期四清拖拖拉拉，至今还未结束。但是黑帮分子的好梦不长，新市委将我们全部紧急调回校内，投入文化大革命，围攻黑帮，阴谋被打破了。现在北大已由一个死气沉沉的大学变成了革命的大学，大量揭发了陆平黑帮的种种血淋淋的、闻所未闻的滔天罪行。

很多内部情况，不能在信中写。我想爸爸妈妈一定已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具体情况，我想暑假回来再说吧。

① 中共党内的派系和路线斗争从未停止过，但是以“黑帮”之称命名对立派别，在中共党史上尚属首次。可见毛泽东对他的对手必欲“除恶务尽”。

现在我们正在积极投入运动，彻底深入地开展斗争。这场斗争是对每个人的考验。是真革命哈，还是假革命，这是一个关。我要在斗争中争取做一个真正的革命派。

南京的运动情况怎样？爸爸已回家了吗？这几天一回来就干，简直没空干别的。我身体还好，没病。

小平 6月9日

第二封信：给我的大妹 1966年6月12日

大靖：①

看了你的信我很高兴。现在全国都已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文化大革命。当我们四清还未搞完时，北京新市委将我们紧急召回，参加文化大革命。因为走得非常仓促，回校又立刻投入了激烈的斗争，看大字报，学习，揭发，抄写大字报，讨论研究，参加控诉会、斗争会、游行示威（校内），白天黑夜地忙。反正我们在四清中已经忙惯了，很紧张。所以妈妈要的总结根本没有写，估计短时期内也没空写。

自从中央台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以后，全国人民都关怀北大。你和你的同学对我们很关怀。全国各地都寄来了声援的大字报，最大的大到十五米长、五米宽，从大饭厅的屋梁一直拖到地面。你要我介绍情况，情况是可以介绍的，但校内很多东西需要保密，不能在信上写。现在我给你写一点，暑假如能回宁，当给你们详细介绍。这封信不要随便给人看，跟别人说是可以的。最近几天的报纸要认真读，里面有关北大的介绍，都是最概括、而又代表了全面的。

北大的阶级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但主要是党内斗争和教职工中的斗争，内情我们过去是不了解的。加之阶级斗争观念薄弱，侈谈阶级斗争，而又打着灯笼找也找不到。自从1957年整风反右以来，陆平黑帮就盘踞了北大，逐渐培植起势力，表面上是一所社会主义大学，实际上在向资本主义演变，首先就是1957年反右不彻底，如翦伯赞等一大批人就漏了网。他们继续身居要职，耀武扬威。

① 大靖是我的大妹，时为南京市高中生。聂元梓大字报的发表和《人民日报》的一系列关于文革的社论震动全国，因此大靖写信了解北大情况。

革命左派继续斗争，从来未间断过。在反右倾斗争中，黑帮分子对左派实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迫害之甚，骇人听闻。那时就是“顺我者昌，逆我者亡”，数以百计的革命左派和工农同学遭到排挤、打击，甚至有逼死者。而教育路线则是一整套修正主义路线。我们不是没有意见，而是未能提高到阶级斗争上认识。陆平黑帮给我们定下了数不清的清规戒律——真是比做小媳妇还难。要是有一件事未征求上面的意见就做了，那就是莫大的罪状。陆平黑帮对于中央的指示阳奉阴违。中央命令学大寨、大庆，黑帮拖了半年，不了了之。批判冯定，校内不许见字，以后瞒不过，做一个大报告算完。这几年凡是北大学生当全市标兵的、当团中央委员的，几乎没有好人。这几天大字报中有人讽刺道：“加加林一上青天成委员，高崇寿半篇论文登中央，”横批是“青云直上”。这个高崇寿就是黑帮分子培养出的一个典型。

党中央、毛主席非常关怀我们，把北大当做高校“四清”的试点，派来了工作队。学校和农村不一样，是不需要做多少发动工作的。短短三个月的时间，校内问题已基本弄清。正当工作队要将阶级斗争的情况向全体同学宣布，掀起革命高潮时，前北京市委勒令停止，说运动搞左了。以贯彻“二十三条”为名，打击左派。首先是“拉开架”，把右派弄到饭店去开会，鼓励他们翻案，结果陆平就翻了案。紧急着就开会围攻工作队左派，撤换了队长，黑帮头目邓拓当了副队长。然后调转枪口围攻北大革命左派，达七个月之久。聂元梓和我系党总支书记戴新民就是被围攻的重点。戴新民同志坚决斗争，她说：“北大党委是法西斯党委！”最后也未能使他们屈服。最后，在“给‘三家村’发营业执照的人”^①的策动下，给陆平翻了案，并盗用中央的名义作了结论。在这场斗争中，无产阶级革命派失败了，但是他们仍然在坚决斗争。

1965年9月，毛主席在中央一次会议上指示对吴晗要进行批判。陆平一见不妙，连忙分两批将全部三、四、五、六年级同学6400人赶下乡去参加四清。因为这是主力军，他们了解情况。陆平企图用这种方法拖住革命力量。同时，北京市运动搞得拖拖拉拉，没完没了。11月，姚文元文章发表后，陆平们很惊慌，千方百计地阻挠在校同学搞批判，害怕引火烧身。但是，黑帮分子的如意算盘打

^① 指彭真。

错了，聂元梓同志在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后，采取了最后的措施，贴出了大字报。大字报一贴出来，陆平黑帮大为惊慌，疯狂策划反扑，诬蔑聂元梓是右派，叫嚷“保卫陆平就是保卫毛主席！”陆平的打手们和被蒙蔽的人四处游说，攻击聂元梓等同志，一时风向变了。由于大部分同学不明真相，有些人就贴出大字报反对聂元梓。5月25日半夜，李雪峰同志来到我校，①作出非常策略的发言，实意为让牛鬼蛇神暴露一下。陆平们歪曲了李雪峰报告，一时“黑云压城城欲摧”。在6月1日以前的几天里，谁要敢公开支持聂元梓，立即会遭到围攻，甚至野蛮的暴行。聂元梓同志由于同学们的保护未挨打，很健康。而大部分同学因不明真相，无法判断真伪。

但是，6月1日中央台广播了聂元梓的大字报。经过一天工夫，右派势力烟消云散，革命左派队伍迅速壮大。6月1日中央派来了工作组，第二天全市革命力量都纷纷来增援。大字报如雪片一般贴满了墙，全校都难找出没贴大字报的地方，要道上更是一天一换，革命左派纷纷揭发陆平黑帮的罪行。6月3日吴德同志来作了报告，揭发更深入了。现在黑帮分子已成“瓮中之鳖”。同学们经常保卫黑帮分子，向他们斗争、戴高帽、喊口号。有一个倾向不太好，就是少数人动了手。有一次一个有血债的黑帮分子跑到学生宿舍来，立刻遭到数千人的包围，群情激愤，如果工作组同志不阻拦，那就要打死了。②此人就是我系前任党总支书记，她用放射性物质残害复员军人，使十九个复员军人全部丧失劳动能力，而生物系的一个“土皇帝”，竟将两个放射源放在向他坚决斗争的革命左派床头，致使此人瘫痪。他们迫害一个革命左派，在残酷斗争后，逼令她干重活。她已怀孕，竟让她做清除放射物的工作而毫无防护，结果生下的孩子先天不足，患先天性心脏病。校医院被称为“魔窟”，视工农如草芥，有一外科医生草菅人命，迫得一个病人吊死床头。所有这些罪行，激起了全校革命师生的巨大愤怒，纷纷要求枪毙这些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那个我系前任党总支书记石幼珊，同学们已经写了起诉书，数千人在起诉书上签字，坚决要求枪毙该犯。

① 李雪峰时任中共华北局第一书记。1966年5月彭真倒台后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参与派遣工作组。

② 事件发生时我在现场。当时石幼珊不知道自己已是千夫所指的大坏人，前往学生宿舍区看大字报（就在我住的楼下），被人认出。数以千计的人包围了她，喊打倒她的口号，有人开始殴打她。多亏几个讲政策的同学将她围住保护起来。一个工作组的成员冒险站在二楼窗口，用扩大器大声呼吁大家冷静，才控制了局势。

现在运动正在深入发展，同学们“敢把皇帝拉下马”，向一切资产阶级“权威”开火，包括钻入党中央的一些黑帮分子。康生同志来到我校，看了我们的大字报，大加称赞，表扬同学们的革命精神。北大的同学们还把革命烈火烧到清华大学，打开了清华大学的局面。昨晚来的消息说，高教部长、清华校长蒋南翔已经停职反省。北京其他高校也正在行动起来。现在从运动说来，北大已走到全国大学的前面了。全北京市很多人到北大来声援，同时也将北大当作阶级斗争的最好课堂，受到很深的教育。各系同学都出了数十张纸的大版面，揭发本系的严重的阶级斗争，几天一换，越揭越深。很多同学忙得睡不着觉，顾不得吃饭，每系都揪出了一大批黑帮分子。可以说，从上到下，从校到系，绝大多数权力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而是资产阶级专政。现在他们的一切权力都已剥夺，等待着人民的公审。但是黑帮分子还不死心，他们有时也写大字报，进行反扑。例如报道聂元梓的精神状态如何不好。所有这些，立即遭到革命群众的反攻。昨天我们上翦伯赞家去，向他发出警告，因为这个老混蛋还不老实。我们一喊口号，吓得他直打哆嗦。现在校内是一片红色恐怖，黑帮分子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们的威风早已打得一点不剩了。陆平的门口贴上了“瓮中之鳖”的对子。

怎么样？就说到这儿吧，再多说可不行了。等我暑假回来，一定满足要求。我向你们保证，向爸爸、妈妈保证，一定做革命派，与黑帮分子斗争到底，同时清洗自己思想中所受的坏影响。

再说一遍，这封信不要拿出去，内容可以跟人谈。关于中央的一些情况，你问爸爸、妈妈好了。

请向爸爸、妈妈问好，向嬢嬢问好，①向妹妹们问好，向你们的革命同学们致敬！最近几天的《人民日报》社论要细读，中央精神都在里面。

小平 6月12日

① 嬢嬢是我家的阿姨。

第三封信：致父母 1966年7月9日

妈妈：

现在我们很忙，只有星期日还有些时间。现在运动已深入发展，表面上的轰轰烈烈过去了，内部的斗争更尖锐了。现在各系都在与黑帮分子直接交锋，开大、中、小型斗争会。每天三段时间都闲不下来。七一以前更忙。我参加了七一演出。①陆平黑帮是从来不庆祝七一的，今年正式四十五周年，要热烈庆祝，中央很重视。七一前几天，早上出去，半夜才回来，很累，但心里很高兴。7月1日上午，新任中央宣传部长陶铸同志来做了报告。晚上开了庆祝晚会。

6月18日，北大发生过乱斗现象。当天半夜，召开了全校师生员工大会，宣布了革命纪律。在此以后，这种现象就绝迹了，但是黑帮分子的顽抗还是显然的。现在校内警戒森严，外校人一律不得入校，出入校门要打开学生证。现在每天听揭发、学习、讨论、准备斗争会，深深感到过去学习不够，要学的东西太多了。这些黑帮分子比农村的五类分子狡猾得不可比拟，这也是一种斗争艺术。从运动安排来看，放假大概是不可能的了。

关于游泳，我校的游泳池又修了一次，石板铺底。我个子高，没有没顶的地方，还是比较安全的。

小靖要语录，②这可没有办法，跟村里可不一样，那是农村比较优先，我们又是工作队员，可以订，现在可没法弄到了。小靖今年初中毕业，升学考试是否推迟？高考是推迟了的。恰巧今年征平高中毕业，③不知他考不考大学。毕业的精神准备要早作，我毕业时就作晚了，开始我还不想下乡呢。如果是去劳动，参加什么劳动呢？工业还是农业？如果是农业，最好到农场去。小靖年龄还小，这样比较好照顾，她是需要学一些大靖的老练，能到部队单位更好。妹妹们听过《毛主席与毛远新谈话纪要》没有？如果没听过，我可以抄一份寄给她们。这篇谈话很好，体现了毛主席对青年一代的希望和要求。

曹之于因神经衰弱休学在家，④来信谈了九中的一些情况。现在回想起来，

① 我是校学生会管弦乐队队员，故而参加演出。

② 小靖是我的二妹，是时为南京市初中生。

③ 征平是我的表弟，时为大连市高中生。

④ 曹之于是我在南京九中上高中时的同学，时为上海交通大学学生。

问题的确不少。单纯追求升学率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给我的影响也不小。据家在北京的同学说，北京城里都翻了天了，北京市委、国务院的接待室里整天挤满了人，小学生都敢跑到国务院去告状。

一句话，现在很忙，很紧张，很复杂，形势很好。等把黑帮分子搞完了，搞自我教育的时候，各班的阶级斗争就要充分暴露出来了。现在也有暴露，但暂时还没有发挥的时间。

就写到这里吧，顺便问大家好。

小平 7月9日

第四封信：致父母 1966年8月4日

爸爸，妈妈：

你们好！现在我们真是团团转的忙，忙得团团转。有关文化大革命的大事情，你们一定已经从内部文件中知道了。现在的形势发展极快，前一阶段，从7月12日起开始了评价当前运动的大辩论。形势是瞬息万变，上午一个样，下午风向就全变了，这在大字报中反映特别大。自从7月12日贴出了陈必陶等同学的大字报后（陈必陶与尤克明同班，革命干部子弟），①在全校掀起了大辩论的热潮，也引起了中央的注意。我从一开始就支持陈必陶的大字报。开始两天，也有人骂它是“大毒草”，“反党反社会主义”。19日王海志等人贴出了《致党中央、毛主席的公开信》，使辩论更加深入，讨论工作组的错误。这个《公开信》，我从一开始就是反对的。我们几个人经过对这个人的日常了解，和对王海治在发表《公开信》前后的大字报的分析，认为这个人是在投革命之机，而且投得很准，这使群众都以为他是个最革命的左派。我们写大字报进行了揭露。现在他们班的同学揭发王海志治的大字报与华北局调查组有联系，王海治等矢口否认，但不敢触及事情的实质，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调查。以上两份大字报，爸爸妈妈都知道了吧？中央首长特别关心我校文化大革命。中央文革小组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同志亲

① 1. 地球物理系陈必陶等贴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发动群众。2. 尤克明是地球物理系学生，也是校管弦乐队成员。我母亲认识他的母亲。

自来到我校，召开座谈会，看大字报。看到中央首长来，同学们特别兴奋，往往一下子几千上万人把首长围起来，高呼“毛主席万岁”，特别是看到江青同志特别如此。每次首长都要给大家讲几句才走得了。7月25、26两日晚上，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全体成员和李雪峰同志、吴德同志来参加了我校万人辩论会。会议由江青同志主持，会上各种不同意见充分发表。最后，陈伯达同志建议撤销不革命的工作组，让革命群众自己干。

会上江青同志也作了揭发。其中一个问题就是张承先重用全国通报的政治骗子（既然是全国内部通报，你们都知道吧？）张文秋的女儿张少华（历史系五年级学生，以“毛主席的儿媳妇”招摇撞骗）。江青同志说到这件事时非常激动，她宣布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同学们也非常愤怒。第二天张少华就逃回家去了，一直不敢露面。李雪峰同志也在会上检查了官僚主义，用人不当，没有及时发现、处理。

会后有人就以此来攻击李雪峰同志，有人甚至要李雪峰同志检查立场问题，有些人曲解李雪峰同志的一些报告。我看见有人攻击我们的首长，我们的革命前辈，肚子里就有气，有些人就不是善意的。有些同学说我是“保皇派”，说这是迷信，不敢提意见，根本不是这么回事。现在没什么可怕的，并不是怕提意见。如果是为了提意见，被扣上一两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也没有什么，尤克明就被扣过。学生中间就是复杂，特别是北大，受陆平黑帮毒害不浅，各种思想都有，现在正好是个大暴露，现在我们班思想斗争也很激烈。我们班工农、革干出身的同学少，我也当了干部了。现在这个干部还真叫不好当，大家特别不听调度，什么怪思想都有，还特别复杂，有些人就是离心离德。

要想把这半个月的事一件一件说清楚，那就太费时间了。现在学校里已经成立了文化革命筹委会，革命自己干，经验自己摸。现在也真可以说是轰轰烈烈了，每天外校要来几万人，我们也常常到外校去“造反”，“煽风点火”。

前不久，我们班有个同学（革命干部子弟）的父亲（郑州大学副校长）被作为黑帮分子揪出来了。^①因此我也应该考虑考虑，我的父母有没有问题。据我想，黑帮大概当不了，大字报少不了挨几张。特别是爸爸，我想准得挨几张，官僚主义恐怕有点，生活上爸爸不如妈妈简朴。还有特殊化也是有的。以上问题请爸爸

^① 这位郑州大学副校长是我班同学的父亲郭晓棠，他在文革开始时被河南省委当靶子抛出，1969年被迫害去世。

考虑。我们家过去不是经常开家庭会议吗？我跟同学谈过我们家的家庭会议，有些同学觉得有点不可思议，觉得太民主了，儿子怎么可以批评老子呢？老子怎么可以向儿子作检讨呢？可见得这还是我们家的好传统。这些天接触中央首长不少。7月29日那天，我去人民大会堂参加了北京市大中学校文化革命积极分子代表会议，①听了邓总书记、周总理、刘主席的报告，还见到了毛主席。这真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刻。中央首长，不论是谁，只要一开口，第一句总是“我们是来当小学生的”，非常谦虚，可我们总是很不谦虚。既然中央首长都这样谦虚，那么儿子批判老子完全是可以的。还有一点，过去爸爸妈妈对我们传统教育做得不够。

另一件事，现在是否能把那只表寄给我。这些天自己支配的事比较多，越来越希望能有一只表，希望现在就能寄来。还有，我没用过表，要附上使用方法，保存注意的方面。既然暑假不能回家，我打算衣服就在这里做。

今天就写到这里吧。信写得太长就不好了，炎热的北京夜晚中，也不宜老坐着写信。下次我要写一封信，鼓动大靖、小靖她们造反！

小平^② 8月4日

（张从提供）

① 我被我班同学选为代表去开会。去之前只被告知去人民大会堂开会，并不知道那是什么名目。会议由新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主持，会上宣布撤销派往各校的工作组。这是刘少奇最后一次在公共场合讲话。

② 在工作组问题上，我做了“保皇派”。由此看来，我对复杂的政治很不敏感。如果聂元梓大字报贴出时我在校，我多半也是个保陆平和校党委的保皇派。

【资 料】

北京大学 1966 年大事记

1 月

1月11日 校刊《〈海瑞罢官〉讨论》专栏第二期发表《我校师生讨论〈海瑞罢官〉中的不同意见简介》，并加编者按说：希望在讨论中“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特别是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和道德继承问题继续发表意见，通过深入讨论，达到分清是非，提高认识的目的”。按语强调，要“以毛泽东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是非标准。”同日，中文系全体同学举行论文报告会，对有关《海瑞罢官》的问题展开学术讨论。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讲话，提出三点要求：（一）《海瑞罢官》的讨论，是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毛主席思想作为进行这场革命的锐利武器；（二）进一步贯彻党的“双百”方针，既要旗帜鲜明，又要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防止粗暴简单；（三）要把学术讨论和改造思想、学习专业紧密联系起来，提高毛泽东思想水平和业务能力。

1月12日 法律系党总支委员会研究学术批判如何深入的问题。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出席并讲话，说：“当前学术批判文章质量不高，缺乏说服力，有些空对空”，希望法律系加强学术研究，写出有质量的文章，并希望将海瑞断狱的资料进行系统整理，编出资料。

1月16日 北京市高等院校冰上运动会在未名湖冰场举行。我校王复兴获男子3000米速滑冠军。

1月18日 从1月13日开始至今日，我校一千五百余名民兵参加民兵寒假集训。

▲校刊《海瑞罢官讨论》专栏在《百家争鸣，各抒己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总标题下，发表中文系同学讨论《海瑞罢官》的不同意见综述。

1月24日 校党委常委会开会，决定25日党员干部会的议程为（一）把党员干部整风学习的结果向大家报告，澄清是非，提高认识，增强团结；（二）布置当前工作和今后任务。会上，要说明社教工作队不再回来了。

1月27日 校党委常为了推动北大文革历史研究工作的进行，笔者建议：

1. 熟悉北大文革历史并愿意从事这项工作的校友组织起来,建立研究队伍,吸收原两派的人员参加;
2. 制定研究工作计划,重点放在北大文革中的重要事件上;
3. 采用收集书面资料和采访当事人相结合的工作方法,特别注重口述历史;
4. 多方面筹措研究经费,争取企业家校友的赞助。

委会听取 25 日党员干部会后干部讨论的情况。汇报说,与会干部对(校党委)总结和陆平的报告表示同意和满意,希望校党委改进领导,树雄心、立大志,把北大工作搞得更好。

1月28日 校党委通知:尔联柏调离党委保卫部,另行安排工作,免去其保卫部部长职务。

1月29日 中国科学院党委、高等教育部党委关于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了结晶牛胰岛素给党中央、毛主席写了工作报告。《报告》称:“中国科学院生物化学研究所、有机化学研究所和北京大学化学系三个单位协作,经过 6 年又 9 个月坚持不懈的努力,攻克了许多技术难关,于去年 9 月 17 日,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一种蛋白质结晶牛胰岛素。这是建国以来我们在理论研究方面的一项重大成就。”《报告》第一部分讲述了该项成果的科学意义。第二部分讲述了工作的过程。指出有的试验“从失败的教训中,开辟新途径。在经过 600 多次的试验失败后,终于在 1959 年初首次获得胰岛素 A、B 链拆合成功”。在 1960 年初战告捷后,“部分同志中滋长起盲目乐观的情绪,产生了轻敌思想”,“领导思想上也急于求成”,组织了上海“三个研究所的 340 多个研究技术人员,北大 200 多师生,日夜奋战”,但是“没有作成功”。这时“有些幸灾乐祸的人,发出了各种责难”,我们组织大家“进行了一次全面总结”。认识到:“做法必须改变,力量应该调整,步子要稳当,工作要踏实,但是方向必须肯定,必须坚持做下去”。于是在三个单位“组织了一支 30 多人的精悍队伍,继续坚持工作”,“一步一个脚印地进行试验”,“所做过的化学反应、提纯、分析鉴定数以万计”,终于取得了最后的成功。

2月

2月1日 历史系举行半工半读开学典礼,邓拓、翦伯赞、宋硕、陆平、

彭珮云等出席大会。为总结半工半读经验，校党委副书记彭珮云到历史系昌平十三陵基地蹲点。

2月2日 校党委常委会开会，传达市委大学部工作会议精神：（一）中心是备战、备荒、为人民。学校工作也要立足于备战，做好早打大打的准备；（二）要提高党的战斗力，战争打起来，党要成为坚强堡垒；（三）大学文科要搞半工半读。

2月5—8日 校党委、校行政分别召开党员干部会和校务委员会，部署学习毛主席著作。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在两个会上强调，在一切工作中要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把活学活用毛泽东著作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

2月11日 校党委宣传部、组织部召集部分党政干部座谈学习焦裕禄事迹。

2月12日 校党委常委和多数系的党总支分别组织学习焦裕禄的模范事迹。陆平在布置学习焦裕禄的总支书记会议上，要求党员、干部以焦裕禄为榜样，对照自己的思想、领导方法和领导作风找差距，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更好地促进思想革命化。

2月21日 校党委召开文科党员、理科党总支书记会议，传达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的汇报提纲。

2月22日 校刊《〈海瑞罢官〉讨论》专栏第四期继续发表讨论中的不同看法和有关道德继承问题的争鸣文章。

2月23日 校党委常委会开会，决定技术物理系的扇形回旋加速器上马，并上报高教部和国家科委、北京市委；学校由周培源负责汉中分校，并决定汉中分校临时班子由郑乐民、赵元果、朱照宣等组成；力学专业、无线电系、技物系核物理专业一年级学生今年9月直接去分校报到，以上系和专业现在在校的一年级学生3月15日去汉中分校。

▲校党委常委会决定：任命沈克琉代理自然科学处处长职务，华彩文代理副处长职务，沈克琪参加分校领导小组。

2月25日 我校召开1966年基层选举动员大会。校党委常委伊敏做动员报告。会上宣布成立11人组成的选举工作组，由周培源任组长，伊敏、李醒民、周华民、郭景海任副组长。

2月26日 校党委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讨论北京市第二届民兵代表会议

精神。会议强调要突出政治,加强战备,实现民兵工作三落实。

3月

3月3日 校刊在《学习焦裕禄同志,做毛主席的好学生》的通栏标题下,发表各系学习焦裕禄的文章。同日,校刊还发表了中文系五年级语言班在晋南进行的以汉语拼音、扫盲和拼音教学为中心的调查实习的情况,并在《〈海瑞罢官〉讨论》专栏中继续发表师生有关的讨论文章。

3月5日 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来校做报告。

▲陆平到十三陵历史系半工半读基地做教改动员报告,希望他们写好三部书:《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和《考古学》。

3月7日 从2月23日以来,校党委连续召开扩大会议,传达、贯彻北京市委学习毛主席著作经验交流会精神。会议讨论了如何突出政治等问题,并安排了学习内容,规定了学习制度,提出了贯彻措施。

3月8日 校党委常委会议决定成立党内教学科研小组。其目的主要是根据主席思想加强教学科研中党的领导,把党的方针、政策进一步落实到教学科研领域中去。小组的任务是进行调查研究,提出建议,具体执行党委决定。具体分四个小组:理科小组由张群玉任组长,文科小组由崔雄崑任组长,语言小组由黄一然任组长,学术小组由陈守一任组长。另外,半工半读一摊由彭珮云负责。

▲校党委决定:撤销研究生办公室,其招生任务合到教学行政处,研究生培养工作分到两个教学处。

▲校党委常委会通过哲学系临时党总支委员会委员名单,并决定任命赵正义为临时党总支副书记;同意冯至继续担任西语系第一副主任;批准北大附中党支部改选结果,党支部书记为刘美德、副书记为贾世起。

3月11日 学校召开理科全体教师大会,化学系无机化学教研室介绍了他们学习毛主席教育思想、贯彻“少而精”、提高教学质量的体会。

▲校刊《〈海瑞罢官〉讨论》专栏第六期集中发表了有关如何看待“清官”的争鸣文章。

3月22日 校刊就学生开展人生观的讨论问题发表了《不为名,不为利,不怕苦,不怕死,树立一心为革命的人生观》的短评。

3月25日 戚本禹批判我校教授翦伯赞的文章《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在报上发表。

3月27日 校党委常委会决定：赵元果调动工作；由刘元方代理技术物理系党总支书记，徐宁、王肇明代理总支副书记。

3月29日 我校法律系撰写的《试论海瑞的平冤狱》一文，以史群的署名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批评吴晗在学术研究中的“超阶级”观点，并认为他夸大了海瑞“平冤狱”的作用。

3月30日 校党委常委会议：（一）决定同意图书馆系办函授；（二）决定语言科四年级下学期下去“四清”。

3月31日 历史系召开党员、积极分子会议。彭珮云在会上传达市委邓拓的讲话精神，说：“在当前的学术革命中，既要认真刻苦地学习毛主席思想，又要认真刻苦地掌握大量史料，进行科学分析”，“只有做到两个刻苦，才能压倒对方。”说要贯彻“放”的方针，在学术研究中应“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彭珮云传达了市委要求历史系组织人力写批判《海瑞罢官》文章的意见。当晚，历史系成立了《海瑞罢官》批判小组。

4月

4月1日 市委大学部召开全市各高校干部会议，介绍北师大、北师大及北京大学法律系学术研究、学术批判的经验。会上，散发了《北京大学法律系师生查阅1500卷史料，证明海瑞“平冤狱”完全是假的》的简报。

4月3日 北京大学选区选出海淀区第六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沈同、马振明、王淑芝、林芳禧、刘麟瑞、蒋绍愚。

4月5日 校党委组织部1966年第一季度党组织、党员人数统计：全校共13923人，其中教师2142人，职工2725人，本科生8712人，研究生、进修生205人，附中教职工139人，附中学生1655人；全校党员共2208人，其中教师党员794人，职工党员687人，本科生党员600人，研究生进修生党员93人，家属党员8人，附中党员26人。全校建有党支部137个。

4月7日 校党委常委会讨论文科半工半读和学术批判问题，决定把文科小组和学术小组合在一起由崔雄崑负责，陈守一任副职；决定太平庄和哲学系搞三

年制半工半读试点，由彭珮云负责；当前重点搞翦伯赞的问题。

▲校刊《〈海瑞罢官〉讨论》专栏第七期，继续发表有关“清官”问题的争论文章。同期校刊还报道了戚本禹批判翦伯赞的文章发表后，历史系师生对翦伯赞的历史观点的批判情况。

4月12日 4月5日和12日，校党委两次召开文科部分老教师座谈会，对翦伯赞的“反马克思主义史学观点”进行揭发、批判。

4月14日 学校召开文科部分青年教师、研究生、大学生座谈会，揭发、批判翦伯赞的“反马克思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史学观点”。

4月16日 《北京日报》发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文章，点名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在我校师生中引起很大反响和震动。

▲学校召开八千人大会，声讨、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立场和思想。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在会上说：当前这场斗争，是一场政治思想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种世界观的斗争，要求大家“站在斗争的最前线”，投身到当前政治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去。

4月21日 学校决定，抽调历史系、法律系、政治课教研室部分师生组成批判组，由法律系党总支统一领导，研究批判翦伯赞的史学观点。

4月22日 《北京日报》发表我校历史系、法律系合写的批判吴晗“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文章。

4月23日 校刊转载《人民日报》发表的《翦伯赞同志的反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点》一文。《人民日报》编者按说：“在近年来我国史学领域的阶级斗争中，吴晗同志和翦伯赞同志都是反马克思主义史学的主将。“要彻底揭露、彻底批判、彻底打倒历史学中的资产阶级思想”。

5月

5月4日 校团委举行纪念“五四”运动47周年大团日活动，表扬、命名四好团支部，动员、组织团员和广大青年积极参加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

5月8日 校刊转载高炬、何明的两篇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和《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时转载林杰等编撰的文章《邓拓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学校举行 1966 年春季学生田径运动会。

5 月 11 日 校党委会决定：（一）653(汉中)分校定名为北京大学分校。（二）确定分校三条办校方针：（1）学习抗大精神，把分校办成一个无产阶级革命化的学校；（2）从备战长远考虑，要办成一个能独立作战的分校；（3）要贯彻中央关于半工半读、校社结合等办学方针。

5 月 12 日 校党委会研究学术批判(文化大革命)问题，提出要加强对学术小组的领导，定期分析研究。

5 月 13 日 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中央批发的《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开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

▲校党委会决定：文化革命由常委会直接领导。

5 月 14 日 党委书记、校长陆平召开干部会议，传达宋硕在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召开的各校党委书记紧急会议上传达中共中央华北局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坚守岗位”，“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康生派他的妻子曹轶欧和高教部副部长刘仰峤，马克思主义学院的张恩慈(原北大哲学系教师)等七人，以中央理论小组调查组的名义来北京大学“调查。曹任组长，刘任副组长。

5 月 15 日 校党委会研究当前文化革命运动的部署。（一）决定召开党委扩大会议，揭发邓拓和北京市的三个报刊，并向市委正式请示怎么搞。（二）6 月份文科 1700 人外出劳动，但一定要服从文化革命；（三）考试：理科未考的一门课延至期末或下学期，7 月考的考二门；（四）原定理科干部整风(5 月)，现决定积极投入文化革命，不再进行单独整风。

5 月 16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五一六通知》。《通知》号召向党、政、军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猛烈开火。

5 月 17 日 校刊转载姚文元、戚本禹的两篇文章：《评“三家村”》和《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

▲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正式来函：介绍曹轶欧、刘仰峤、张恩慈等七人来校调查文化革命情况。

5 月 18 日 校党委会决定（一）数力系学生不去汉中分校劳动；（二）任命赵茂勋为留办副主任；（三）北大附中汇报学生要“造反”，常委会意见：现

在不下结论,要他们上课守纪律,并将情况上报市委。

5月中旬 曹轶欧调查组在住地西颐宾馆与聂元梓(哲学系党总支书记)、杨克明(哲学系教师)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

▲曹轶欧两次约北大市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第一次在陈家中,第二次在西颐宾馆曹的住处)。曹说:北大学术批判有问题,你应该揭发。陈说:“不知道有什么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曹:“这不是你的问题,你应该勇于出来揭发陆平和市委领导。”陈:“北大的学术批判,(常委分工)是我具体负责组织的,如果有问题,请向我提出来,以便改正。”曹:“这你不负责,但你要揭发。只要揭发,你什么责任也没有的。”陈:“我不能这样看问题,我做的事,责任也不能推给别人。”曹:“你们应该揭发陆平、宋硕。最好你领头,你可以和聂元梓等人共同来搞。”曹因两次都遭到陈的拒绝。最后只好表示“算了”,但又叮嘱陈: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必须绝对保密。

5月20日 下午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传达中央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5月23日 下午,校党委常委开会。张恩慈来电话,传达曹轶欧的意见:要把孙蓬一、孔繁、李清昆等人调回来,参加理论小组(调查组)工作。常委同意,决定由伊敏办。

▲晚,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哲学系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量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科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大字报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改写,聂元梓最后加工定调,并签了第一名。这张大字报题为《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

5月24日 党委传达中共中央批转国务院外办关于文化大革命宣传的请示报告。规定了内外有别的原则,涉及内部政治运动,要对外保密。

5月25日 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等七人签名的《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的大字报在学校大饭厅东墙上贴出。大字报引起了全校的激烈争论和思想混乱。大多数师生员工认为这是一张用诬蔑不实之辞攻击、诬陷北大党委和北京市委的大字报。聂元梓等人明知他们集中攻击的“宋硕讲话”是华北局指示,却硬说这是宋硕、陆平、彭珮云的阴谋诡计。

▲晚,校党委常委开会研究聂元梓等七人大字报问题,并请示国务院外办。外办副主任张彦答复:这是党和国家纪律,不要违反国家利益,要内外有别。常委中有两种意见:一种认为对大字报要加强管理,坚决按中央文件精神办,动员聂本人把大字报揭下来贴到指定地点(室内);另一种主张坚决支持群众运动,支持大字报,支持左派。大字报已贴出了,不能揭下来。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要陆平对聂元梓大字报明确表态。陆平表示,把他和宋硕说成黑帮,不同意。多数常委也表示“大字报不符合事实,不能同意”。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表示欢迎对党委的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边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精神。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校党委常委崔雄崑拒绝出席大会。周恩来总理派中共华北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等来北大,于当夜12点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等的大字报不应贴在外面。张彦传达周总理的指示说: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党有党纪、国有国法,要认真遵守。李雪峰讲话说:“我们来了惊动了你们,你们也惊动了我们,你们贴出了大字报,是好事。北大是有革命传统的,在全国、全世界都有影响。搞好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要按中央指示进行。北大的党要把运动领导好,斗争要有组织、有纪律、有秩序、有领导。党内有民主集中制,党有党纪、国有国法,不是乌合之众,不能乱七八糟。”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七人贴出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后康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稿直接送给当时在外地的毛主席。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9日 校党委常委开会听取文化革命办公室上周运动情况汇报。汇报说,(一)到26日晚,不宜贴在外面的大字报,经引导已转入室内;(二)26日晚,召开了党总支书记会议,提出了三条:(1)注意保护群众革命热情,(2)对内部大字报要加以引导,(3)内贴大字报要注意摆事实,讲道理,不要扣帽子;(三)据学三食堂统计,27、28日两天,内贴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近四百张。会上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崑提出,我们的运动,势必牵扯社教运动和推行修正主义路线问题,北大党委能否搞好?群众对党委又相信又不相信,必须请求上面派工作队来。

▲戈华、崔雄崑正式写报告,反映“陆平镇压革命的罪行”,要求中央、华

北局派工作组来校领导文化革命。

5月31日 崔雄崑给康生写信,反映北大存在的“严重问题”。

6月

6月1日 晚8点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主席的批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播出后,全校震惊。当晚许多人打电话向广播电台质询,是“谁让广播的?”电台统计,当晚接到质询电话59次。同日晚,华北局负责人在北京饭店召集张承先等人开紧急会议,讨论工作组进驻北京大学的工作方针和行动计划。决定采取“放手发动群众、坚决依靠左派、争取中间、控制右派的措施”。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32人进校。随即召开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由华北局负责人宣布:北京大学党委抗拒文化大革命,压制群众,打击左派,包庇右派。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资产阶级反动堡垒。华北局决定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进校,放手发动群众,坚决支持革命,把北京大学的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会上,华北局负责人并向“党内坚决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提出警告:必须老老实实彻底交待自己的罪行;必须停止一切非法活动。同时向党委宣布约法三章:不许搞秘密活动;不许搞两面派;不许阳奉阴违。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将播发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后接到群众抗议和质询电话59起的情况写成《情况反映》上报。康生看后批示:“这就是北京市委、大学部宋硕、陆平、彭珮云、北京大学党委长期欺骗学生群众的反映。当前,最主要的是,揭破黑帮(宋、陆、彭等等)的阴谋欺骗,使广大群众……清醒过来……”。

6月2日 凌晨零点30分,华北局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一千多人出席。会上,宣布华北局决定:派工作组进校领导文化大革命。工作组组长张承先讲话,表示坚决支持革命,宣布昨夜提出的约法三章。同日,首都各报全文发表聂元梓等七人的“大字报”。《人民日报》则以《北大七同志一张大字报揭穿了“三家村”黑帮一个大阴谋》为标题全文发表这张大字报,并配发了由王力、关锋、曹轶欧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该文诬蔑北大党委是“假共产党”、是“修正主义的党”,说:“为陆平、

彭珮云等人多年把持的北京大学，是三家村，黑帮的一个重要据点，是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煽动“把他们打倒，把他们的黑帮、黑组织彻底摧毁”。

▲下午，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张承先、曹轶欧、刘仰峤、杨以希、武振声等开会，决定组织全校师生围绕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展开讨论，发动群众。

▲《北京大学》校刊（出至第531期）被工作组决定停刊。

6月4日 凌晨1时30分，工作组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学生干部大会。吴德做报告，宣布新改组的中共北京市委做出的改组中共北京大学委员会的决定。决定如下：（一）派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到北京大学对社会主义文化大革命进行领导（工作组改定名称为：中共北京市委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二）撤销中共北京大学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的一切职务，并对北京大学党委进行改组；（三）在北京大学党委改组期间，由工作组代行党委的职权。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并向学生讲话说：“北大是地富反坏右的反动堡垒，他们是在培养资产阶级反革命和叛徒当接班人，是一个很顽固的堡垒。”陈向工作组指示：“要依靠群众，组织坚定的左派队伍，要争取中间多数，分化那些少数坏的，孤立打击最坏的。”

6月5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做无产阶级革命派，还是做资产阶级保皇派》的社论。社论说：北大社教运动后期召开的国际饭店会议，“这是1965年发生的一个极端严重的反革命事件”。“北京大学的斗争是无产阶级革命派和资产阶级保皇派的斗争，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斗争，是革命和反革命的斗争，是极其尖锐的阶级斗争”。

▲晚，工作组领导小组开会。经曹轶欧、刘仰峤的推荐、介绍，认为原北大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和原北大党委常委、教务长崔雄崑和陆平“黑帮”不是一伙的，在旧党委内是进行斗争的，受排挤的。决定吸收他们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并报市委审批。

6月6日 上午，康生来校看大字报并对学生讲话，说：“你们的革命热情很高，这很好。不管他彭真也好，陆定一也好，陆平也好，一切牛鬼蛇神、修正主义分子都不可怕。我们要和他们斗争到底。”

▲据工作组统计，从6月1日至今，六天内，校内贴出五万余份大字报，每

天来校看大字报的达十万人左右。工作组领导小组分析形势说,“原北大党委及所属各总支部,除哲学系外,全部陷于瘫痪”。

▲工作组在哲学楼前发现一条用石头垒成的“黑帮打不倒”的标语。

6月7日 从中央国家机关、海军航空兵、各省、市紧急抽调来的大批工作队员进校,从而,自校到系全部实现了由工作组领导。

6月8日 吴德办公室通知,经请示李雪峰,同意彭林、戈华、崔雄崑三人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

6月9日 张承先工作组给李雪峰上报《北大文化大革命一周基本情况和初步打算》。报告说:要“彻底摧毁北大这个被资产阶级长期统治的反动堡垒”,把“领导权夺过来”。“要批判和清洗那些混进党内来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北大当前斗争的焦点是要挖掉钻入党内的以陆平为首的这一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黑帮”。“集中力量对准反革命黑帮的核心集团,大揭、大批”。

6月10日 工作组统计,迄今,中共北京市委北京大学工作组共有208名队员。其中地方干部122人,军队干部86人;13级以上干部62人,14—17级干部83人,18级以下干部63人。

▲工作组领导小组会研究确定:由刘仰峤、曹轶欧成立专案小组,研究“陆平、彭珮云反党反社会主义集团的政治问题;由戈华、崔雄崑负责抓教学、行政工作;杨以希抓组织工作;彭林负责安全保卫工作;武振声负责外事、留学生工作;张德华负责办公室、资料、简报工作。办公室主任聂元梓,副主任杨克明。

6月11日 历史系副系主任、三级教授、中共党员汪钰,受到许多大字报的攻击污蔑和人身侮辱,服毒身亡,时年50岁。

6月12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停止高教部部长、原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的工作。北大部分学生闻讯,拥向清华声援造反。同日,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刘仰峤调回高教部。

6月13日 中共北京市委召开干部会议。张恩慈、孔繁(哲学系教师)在会上控诉“陆平黑帮在北京大学执行修正主义路线,实行资产阶级统治的罪行”。

6月15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师生员工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张承先做“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放手发动群众,壮大革命力量,明确斗争目标,贯彻党的政策,依靠北大广大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同学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

革命”的动员报告。他说：“北大是被资产阶级长期垄断、专政的一个反动堡垒”，“文革”的任务，“就是要彻底摧毁这个反动堡垒，结束资产阶级的统治”，夺回领导权。说这场革命的主要矛盾是：“广大工农兵群众、广大革命干部、广大革命知识分子同一小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的对抗矛盾，是革命和反革命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敌我矛盾”。打击的主要方向、斗争的矛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关于斗争方法，他说：我们“主张摆事实讲道理。只图痛快，出气、打人、戴高帽子不解决任何问题”。他表示“不赞成这种做法”。

6月17日 从6月初开始，各系各单位揪斗干部、教师的行为逐步升级，戴高帽子、挂黑牌、推搡、揪头发、坐喷气式、毒打、往身上贴大字报等情况日益加剧。工作组采取了一些劝阻措施，但未能奏效。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截至今日，被乱打乱斗的干部、教师、学生178人，其中有“黑帮”分子45人，有错误缺点的120人，“五类分子”（即地富反坏右）7人，好人6人。

6月18日 一些人在38楼等处设了“斗鬼台”，四处抓干部、教师来批斗、游街、罚跪、挂黑牌、戴高帽、用墨汁涂面、拳打脚踢，甚至发生严重污辱女干部女教师的流氓行为，直至工作组组长张承先等赶到现场制止，才逐渐结束。据工作组秘书处统计，今日共有69人被抓到“斗鬼台”等处批斗。工作组并抓出四个打人最凶和侮辱女同志的人，其中一人是校外混进来的。当晚，工作组领导小组开会。晚10点，工作组召开全校广播大会，张承先做广播讲话。他在揭露了校内外四个坏人之后说，这些坏人利用革命青年的革命热情，浑水摸鱼，制造混乱，他们的行为是破坏运动的反革命行为。他强调要加强革命秩序，提高革命警惕，防止少数坏人钻空子，在工作组的领导下搞好文化大革命。

6月19日 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呈送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在《简报》中讲了“六一八”事件的过程和四个人带头打人、耍流氓的情况：一个自己承认打了八个人，并对女同志耍流氓；一个是国民党上尉连长、隐瞒反革命身份，混入革命队伍，曾因贪污判过刑，后来到北大，这次打人最凶；一个在斗争女干部时，撕破该干部的衣服、乱摸其乳房、阴部，并在群众中对两个女同学进行猥亵，被扭送到校卫队；还有一个是校外混进来的，到处起哄。然后讲了工作组采取的措施：（一）召开各系工作组长紧急会议，要求高

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教育群众,擦亮眼睛,增强革命警惕性; (二) 各系召开师生员工大会“号召大家引起警惕,严防坏人破坏”; (三) 校工作组长张承先召开大会,表示“工作组坚定地支持真正左派的革命行动,同时,明确指出避开工作组乱打乱斗的做法是有害于革命运动的行为; (四) “依靠革命左派,组织起来,维护无产阶级革命的秩序”。

6月20日 中共中央将北大工作组“六一八”事件的《简报》批转全国。中央批语说:“现将《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9号)发给你们。中央认为北大工作组处理乱斗现象的办法是正确的、及时的。各单位如果发生这种现象,都可参照北大的办法处理。”

6月21日 工作组向中共中央和中共北京市委呈送《关于北京大学二十天文化革命情况的报告》。其中,第一部分讲了“半月革命风暴,一片大好形势”。第二部分讲了运动过程。第三部分讲了“六一八”事件经过,然后指出:“现在初步查明,这完全是校内外敌人结合对我们实行的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企图打乱我们的作战部署。“我们抓住这场反革命分子制造混乱、破坏文化大革命的事件,召开了全校广播大会进行了揭发,用以教育群众接受教训”,教育群众“按毛主席指示办事,按党的方针政策办事,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秩序,在工作组领导下进行斗争……把黑帮分子与一切牛鬼蛇神揪出来”。这个报告稿由张德华批示:“请承先、大姐(按:指曹轶欧)审阅后印发”。曹轶欧批示:“德华同志:报告写得很好,在策略运用上,狠下了一番功夫,没有什么不同意见。曹轶欧 6月21日”。

6月22—23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万人“揭露、控诉”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哲学系孔繁、原哲学系教员张恩慈在会上做控诉发言。

6月25日 周培源副校长主持召开653基建工程修改建设计划方案的会议,重新修订了计划方案,增加了干打垒面积。原计划总建筑面积中尚未完成的工程30%进行了适当改变,减少面积6800平方米,新方案西北局已批准。总预算投资额1100万元。

6月26日 工作队秘书组不完全统计,6月1日至今,全校各级干部、教师被斗人数已达230人。其中被撤职2人,停职2人,群众罢官153人;被斗192人,被打94人,戴高帽游街107人。另统计,校系两级干部188人中,被斗94

人，占总数 50%。其中撤职、停职各 2 人，群众罢官 90 人；被打 44 人，游街 44 人。

6月27日 下午，陈伯达来校看大字报，并听取张承先、曹轶欧的汇报。他要工作组迅速绘制“陆平、彭珮云黑帮”政治关系和社会基础图表。并说：“六一八”事件不简单，是一个反革命事件，一定有一个地下反革命司令部，要把这个地下司令部挖出来。

6月29日 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名单(负责人)如下：

领导小组组长：张承先

组员：曹轶欧(女) 杨以希 张德华 彭林 刘仰峤(已调回高教部) 武振声 戈华 崔雄崑

领导小组办公室(一)主任：李芳林 副主任：任小风 刘寄久 张恩慈

组织组组长：古天佑

动态组组长(缺)

领导小组办公室(二)负责人：蔡润田

各系工作组负责人名单：数学力学系工作组组长路砚农，副组长霍言、时凤昌；物理学系工作组组长韩增敏，副组长程力新；技术物理学系工作组组长徐千里；无线电电子学系工作组组长王布云，副组长焦志成；地球物理学系工作组组长刘玉元；化学系工作组组长谭治，副组长罗根、江水；生物学系工作组组长张学仪，副组长张瑜、张伟；地质地理学系工作组组长刘玉德；中国文学系工作组组长赵烽(女)，副组长张晓山；历史学系工作组组长李清和，副组长张晋德、刘世雄；哲学系工作组组长冀增；经济学系工作组组长凌祖佑，副组长郭林泉；法律学系工作组组长张文林，副组长王信善；政治学系工作组组长冯毅，副组长班志萍；图书馆学系工作组组长李斌；东语系工作组组长乔公望；西、俄语系工作组组长方明，副组长徐平；机关一总支工作组组长王大中，副组长贾遵矩、魏国辅；机关二总支工作组组长周长清，副组长王文生、邢学林；200号大组组长杨文谟；留学生办公室工作组组长田平，副组长姚元贵；北京大学附中工作组组长沈宁；653汉中基地工作组组长桂挹清，副组长蔡仲德。

7月

7月1日 工作组召开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45周年大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陶铸到会做报告。下午，工作队召开各系组长会，按李雪峰的指示，研究北大文化大革命怎样搞活的问题。会议决定由各系自由选举文化革命委员会和党、团组织负责人。会议还提出，对牛鬼蛇神，要诱敌深入，引蛇出洞。

7月3日 康生找张承先谈话，说曹轶欧今后主要负责中央文化革命小组办公室的工作，仍兼任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成员。

▲工作组上报《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一月情况汇报提纲》。《提纲》说：“北京大学是修正主义的前北京市委的一个重要据点”。陆平和“原北大的反动的社会基础结合起来，依靠、重用大批政治上严重不纯的人，结成反党的宗派集团，控制了校、系两级领导大权，实行残酷的资产阶级专政”。北京大学已“成为一个顽固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地富反坏右麇集的顽固的反动堡垒”。《提纲》说：“六一八”事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阶级敌人在运动发展的关键时刻对工作组进行的一次突然袭击”，“制造混乱，企图打乱工作组的作战部署”，把“文化革命引到邪路上去”。《提纲》说：“各系共揪出了24个重点人（指打人的人）”。

7月6日 北京市委通知，北京军区政治部郑希文参加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

7月7日 工作组领导小组会决定：成立研究组和专案组。

7月10日 全校各级党组织和党政干部的阶级政治状况分类排队表基本搞出。据20个单位（缺历史系）的统计，分类如下：党总支及直属支部分类：一类1个，占5%；三类3个，占15%；四类16个，占80%。系党总支以下所属各单位共153个。一类5个，占3.4%；二类46个，占30.1%；三类56个，占36.4%；四类46个，占30.1%。各级党政干部共计521人，其中一类47人，二类136人，三类219人，四类119人。

7月12日 从6月22日开始到今天，各系对“黑帮”中的“尖端分子”17人，分别开了批斗大会。

▲下午，地球物理学系陈必陶等五个学生贴出《把运动推向更高阶段》的大字报，批评工作组不敢放手发动群众。领导小组决定，通过这张大字报，进一步贯彻放的方针，把运动搞活。

7月15日 上午，北京市委领导吴德、郭影秋来校，听取领导小组关于围绕陈必陶大字报辩论情况的汇报。吴德说：“六一八”事件中，好人是多数，坏人是极少数，但好人也做了检讨。好处是警惕性提高了，副作用是对工作组和左派的意见不敢提了。加上工作组控制紧了些，运动就死巴了。（现在）正确处理这张（陈必陶）大字报是把运动搞活起来的关键。这个问题搞不好，就会变成过去（北大）党委那样的性质。

下午，领导小组召开各系工作组组长会议，传达吴德讲话，决定拿出三天时间进行工作整训。

晚9时，吴德找张承先谈工作，传达李雪峰对北大工作组的批评。工作组决定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由张承先作动员和检查报告。提出19日开全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斗争“陆平黑帮”，把运动搞活。

7月16日 工作组召开全校积极分子会议，有三千人参加。张承先作动员和检查报告。他说：“六一八”事件中，“确实发现了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插手运动，破坏运动。当场抓住四个”。“尽管这样，还是极少数……坏分子浑水摸鱼搞‘六一八’反革命事件，但不能把那件事整个说成反革命事件。发现了破坏，反击是必要的”。“必须建立无产阶级革命秩序”，“要革命就应服从党的领导”。

7月17日 凌晨1点半，吴德电话通知张承先，传达李雪峰指示：对“六一八”事件要做新估计。上午，张承先去市委找吴德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学校广播台播放张承先16日的检查报告录音。中午12点30分，张承先赶回广播台，又做了补充检查报告。

▲工作组办公室发出《通知》：北京市委决定，北京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领导小组由下列同志组成：

组长 张承先（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

副组长 彭林（海军航空兵部队政委）

杨以希（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武振声（国务院文教办公室秘书长）

郑希文（北京军区政治部副主任）

张德华（团中央候补书记）

组员 曹轶欧（中央理论小组办公室负责人）

李芳林（中央监委研究室主任）

杨文谟（海军后勤部副部长）

戈华（北大原党委第一副书记）

崔雄崑（北大原党委常委、教务长）

蔡润田（海军政治部保卫部副部长）

工作组各机构设置：办公室 专案组 秘书组 组织组 宣传组 联络组
资料组 研究组 总务组

7月18日 凌晨，吴德电告张承先，让工作队组织学习南京大学、中山大学关于文化革命的报告，并对照检查工作。上午，领导小组进行学习、检查。与此同时，北京市委书记处召开会议，李雪峰在会上对北大工作组领导小组进行了批评。他说，“北大6月18日乱打人，被打的人都不是好人，有些人问题不大，但打人的人有坏人，这件事是万人革命的行动……整个估计这个事情是反革命事件是错误的。估计错了就应当进行自我批评。”“18天轰轰烈烈，一个月来冷冷清清，跟这件事有很大关系”。下午4时，领导小组会议继续开会，副组长武振声传达了李雪峰上午对工作组的批评意见。会议决定今晚召开全校广播大会，领导小组再次作检查。晚10时20分，张承先代表领导小组在全校广播大会上再次做补充检查。他说，前两次检查“都很不深刻，有几个根本问题没有从本质上认识、检查清楚”。说：“关于‘六一八’事件，确实有极少数坏人钻空子，制造混乱。但我们分析时，把敌人估计过高，对群众革命热情没有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样对整个‘六一八’事件的估计上就发生了错误，认为这是一个反革命事件，并采取了限制、束缚群众手脚的一些措施。这就影响了‘六一八’以后整个运动的生动活泼的局面”。“使我校前十七八天轰轰烈烈的革命群众运动，自18号之后，陷入了一个月的冷冷清清的场面”。张承先宣布：“工作组要实行就地整训，战前整训。用三天时间，开展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集中批评工作队的领导。”

7月19日 领导小组成员郑希文到校工作。工作组召开全体队员会，武振声传达李雪峰7月18日讲话。

▲聂元梓在哲学系群众大会上发表讲话，说：“工作组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聂元梓讲话前，从康生处了解到上边对工作组态度的变化。晚11时，哲学系学生在大饭厅等处设立演讲台，传播聂元梓的讲话，批评工作组是保皇党。于是，在学

生和教职工中围绕工作组问题展开了“大辩论”。有人要求改组工作组，罢张承先的官；要求让聂元梓参加工作组领导小组。

7月21日 校园里贴出不少大字报，要求聂元梓对于她反工作组的演说澄清事实，回答问题。

7月22日 江青、陈伯达等以调查文化革命的名义，来校看大字报，向师生发表讲话，并撇开工作组召开座谈会，个别召见聂元梓等人，鼓动他们起来反工作组，赶工作组。

▲汉中653分校食堂出纳、复转军人、中共党员张永信在宿舍自缢身亡。时年25岁。

7月23日 晚9时，江青、陈伯达等再次来校开座谈会，并在大饭厅群众会上讲话。江青说：“我们是来作小學生的，跟同志们一块儿来进行这一场文化大革命”，“我们都站在你们这个革命派这面。革命是个大熔炉，最能锻炼人了，谁不革命谁就走开，革命的跟我们站在一块儿”。陈伯达说，江青的讲话“是我们文化革命小组向大家讲的话，我完全同意”。“在这个文化革命斗争中，北京大学站在最前面”。“我表示个人意见，对于‘六一八’这件事情，说是反革命事件，这是不对的，错误的”。“革命道路是不平坦的，会有反复……我们总得斗争，总得胜利”。

7月25日 晚8时，康生、陈伯达、江青、王力、关锋、戚本禹等以及李雪峰到北大开“座谈会”。9时半，康、陈、江在东操场主持召开全校万人“辩论”大会，辩论工作组问题。群众辩论激烈，多数发言不赞成工作组在处理“六一八”事件中犯了路线错误。康生讲话说：“北大的文化大革命，你们是主人，不是工作组是主人”。

7月26日 晚7时半，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力、关锋、戚本禹、曹轶欧及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其他成员和北京市委第一书记李雪峰、第二书记吴德等再次来北大，召开万人“辩论”大会。大会继续由江青主持。会上，有人提出批判工作组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问题。陈伯达代表中央文革小组讲话。他说：“北大工作组是一个阻碍同学们走上革命道路的坏工作组，一个障碍物，是压制你们革命的盖子。”他号召“搬掉这个障碍物”，大胆地自己起来闹革命。他建议北京市委撤销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接着李雪峰口头宣布撤销北京

市委驻北京大学工作组。江青建议：北京大学“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或文化革命代表大会，作为文化革命运动的权力机关，自己起来闹革命。她点名要聂元梓出面筹建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7月27日 聂元梓按照江青的授意，向全校提出“民主选举校文革筹委会”的倡议。聂经哲学系推选为代表。

7月28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成立。聂元梓主持开会，确定筹委会由21人组成，并组成7人常委会。主任委员聂元梓，副主任委员白晨曦、聂孟民（学生），常委有牛皖平、徐运朴、廖淑明（均是学生）及戴新民。

筹委会下设机构：

办公室主任：李清昆 副主任：杨克明 夏剑豸

办公室下设11个组：毛主席著作学习宣传组、武装保卫组、组织组、宣传组、专案组、简报动态组、大字报组、接待组、生活总务组、秘书组及联络组。

▲数学力学系讲师、教研室主任、党支部书记董怀允，因部分教师贴大字报污蔑董是“混入党内的阶级异己分子”、“系统地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等。董压力极大，自缢身亡。时年39岁。

▲西语系原副教授、副系主任兼英语教研室主任吴兴华，文革初期在劳改中，被强逼喝污水，患急性中毒性痢疾而晕倒，监改的人还说他装死，待送到医院后，抢救不及而死亡。时年45岁。

8月

8月1日 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聂元梓、杨克明、张恩慈因在“第一张大字报”出笼中有功，奉命列席全会。

8月3日 校文革筹委会成立后，从7月30日至今日连续三次召开全校大会批斗工作组张承先、张德华，清算工作组的“路线错误”。

8月3日或4日 江青邀聂元梓坐江的车到她住处（钓鱼台）吃饭，她说聂等人写的那张大字报是她亲自送给毛主席的。她向聂透露机密，攻击刘少奇。江要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给我打电话或者让李讷转告我，我随时可以接见你”。聂事后认为：这是“表明她把我当做了她的嫡系和心腹，才对我透露最高机密。”

8月4日 康生、江青在全校大会上，对北大文革筹委会的成立，代表中央文革小组向聂元梓“致以革命的祝贺”。康生在会上正式宣布撤销工作组。说工作组组长张承先、副组长张德华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六一八是革命事件”，并说工作组《二十天情况的报告》是“完全反动的报告，完全是反革命的立场，把革命群众说成反革命”。张承先当场被冲上台的中学生用皮带抽打，并被批斗、戴高帽子、坐喷气式。康生在会上还说：“6月1日下午4点，我接到通知（指广播聂元梓大字报的通知），我感到聂元梓同志解放了，我和曹轶欧、张恩慈、杨克明也感到解放了，因为我们当时是支持这张大字报的，我们也受到了压力”。康说聂元梓的大字报是“20世纪60年代‘北京公社’的宣言”。江青在会上说：“工作组是有靠山的。有什么靠山你们就揪出他来！”

8月10日 晨，聂元梓到曹轶欧家中，请示批斗陆平的方案。

8月12日 7月29日至今两周内，据不完全统计，各地来北大串联的约3.6万个单位，71.8万多人次。今天一天就接待四千多个单位，十三万八千多人次。

8月13日 根据中共北京市委指示，并经聂元梓为首的校文革筹委会同意，北京市委驻北大工作组全体人员于今天撤离北大，集中到市委党校整训。

8月14日 康生办公室向聂元梓传达关于批斗陆平的“指示”：“斗争会要开好，对全国有影响，发言要以《十六条》为纲”。

8月15日 聂元梓校文革筹委会在工人体育场开十万人大会，批斗陆平。彭珮云、张学书、谢道渊、王学珍等学校负责干部被揪上台陪斗。被斗和陪斗人一律挂黑牌。

8月17日 毛泽东主席题《新北大》三个字。

▲在工作队整训领导小组会上转达吴德传达的毛主席的指示：“张承先可以和工作队一块出来（出北大）。张承先有心脏病，有错误不要整死。市委有错误，但不要过多责备市委，也不要过多责备工作组。”

8月18日 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北大师生代表。

8月19日 聂元梓召集发起、成立北大“红卫兵”组织大会。各系级、各单位“红卫兵”相继成立，并建立了校红卫兵联络站。

8月22日 校文革筹委会主办的《新北大》创刊号发刊,用毛主席写的“新北大”三字为刊头。中国科学院供应科职工家属吴素珍,女,60岁,住北大东门外沟沿8号,被路过的北大附中学生揪斗后,又带到附中校内频繁殴打致死。

8月24日 《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欢呼〈新北大〉在斗争中诞生》的社论。说:“不把旧北大的那些资产阶级反动势力打倒、打碎,新北大就不可能建立起来”。“要经过大斗争、大批判、大改革”,“把每个学校、每个单位都建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堡垒”。

8月26日 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英语系二级教授俞大姻,女,在“六一八”乱斗事,中,被揪到“斗鬼台”,强令跪下批斗,俞不堪凌辱,情绪低沉。后又被迫辞掉保姆(俞的丈夫曾昭抡也在外地受迫害),24日又被抄家,于25日服毒,经抢救无效,在凌晨零点五分去世。时年61岁。

8月27日 北京市部分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在北京体育馆召开成立大会。北大红卫兵参加了这个司令部。江青、谢富治等到会讲话支持。

▲科学院气体厂工人陈彦荣,被北大附中红卫兵揪至学校打死。

8月29日 《人民日报》发表《向我们的红卫兵致敬》的社论。社论说:“红卫兵充当了文化革命这个群众运动冲锋陷阵的急先锋”。社论还对红卫兵“扫四旧”、“抄家”、“揪斗”、“没收财产”、“游街示众”等行为进行赞扬,说:“这是红卫兵的功勋。”

▲人大附中红卫兵到我校承泽园“造反”,我校职员家属,曾任国民党副军长、1964年批准保外就医的孔海琨被刺破右额,并被拴在树上,折磨致死。时年72岁。

8月30日 北京大学文化革命代表大会召开。中央文化革命领导小组副组长王任重出席。聂元梓致开幕词,她说大会的任务是:(一)确定今后战斗任务,彻底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陆、彭黑帮”,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彻底摧毁旧的教育制度。(二)主持选举北大文化革命委员会,选举校文革常务委员会和正副主任。她说:“革命要靠自己,要自己解放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起来闹革命”,“完成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大会提出“选举权只能属于人民”,“地、富、反、坏、右”、“黑帮分子”、“反动权威”及“一切牛鬼蛇神”一律剥夺选举权。

8月 北大附中红卫兵从社会上抓来一个老太太,说她是“地主婆”,被频繁打斗而死。最后也不知姓名,也无家属认领遗体。

9月

9月2日 北大党委委员、中文系党总支书记程贤策,被打成黑帮分子,遭到残酷的斗争,服毒身亡。时年38岁。《新北大》报道:自7月29日至8月28日,一个月内到北大串连的外地人员共约212.4万多人次。

9月5日 校文革筹委会发布《十条建议》,提出批斗干部要打一场“人民战争”,要校级斗与系级斗结合;专题斗与系统斗结合;斗争会与攻心会相结合;大、中、小(斗争会)相结合等。

9月9日 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由42个正式委员、10个候补委员组成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

9月11日 校文化革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北京大学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校文革)常委和正、副主任。名单如下:

主任:聂元梓 副主任:孔繁 聂孟民 杨学祺 白晨曦。

常委会委员:冯迎玺 戴新民 段心济 廖淑明 徐运朴 刘宗义 刘国政 牛占文 唐景春。

▲经济系五年级学生杨明爱(团员),文化大革命初被当做反动学生批判,有7个学生贴大字报,规定不许他私自离开宿舍、退出生活补助等八条。杨感到绝望,留下绝命书外出,上吊自杀身亡。时年29岁。

9月20日 晚上,全校在“五四”广场批斗陆平、彭珮云。

▲澳大利亚共产党(马列)主席爱·弗·希尔和夫人乔·希尔来校参观。

9月21日 北大红卫兵统一工作委员会成立。聂元梓指定孙蓬一等为负责人。21日《会议通报》宣布统一工作委员会的决定:该委员会代行北大红卫兵统一组织的领导职权;接管北大红卫兵联络站的工作;建议统一后的名称定为“北京大学红卫兵”或“新北大红卫兵”等。

9月22日 《新北大》发表孔繁题为《陆平黑帮统治下的北京大学是一个顽固的反革命堡垒》的批判文章。文章给北大党委定了四大“罪状”: (一)对无产阶级,实行资产阶级专政; (二)陆平猖狂反对毛泽东思想; (三)“大力推行修

正主义教育路线”；（四）“反动堡垒的根子”。

9月26日 日本松山芭蕾舞代表团在团长清水正夫率领下，来校参观。

9月27日 《新北大》刊登北大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和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总部《关于红卫兵统一问题的联合声明》。《声明》说统一工作委员会的“五点决定是错误的”，保留抨击的权利。

▲“校文革”召开系文革办公室主任会议，宣布校文革组织机构。机构分两摊：（一）管运动的机构：毛主席著作学习宣传组、政策研究组、作战组、组织组、宣传组、大字报组、办公室、革命串联接待组、展览会工作组、国庆游行指挥部、外宾接待办公室；（二）行政工作委员会：主任白晨曦，副主任段心济、巩运明。

10月

10月3日 锡兰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纳·桑穆加塔桑来校访问。

10月6日 凌晨，哲学系三级教授沈迺璋在家服毒身亡，时年55岁。生前，沈曾被批斗、抄家、打骂、侮辱。

▲路远、周闻贴出《搬开聂元梓，北大才能乱》的大字报。说聂上台“没有干几件好事”，劝其“自动退位，当普通积极分子，对革命，对本人不无好处”。

10月7日 “校文革”发表《立即行动起来，积极参加大辩论》。

10月8日 《新北大》刊发《欢呼这场大辩论》的社论。提出就“校文革”执行了什么样的路线“是非”开展路线大辩论。同期发表了两种不同观点的大字报。一种是肯定“校文革”的，一种则认为“‘校文革’压制群众，执行了一条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新北大》刊登杨勋的文章《新北大文化大革命又处于关键时刻——兼评聂元梓8月5日的广播讲话》。

10月9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成立（11月加入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

10月13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廖淑明、杨学祺12日贴出的《整常委的风》的大字报。

10月14日 新北大“六一”战斗队贴出题为《北大要大分裂——北大就

是要两个以上的校文革委员会》的大字报。

10月15日 校文革不完全统计,自8月18日至今,全校出现的各类红卫兵组织、战斗队、战斗组共约92个,参加者约三千余人。其中较大的组织有:“毛泽东主义红卫兵”、“北大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新北大红卫兵”等。“红卫兵”组织成立后,在校内外进行了大量的“横扫四旧”,抄家没收家产、文物、书籍等活动。据不完全统计,这期间,校内被抄家的有536户,教授53%、中层干部80%以上均被抄家,有的外籍专家也被抄家。红卫兵还以反“四旧”的名义,将临湖轩改名为“解放院”,燕南园改名为“反修园”,南阁改名为“五二五楼”等等。俄语系也一度改名为“反修系”。

▲新北大红色造反联军(简称红联军)成立。

10月16日 晚,聂元梓做广播讲话,提出“上揪下扫”的口号。

10月18日 据校文革不完全统计,9月初至今天,校内各种人员外出串连者达五千人以上,并在各地建立了造反联络站。

10月20—21日 校文革召开常委扩大会议,会上提出“常委首先要整风”。聂元梓主张“要把两条路线斗争的大辩论进行到底”。孔繁等多个常委则表示要外出串联,“不参加整风”。校文革常委内部两派矛盾表面化。会上估计,大部分师生均已外出串联,在校各种人员剩下约三四千人。

10月24日 在校文革常委会上,聂元梓提议:因五个常委外出串联,经部分常委研究,提名陈影、姜同光、侯汉清、孙蓬一、王海忱等参加常委会议,加强常委集体领导。会议同意聂元梓的意见。聂还决定由孙蓬一管全校的运动、组织和作战。

10月28日 校文革办公室发出《加强对黑帮管理》的通知,将被他们划定的“黑帮分子”先后集中到朝阳区南磨房、昌平区太平庄统一监督劳改。

10月29日 校文革召开大会,批判以李雪峰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同日,《新北大》刊登哲学系一战斗队写的《李雪峰在5月25日的报告是反革命的报告》等批判文章。

10月31日 校文革决定改组以杨克明为主编的《新北大》编辑部,改由刘国政、陈影负责。

10月 从校文革筹委会时期开始,北大出现了众多造反派组织。它们之间

经常发生斗争。10月份,围绕聂元梓组建北大“党组”等问题,原来和聂在一起的“老左派”,内部发生矛盾,并逐步公开化。在“老左派”内部矛盾加剧的同时,北大各造反派组织也发生了分化,逐步形成对立的两派造反组织。一派以“红旗兵团”等造反组织为代表,支持聂元梓和校文革,一派以“井冈山”、“红联军”等造反组织为代表,反对聂元梓和校文革。两派在10月份互相采取了一些砸、抄、抓的行动,摩擦日益加剧。

11月

11月1日 校文革集会,纪念“六一”(聂元梓大字报发表之日)五周年,继续批判李雪峰。聂元梓在会上建议将“六一”作为北大校庆日。

井冈山红卫兵、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等六个组织也举行了“纪念六一”五周年群众大会。着重批判聂元梓、校文革执行了“一条新的隐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发表倡议书,号召批判聂元梓、校文革的这条“反动路线”。

11月6日 孙蓬一派带领红旗兵团二十多人到上海揪斗华东师范大学党委书记常溪萍。

11月7日 校文革常委会决定,在广州、昆明、上海、南昌、武汉、西安、重庆等地建立七个北京大学串联联络站。每站拨活动费500元,粮票500斤。

11月8日 本月初,聂元梓、孙蓬一等人开始商量起草攻击邓小平的大字报。今日,由孙蓬一修改、定稿,聂元梓、孙蓬一等11人署名的“邓小平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在校内贴出。大字报说:“我国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是刘少奇,二号人物就是邓小平。”

▲井冈山红卫兵建立广播站。

11月11日 新北大战上海造反大队在《革命串连报》上发表题为《向上海市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炮轰上海市委,火烧曹荻秋(上海市市长),揪出杨西光,罢免杨永真,抓住陈琳湖,打倒常溪萍,气死保皇派》的文章。

11月12日 新北大井冈山红卫兵、红联军等五个造反组织砸抄了《新北大》编辑部,同时贴出《告北大和全国革命同志书——砸烂〈新北大〉编辑部》的大字报。它说:“《新北大》登出的聂元梓纪念‘六一’五周年讲话是‘伪制品’,删掉了聂元梓挑动群众斗群众、把群众打成反革命的言辞,充当了聂元梓执行资

反路线（即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下同）的遮羞布。”

11月13日 晚9时许，中央文革王任重给聂元梓打电话说：江青很关心你，很爱护你，为了你的安全，今晚让你离开家，带上你认为最重要的材料，住到另一个地方去。聂元梓当晚就由中央文革办事组派车接到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住。

11月16日 江青召集陈伯达、姚文元、王力等在她的住处策划派聂元梓到上海造反。江青说：“叫聂元梓到上海去一趟……再从北京选一些左派去，支持上海造反派，造成造反派的优势，冲破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统治”。

▲晚，江青找聂元梓密谈，江说：“王任重是国民党派来的”（王当时任中央文革副组长，分管大专院校），“你不要追随他”。又说：“你到上海去串联，我们中央文革是支持的”，“上海问题是严重的，文化大革命前，陈（丕显）、曹（荻秋）执行的是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又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对毛主席指示一贯采取抵制态度”。还说“张春桥和陈、曹是有斗争的”，“上海市委和北京市委都是一窝黑帮”，“他们互相是有联系的，和邓小平也是有联系的……”。聂说，江青还以北大社教的例子“煽动我对彭真、上海市委陈丕显、曹荻秋、常溪萍的不满”，我就“怀着满腔激情决定立即到上海去串联”。（见聂元梓1980年12月写的材料）

11月17日 王力找聂元梓谈话，根据江青谈话精神，对聂作了具体安排：到上海央文革记者站藤××建立联系，有什么材料也送藤××，有什么问题要请示中央文革也要经过他。

11月18日 上午，聂元梓从花园街中央文革记者站回校，召开校文革常委会，传达江青讲话要点，又把王力讲话向跟随她一起去上海的孙蓬一等人作了传达。当天晚上即上了火车去上海。“我们商量的办法是：一、通过和上海华东师大联合批判常溪萍（注：常是上海市委教育卫生部长兼华东师大党委书记、副校长，北大社教中曾任工作队党委副书记，坚决抵制队党委书记的极左作法，并向总书记邓小平揭发队党委书记的错误），打开缺口，揭发批判曹荻秋（上海市长）。二、通过上海师大与上海市各群众组织联系，积极参加各种批判大会和活动，表明我们的观点：上海问题严重。文化大革命前执行刘少奇的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镇压群众，应该打倒曹荻秋。三、

把北大在上海串联的学生组织起来，成立‘毛泽东思想捍卫团’，把我们的观点传达给他们，在上海串联中进行宣传”^①。

11月19日 聂元梓按江青的授意，带领孙蓬一等人于当日到达上海，住华东师大。当晚聂召开北大在沪串连人员会议。他们宣布了“以打倒常溪萍为突破口”，进而夺取上海领导权的计划。他们还计划把常溪萍同志打成“北大社教的叛徒”、“暗藏的反革命黑帮”，进行批斗、迫害。聂说：中央文革派我来上海的目的，是煽革命之风，点革命之火，组织发动学生、工人、机关干部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中央解决上海问题作调查研究。上海市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是反动堡垒。并提出将红旗兵团在沪串连人员组成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

11月21日 《新北大》登出红旗兵团的大字报——《最严厉谴责新北大红联军、井冈山红卫兵等捣毁〈新北大〉临时编辑部的暴行》，并说要掀幕后策划者。

▲聂元梓带领新北大捍卫毛泽东思想战斗团成员三十多人围攻上海市长曹荻秋，质问他为什么保常溪萍。说曹是保皇党，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中文系64届学生陈树峥，团员，在“校文革”选举中，有人说他是富农出身，剥夺了他的选举权，并对他有所指责。在当时的恐怖气氛下，他思想恐惧，由32楼4层跳楼身亡，时年23岁。

▲上海一些大专院校造反派开会欢迎聂元梓，聂在会上发言说：“上海市委是反动堡垒，烂掉了”，“常溪萍是大叛徒”，“曹荻秋、陈丕显是刘、邓的人，推行的是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造上海市委的反符合斗争大方向”。

11月22日 聂元梓等经过几天串联后，参加“上三司”的成立大会，会上批斗上海市委领导人曹荻秋、杨西光及聂元梓要求增加的常溪萍等。大会给聂元梓、孙蓬一佩戴纪念章，聂元梓在大会上发言，基调是“打倒曹荻秋”。大会上给常溪萍挂了牌子，会后给剃了阴阳头。

11月23日 聂元梓到南京参加六省一市的万人大会，煽动群众揭发、批判上海市委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11月24日 上海市群众组织在文化广场召开欢迎“第一张大字报”作者

^① 见聂元梓1980年12月写的材料。

大会,聂元梓在大会上讲话,攻击曹荻秋等上海领导同志。聂并宣布:“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此后上海市群众才普遍提“打倒曹荻秋”的口号。

11月25日 上海市各造反派组织召开全市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发起总攻大会,聂和孙蓬一、李醒尘商量好内容,由李醒尘在大会上发言,内容同24日聂在文化广场群众大会上的讲话一样,攻击上海市委和曹荻秋等领导同志。

11月27日 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聂元梓一到上海即向中央文革记者站甄××表示:张春桥如来上海,我想同他谈谈。27日甄××去车接聂元梓与张春桥密谈。张春桥说:上海工人是发动起来了,学生运动不行,希望你们起到很好的作用”。当聂汇报在群众大会上她提出了“打倒曹荻秋”的口号时,张春桥说:“对,应该这么提,是时候了”,并对北大与上海师大联合批判常溪萍很满意。张说:“常溪萍受曹荻秋重用”。还说:“许多人只知道曹荻秋的问题,不知道陈丕显的问题,其实市委许多重大问题都是陈丕显决定的,上海市委的问题要揭透,必须把陈丕显的问题提出来。不要以为陈丕显是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小鬼,许多老革命不是也修了吗?陈丕显已经腐化了,修了。”聂元梓回来后,把张春桥的讲话,立即向孙蓬一等作了传达。聂、孙等根据张春桥指示,不但重申了“不打倒曹荻秋不回北京的誓言”,还提出“揭发批判曹荻秋的后台——陈丕显”。他们还按照张春桥的旨意,选了有影响的四个工厂并和上海造反派头头王洪文等商量,“如何联合起来,批判曹荻秋,造上海市委的反”。聂还向市委要了一辆宣传车,在大街上到处宣传江青、张春桥的谈话精神,攻击诬陷上海市委、市政府的领导同志,发动了批判、颠覆上海市党政领导的“新高潮”。

12月

12月12日 红旗兵团召开群众大会,批斗东语系学生乔兼武和在我校居住的杨炳章(经济系教师杨勋之弟),说他们是“现行反革命分子”。

12月16日 聂元梓离沪回校。她在沪期间曾召集“上海工总司”、“上三司”等造反组织的头头开会,要他们“联合起来,把矛头对准上海市委”,要他们“召开15万到20万人的大会,通过决议,要求中央改组上海市委”。她还鼓动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打进市委机关去”。聂离沪时,留下孙蓬一等人继续进行夺取上海市委领导权的造反活动。

▲聂元梓回到北京，向江青、康生、张春桥、陈伯达、姚文元作了汇报。张春桥等人认为“聂元梓实现了江青的布置，巩固和扩大了安亭事件的成果，冲破了上海市委资反路线的统治，造成了王洪文这一派造反派的优势……”。

12月18日 聂元梓回京前与孙蓬一策划了继续“打常”的问题，18日孙蓬一在上海市文化广场斗争常溪萍大会上，诬陷常“是一个暗藏的反革命分子”，使常溪萍受到极残酷的迫害和人身侮辱。

12月19—21日 聂元梓在反击“十二月黑风”的口号下，开始批斗、抓捕“井冈山”、“红联军”的重要成员。从12月19日至21日，红旗兵团等组织日夜开会，批斗“井”、“红”成员杨炳章、乔兼武。

12月23日 红旗兵团等组织查封井冈山红卫兵和红联军。

12月23—24日 23日新华社报道：我国科学工作者经过6年零9个月的艰苦工作，在世界上第一次用人工的方法合成了一种具有生物活力的蛋白质——结晶胰岛素。24日《人民日报》头版上半版以五行通栏大标题刊登了新华社的报道。第二行通栏黑体字为《我国在世界上第一次人工合成结晶胰岛素》。副标题为“科学工作者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经过6年多的艰苦工作，为我国夺得这项理论科学研究的‘世界冠军’”。头版下方是社论，特号黑体大标题为《用毛泽东思想打开“生命之谜”的大门》。

12月24日 《新北大》刊登校文革常委会的号召书：《号召全体红卫兵、革命师生员工立即行动起来，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新反扑》。号召书说：“这是一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

▲历史系一级教授、北大图书馆馆长向达，文革初期多次被批斗，并被集中改。他因病重得不到及时治疗，至尿毒症很严重时，才送医院，含冤去世。时年66岁。

12月27日 留沪继续造反的孙蓬一与华东师大的一些人组织了“新北大、新师大造反兵团”，进驻上海市委，参与了上海第一次大武斗——康平路事件，写了《陈(陈丕显，上海市委书记)曹(曹荻秋，上海市长)六大罪状》的大字报。

▲聂元梓控制的北大红卫兵与清华大学井冈山(清华大学红卫兵组织)等联合召开“批判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大会”。聂元梓在会上发言，批判刘少奇、邓小平。

▲孙蓬一在上海组织并带领“新北大、新师大联合兵团”进驻中共上海市委。该兵团抛出《刘记陈、曹六大罪状》的材料，四处张贴、散发，攻击、诬陷上海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和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是“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

12月29日 校文革与中央党校、中宣部等四单位造反派在工人体育场召开批斗彭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大会。刘仁（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郑天翔（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万里（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吴晗（北京市副市长）等人被揪上台“示众”。

12月 康生针对校内有人反对校文革、聂元梓实行高压政策的情况，说：“就是要使反动言论永远抬不起头来，他们感到有压力，压得好”。江青也对聂元梓说：“我们要保你，从政治上关心你，帮助你”。

下半年，大多数单位先后成立了“劳改队”，由监管人员监督劳动，并频繁进行抄家、批斗。

【编读往来】

1. 樊建政与《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作者商榷

《记忆》编辑部：

关于《记忆》第113期金光耀老师的大作《文革风云现纸上一——读〈复旦大学大字报选〉》三处论述的一点商榷：

第一处：“8月11日，复旦大学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造反组织‘红卫兵战斗组’”，似应修改为：“8月11日，复旦大学学生成立了上海第一个以‘红卫兵’命名的文革群众组织‘红卫兵战斗组’。”

笔者以为原因有三：第一，从八月上旬复旦文革群众的自我认知角度来看，至少八月上旬，在复旦，后来被称之为造反派的那些红卫兵中相当多的人，在思想认知上，还是很难接受“造反”两个字的，甚至他们中有些人对“造反”还是比较反感的。将外文系三年级的“红卫兵战斗组”定性为“造反组织”，似乎尚需斟酌。第二，据“心向党”、“过河卒”、“史红”等编写的《大事记》和“史红”版《复旦文革大字报选》等，直到八月二十日左右，复旦才有了保守（保皇、多数）和造反（少数）的确切话语称谓与明确区隔。第三，十月份成立的“红革会”的骨干，很多都出自于外三“红卫兵战斗组”，他们在“红革会”命名中都发挥了很大作用，但“红革会”的名称中也没有使用“造反”字样。当然，我们也可以说他们没有公开宣称“造反”并不等于他们没有“造反”，不过，至少应该对八月份他们是否就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对造反的认同态度表示审慎的质疑。

第二处：“10月初，各系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委员会’”，应改为：“10月初，原‘复旦大学毛泽东主义（八·一八）红卫兵’中的‘揭’派（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

之所以这样改，一则，复旦红卫兵组织发展的历史轨迹本来就如此。这样改，既可避免金老师原表述可能引发的歧义，也可相对比较清楚地呈现出复旦红卫兵的早期分裂与重组；二则，“红革会”名称之确定，是经历了很长时间的反复酝酿的，名称中的每一个字都有特定的含义，都是不可或缺的。他们用“革命委员会”，既是为了与文革“十六条”保持一致，也是为了彰显自己与共产党的革命

历史、革命传统血脉相连。另外，这个名称在用字上，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没有“造反”字样。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显示了十月初复旦红卫兵中相当多数的内心倾向及对中央政策的某种理解与认知，似乎也更加彰显出了“红革会”政治倾向上的温和性。当然，强调“红革会”政治倾向上的“温和性”，并非是说“红革会”一直都拒绝使用“造反”字样，但那至少是相当晚的事情了（“红革会”组织名称中加入“造反”两个字是在1967年1月，炮打之前）。

第三处：“‘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三司）”，应改为“‘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上三司）”。

原因是，“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成立于十一月二十二日（另一说，据马立新回忆，成立的日期是十一月二十三日），简称“红上司”。一九六六年年底，“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内部分裂，始有“红三司”的称呼，它特指安文江为首的一派；而另一派以上海戏剧学院赵全国为首，则自称“红上司”。

2014-5-25

● 金光耀教授答樊建政先生

《记忆》编辑部：

谢谢转来读者来信。很高兴有读者关注拙文及《复旦大学大字报选》。我写那篇小文的目的是向读者介绍复旦大字报的背景，而不是对复旦的文革运动尤其是红卫兵组织进行专题研究，因此在小文中专门说明“只是非常简略地勾勒一下‘文革’初期复旦大学运动发展的概况”。

对读者来信提出的三个问题，特回应如下：

一、关于“红卫兵战斗组”。读者来信认为应称该组织是群众组织而不是造反组织。“文革群众组织”是文革运动中所有组织的统称，但统称不能涵盖具体组织的性质（文革中确有造反和保守，或还有偏中间的不同组织）。读者来信依据口述访谈认为，8月上旬（“红卫兵战斗组”成立是8月11日，已是中旬了）红卫兵中的相当多的人很难接受“造反”两个字。让我们来看“红卫兵战斗组”成立后不久留下的文字资料。《大字报选》有8月20日“红卫兵战斗组”与其他战斗组

联署的一份大字报，其中写道：“我们的组织是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彻底革命的《红卫兵》”，“我们的战斗口号是‘造反有理’、‘革命的造反精神万岁’……”，“我们的战歌是革命的《造反歌》”。因此，当然可以说8月份他们对造反已有了明确的认同态度。这样的群众组织还不能具体称为造反组织吗？更何况，“红卫兵战斗组”是复旦“红革会”的源头之一（读者来信也承认“红革会”的很多骨干来自于这个战斗组）。在上海的红卫兵运动中，“红革会”不是革命造反组织的话，谁还称得上“革命造反”呢？读者来信还认为，要到8月20日复旦才有“保皇”与“造反”的确切话语称谓。但就在其提到的“心向党”战斗小组编的《大事记》中，8月11日就记下了中四李元等贴出的大字报，其中有“坚决不承认保皇党操纵下选举出来的文化革命委员会”。而在这之前，已有大字报直指复旦党委组织的墙报《红缨枪》是“保皇刊物”。

二、关于“红革会”。读者来信认为“10月初，各系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委员会’”是错误的叙述，正确的叙述应是：“10月初，原‘复旦大学毛泽东主义（八·一八）红卫兵’中的‘揭’派（学生）联合起来组织成立了‘红卫兵复旦大学革命委员会’”。前面的叙述中遗漏了“革命”两字，这是需要向读者诸君致歉的。但除此以外，我想两种叙述只是详略的差别，而不是对错的区分。正如前面提到的，这篇小文只是就复旦的运动做一个简略的概述，而不是要完整展现“红革会”的来龙去脉以及当时校园中名称众多的红卫兵组织或战斗组。至于读者来信根据口述而得出结论说，“红革会”的名称“最为突出的特征是没有‘造反’字样”，“红革会”使用“造反”字样是以后的事，则我认为与事实不符。尽管“红革会”的名称中没有“造反”两字，但10月5日复旦“红革会”的成立宣言（草案）（见《大字报选》）中写道：“我们红卫兵……是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战斗队伍”，“我们红卫兵是旧世界的当然造反派”，“那（原文如此——编者）里抵制毛泽东思想，我们就反到那里！大反特反，一反到底，反出一个无产阶级的铁打江山，反出一个红通通的处处闪耀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新世界！”可见“红革会”从成立之时就亮出了造反的大旗。这一事例提醒我们使用口述史料时应与其他资料相互印证。

三、关于“‘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红三司）”。首先我要说，读者来信所说的“红上司”是错误的。“红上司”的全称应是“红卫兵上海司令部”，

这是一个中学生红卫兵组织，办过《红卫战报》。在1967年2月6日的《红卫战报》头版的一篇文章中，“红卫兵上海司令部”就自称“红上司”。我在小文中提到的“上海市红卫兵革命造反司令部”，有过“上三司”的简称，后来确实在内部分裂后又出现了“红三司”。读者来信指出，“红三司”特指安文江为首的一派，这正是我使用“红三司”这一称呼时的考虑。因为我的小文只是提及复旦学生为主要负责人的全市性红卫兵组织，安文江“安司令”当时声名显赫，所以在复旦的背景下就用了“红三司”的简称，而不用上海戏剧学院赵全国主导的“上三司”的简称。

希望以上所述能厘清史实。

衷心感谢为编刊付出的辛劳。

顺颂文祺！

金光耀

2014年5月26日

● 编辑部延迟发刊说明

本期本应在5月31日问世，因众所周知之原因，延迟至六月中旬发刊。刊头及页眉上面原有的发刊日期仍保持原样。谨此说明，以存证于史。

记忆编辑部

2004年6月15日

版 权 声 明

《记忆》创刊于 2008 年 9 月 13 日，是一份研究中国当代历史的电子刊物。

本刊所载的文字、照片、图表、版面设计、专栏目录与名称等内容，均受中华人民共和国现行法律和对中国适用之国际公约中有关著作权规定的保护。

未经著作权人明确书面授权，任何人不得改编、翻译、注释、整理、发行、转载、复制或为盈利的目的以其他方式使用本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获得合法授权的，应在授权范围内使用，必须为作者署名，注明“来源：《记忆》第 xx 期”字样，并按有关国际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有关规定向著作权人支付费用。

违反上述声明者，本刊将依法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举报邮箱：dw66778899@163.com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选摘、引用本刊文章请注明出处